从汉城到燕京

From Seoul To Peking

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2—1780）

吴政纬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从汉城

From Seoul To Peking

到燕京

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

（1592—1780）

吴政纬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从汉城

From Seoul To Peking

到燕京

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

（1592—1780）

吴政纬——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2—1780 / 吴政纬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ISBN 978-7-208-16343-0

I．①从…　II．①吴…　III．①东亚 - 历史 - 研究 - 1592—1780　IV．①K3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4873号

书　　名：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2—1780）

作　　者：吴政纬

出品 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李頔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343-0/K·2932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谨将此书献给张存武老师

目 录

推荐序　使节与叛将，宗师与君王——《从汉城到燕京》之前的朝鲜历史故事
导言
第一章　从义州到北京：络绎于途的求救信
　　被遗忘的功臣
　　求救请兵的艺术
　　1592，北京
　　壬辰之后，使者络绎不绝
　　站在请兵陈奏使的背后
第二章　在战争结束后开始：鲁认与姜沆的故事
　　丁酉再乱
　　忍耐与等待
　　天借顺风，便到中华
　　奇策
　　在南原的另一个人：姜沆
　　好事空凭千里梦
　　巾车返乡
　　战争少了点什么？
　　那一年，我们站在一起
第三章　皇明中华的尾声：最后的“朝天使”们
　　朝天·朝天官
　　国防线上
　　学术话题
　　最后朝天
　　线性描述的末世预言
第四章　清朝灭亡的隐喻：一棵等待盛开的枯木
　　从“朝天”到“燕行”
　　大明衣冠
　　在没有中国的地方寻找中国
　　孝宗北伐
　　寻根：万历皇帝与思明
　　从荒凉到繁华
第五章　燕行即世界：18世纪的“中国袭来”
　　被遗忘的“使者”
　　富贵险中求

中国制造
第一壮观
消失的清单
禁纹，禁奢，禁中国货物
北学中国
第六章　朝鲜人的“中国史难题”：中华？朝鲜？
一副眼镜
愿见天下奇士
天涯知己
因友情而起的论战
思明时代
历史知识
朝鲜的历史教育：童蒙读物
朝鲜转向内在
眷眷明朝
结语
同场加映：那些年，东亚其实很热闹……
使者彻夜未眠：申维瀚在日本的文学苦恼
没有共识的共识：藏在外交辞令里的战争
后记
主要登场人物
征引书目

推荐序　使节与叛将，宗师与君王——《从汉城到燕京》之前的朝鲜历史故事

公元1392年的初春时节，高丽名将李成桂正在朝鲜半岛西部的海州打猎。历史上，李成桂以骑射天才著称，然而这次行猎，他却不知怎地从马背跌落，摔成了重伤。那时的李成桂权倾朝野，甚至已两度主导国王的废立，距离夺取王位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但这场坠马意外，却给历史带来了一些变数。

忠于高丽王室的大臣郑梦周趁李成桂不在朝中，抓准机会，迅速地弹劾、流放了他的诸多党羽。这样的政治突袭虽然取得了短暂成功，但李氏一党的反击力道更为猛烈——两天后，李成桂的儿子使人设下埋伏，以铁锤击杀了郑梦周。据说在他中伏的善竹桥（在今朝鲜开城市）上，仍留有这位高丽忠臣的斑斑血迹。

郑梦周一死，再没有人能够挽救王朝走上末路。当1392年的夏天来临，高丽王朝的末代君主王瑶旋即黯然退位，李成桂则接受了众人劝进，登上宝座。国祚长达五百年的朝鲜王朝，也就此揭开序幕。



说起来，前述故事里的李成桂与郑梦周，都与政纬这本书里的朝鲜使节颇有些渊源。朝鲜人为何如此倾慕中华？他们与明朝的关系为什么如此亲近？这两个人的故事或可以做一点说明，值得在序文里介绍给读者认识。

故事要从14世纪中叶，高丽王朝的暮年开始说起。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元末明初的动荡局势里，高丽亦颇受扰害。趁乱崛起于中原的红巾军（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参加的民间反抗军），还曾越过鸭绿江，袭击朝鲜半岛北部，甚至攻破了当时的高丽首都开城。幸赖李成桂等将领率军奋战，接连击退外敌，高丽才能保其国运于不坠。

中国改朝换代，长期臣服于中原政权的高丽，自也必须观察时局变化，调整其应对方式。麻烦的是：高丽朝廷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些人主张向朱元璋的大明帝国输诚，但那个时代，亲近元朝（在1368年明

朝建立以后，他们便撤退到了北方草原地带，史家称之为“北元”）的旧势力仍然活跃。高丽对于元、明两个政权的态度，遂也持续地暧昧不明。

一下子向明朝称臣，一下子又接受北元册封，这种依违于两强之间的做法，自然要引起不满。尤其当时，明朝使臣在高丽莫名其妙地被杀害，高丽朝内部又发生了国王被弑的政变。种种原因，惹得坏脾气的朱元璋对高丽越发嫌恶，甚至威胁要发动军队渡海来攻，教训这个不听话的藩属国。

高丽不愿意开罪于明朝，必须积极地赔不是。那时代没有热线电话，也没有电报传真，两方面的联络沟通只能倚赖使节。麻烦的是：朱元璋不仅数度关起北方的边界大门，把高丽的使节团给赶回家去；有一次，他甚至要人把高丽来使揍了一顿，还恶整这些倒霉鬼，故意把他们流放到遥远的南方。

两国的关系既是如此凶险，整个高丽恐怕没有人敢再出使明朝了。于是乎，等到1383年，当高丽又一次地要派使节赴明，祝贺朱元璋的生日，满朝文臣也就推辞的推辞、装病的装病。最后，这个极糟糕的差使，便落到了郑梦周的头上。

但郑梦周是个与众不同的英雄人物。他毅然挑起了这个重责大任。只听得他慨然说道：“君父之命，水火尚不避，况朝天乎？”（只要是国王的命令，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何况是出使中国呢？）

于是，这位新任使节当天便收拾好行李，日夜兼程，朝见朱大皇帝去也。

1383—1384年间，郑梦周的这次出使，应当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虽然高丽提出的一些名分要求并没有被明朝方面所接受（在那时的外交关系当中，名分是非常重要的，参见政纬在本书末尾的附录文章），但朱元璋至少是与郑梦周和和气气地谈话许久，并且还“特赐慰抚，敕礼部优礼以送”，甚至连早前那些被流放的高丽使节都答应放还。从那之后，高丽与明朝的关系也日渐改善。郑梦周的外交才能与手腕，大概要让踵继其后的使节们感佩不已。

实际上，郑梦周的中国之旅并不仅只这一回。他在其政治生涯中曾六度出使明朝，并且三度见到了朱元璋。而他的旅行，也要比后来的朝鲜使节走得更远——因为那时的明朝首都仍在遥远的南京。郑梦周得先乘船渡过黄海，抵达山东半岛，再做南下的打算。

路途长了，发生意外的概率就要多一些。1372年，郑梦周第一次出使明朝的回程途中，这一百多人的队伍竟然在海上遭遇风暴，船被打坏了不说，还溺死了三十九名成员。郑梦周与其他伙伴漂流了十三天，一度必须割取马鞍的垫子来果腹，好不容易才漂回中国沿海，侥幸捡回性命。

在出使途中见过各种大风大浪的郑梦周，应该可以说是后来那些“朝天使”的大学长了。而其实政纬笔下的朝鲜使节，多半也怀抱着与他相近的亲善理念，希望与大明帝国建立良善的互动。郑梦周是个典范人物，他的种种工作，应当也为后来朝鲜与明朝的稳定外交关系打下了一些基础吧。

但是，政治局势要怎么变化，往往不是外交使节可以决定的。1387年，当明朝军队借由一场成功的北伐，控制辽东地方之后，1388年，朱元璋便打算把鸭绿江以南、铁岭（非今辽宁铁岭）以北的土地收归所有。

这个决定，引起了高丽内部的强烈反弹。为此，高丽国王甚至不惜单方面废除宗藩关系，乃至于对明朝发动战争。当时已建立起赫赫战功的李成桂，曾举出四个不可发兵的实际理由（所谓“四不可论”），当面劝阻国王，但未被接受。

最好的外交使节也难以违抗他的政府，但军队领袖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那年春天，李成桂被任命为统帅，带领着五万多人的军队来到鸭绿江口的威化岛。而当他的撤退请求再度被朝廷驳回以后，李成桂便发动了一场著名的兵变，即所谓的“威化岛回军”——说穿了，就是掉过头来打回自家首都，俘虏国王，逼迫他退位。明朝与高丽之间的战争警报，遂也因此解除（不过，高丽国王的发兵，仍然可能有些作用，因为朱元璋后来答应了高丽的要求，并不坚持要在铁岭划界）。

李成桂的兵变，帮助他攀升到高丽王朝的权力顶峰，再过四年，李氏一党便杀害了郑梦周，并将李成桂推上了王位。然而，假若他当年果真服从王命，带着兵马打进辽东，高丽与明朝大概要陷入好一阵子的决裂，这本书里的朝鲜使节，后来能否上路，也就很难说了。

在更后来的中朝关系史里，李成桂的诸多作为，也有关键性的影响。这不光是说他在王朝肇建以后，确立了“事大主义”的方针，使得朝鲜与明、清两朝维持着长期稳定的宗藩关系（于是有了这本书里的诸多使节故事）；另一方面说的也是，他当上国王以后，崇奉儒家思想的基

本国策。

高丽王朝的时代，儒学教育便已开始普及。尤其在13世纪末期，南宋大儒朱熹所发展出来的“性理学”传入以后，更引起知识分子的热烈回响。事实上，前文提到的郑梦周，就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朱子学者，并且被后来的儒学界奉为“东方理学之祖”。尤其是他对高丽王朝忠贞不贰、以身殉道的事迹，更是备受后人推崇。认真说起来，在朝韩历史里面，郑梦周作为一名儒家学者与精神典范的影响力，要比他外交使节的身份还来得更为巨大。

在文章开头所述及的那场政争里面，李成桂的儿子李芳远尽管杀害了郑梦周，但在他当上皇帝（朝鲜太宗）以后，却必须表彰这位不侍二君的忠烈之士，让他入祀孔庙。这是因为整个朝鲜在李成桂的时代，即已朝着儒教国家的方向发展。那时，与郑梦周齐名的儒家学者郑道传主持了各方面的改革，他所编纂的《朝鲜经国典》设计了整个国家的大小规制，其理论根据也是儒学。

换句话说，儒家思想在这个时代，由上到下逐渐渗透了整个社会，渗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那样一种氛围里面，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书里的朝鲜使节，一个个都是仰慕中华的儒家士大夫，并且会以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为傲，甚至能够将这些知识转介给日本人了。

郑梦周与李成桂，一个是外交使节与儒学宗师，一个是兵变领袖与开国君王，两个主张亲近明朝的大人物，对于后来的中朝关系都有深刻影响。或许可以说，本书当中那些使节的旅行道路，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他们打通的。本书第一章，距离朝鲜王朝的开端，约莫已有两百年那么遥远。但你将发现，两百年后的朝鲜历史，其实仍与这两个人紧密相连。



总觉得写序这件事情，理当要帮助读者熟悉这本书，提示一些先备知识或者阅读进路，于是决定在序文前约略地介绍李成桂与郑梦周的故事。我自己并不特别研究朝鲜历史，故而政纬嘱我为这本书作序的时候，其实颇觉惶恐，只希望上述故事对于读者接下来即将展开的阅读旅程，能有些帮助。

除了作品本身，一篇序文也应该要谈谈这位写书的作者。我之所以结识政纬，得说到“故事：写给所有人的历史”。两三年前，这个新成立

的互联网媒体集合了学院内外热爱文史工作的年轻人，为大众读者撰写文章，并且一同切磋写作技艺。我亦有幸参与其中一些工作，继而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伙伴，包括政纬。

其实在那之前，我很早就在学校里听过政纬的名字。研究生时代，政纬与我同样求学于台湾师范大学，只是他晚了我几个届次，总不大有机会碰面。不过，政纬是我们这一辈学生里面异常出色的一个。就实际成绩来看，能够像他这般在硕士阶段便已有数篇文章登上台湾顶尖的学术期刊，着实罕见。

更难得的是，这样一个潜力无穷的学术人才，也怀有一份为学院外读者写作的热情。在“故事”网站里，政纬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一个作者，实在来说，他所着重书写的中朝关系史主题，普通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但政纬在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却仍旧广受欢迎——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出于上述种种缘故，在“故事”当中，我们几个与政纬相熟的伙伴，都十分期待他在写作方面的持续经营，而政纬则慨然回报了这样一本厚实的书。书里的六个章节全系未曾发表的新作，不仅方方面面地刻画出朝鲜使节的故事样貌，并且首尾连贯，呈现出长时段历史的变化转折。政纬同时凭借着他对朝鲜历史文献的熟稔，添入了许多精彩的图像史料。假若读者仍觉意犹未尽，建议你找到他早前出版的另一本（并不艰涩难读的）学术著作《眷眷明朝》，配合本书一起阅读，不仅有助于知识的增益，乐趣也是绝好。

在中文出版市场上，政纬这本书其实难得。今天走进坊间书店，若要在架上寻获一本朝韩史，选择恐怕有限。而若想觅得一本书讲朝鲜时代的赴明使节，那得换个地方，找一所藏书足够丰富的大学图书馆。若是更贪心一点，要找到一部面向大众又具有知识深度的朝鲜时代故事书写，政纬这本书大约已是凤毛麟角了吧。

写朝韩历史的书籍如此贫乏，在出版能量充沛的台湾，似乎颇为奇怪。近几年，“韩流”对于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影响力早不是新闻。以朝韩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在台湾也颇有市场。前文提到的李成桂、李芳远、郑梦周、郑道传等历史人物，在近几年的韩国电视剧中频繁地登台亮相，本书第二章末尾提到的柳成龙及其《惩毖录》，在2015年亦曾被韩国KBS（韩国放送公社，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电视台改拍成大河剧，中文世界也不乏观众。

朝韩的历史故事活跃于我们的荧幕上，却没有相应的书写能满足社会大众的知识欲求，真是很可惜的事情。政纬的这本书填补了一些缺憾，而如果读者还期待更多作品，真应该试着敦促他、鼓励他一直写下去（记得带上几瓶好酒，我想会有点用处）。

我没有很明确地问过政纬，不过我想，喜欢写作故事的人，多少都受了同一种念头的影响："这么厉害的故事，不能只有我看到。"政纬的研究生涯仍在往前开展，他未来在学术路上的发现与创获，必然也要与这本书里的朝鲜使节一般精彩绝伦。期盼喜欢这本书的读者能提醒他惦着那种冲动，把他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大家知道，并且持续地为我们写故事。

陈韦聿

（"故事：写给所有人的历史"编委）

导言

重现过去，探寻古人的思想状态，是历史学家的职志。史家穷尽一生，搜罗各种可能的线索，拼凑答案。正式出版的著作、私密珍藏的日记、课堂上的讲话记录，文字像是海洋，史家意欲打捞名为意义的宝藏，揭露那夹在黑白之间的真相。什么最能显露一个人的世界观？他怎么认识世界，定义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令人着迷的历史疑问，带领我们走到一张张地图面前，重新思索，这是什么？

一位18世纪的朝鲜人，他脑海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要徒步多远，才能离开朝鲜？越过边境，直至尽头，是北极、南极吗？世界是球状体？人类曾经没有谷歌地图，仍必须想尽办法，刻画世界的样貌。可以说，关于世界的知识，背后由一套历史认识支撑。远渡重洋的游历是少数人的特权，描绘世界的模样基于探索未知的热情，是奢侈与浪漫；地图，是最佳的代言人，向无缘外出的人诉说，这个世界不着边际，但请听我娓娓道来。

试着端详两张由朝鲜人绘制的地图（图1、图2），我们可能较熟悉图1。乍看之下，朝鲜人笔下的中国，大体符合实情，不论是沿岸的轮廓，或是重要河川如黄河、长江的相对位置。当然，我们能轻而易举地指出失真的部分：河川与陆地的比例失衡，中国大陆东部与西部的比例尺不一致。



图1　朝鲜所绘中国地图

（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OPEN，图长44.8cm，宽63cm）

中国地图一直是朝鲜舆地图不可或缺的角色，里头夹杂着朝鲜对中国的各种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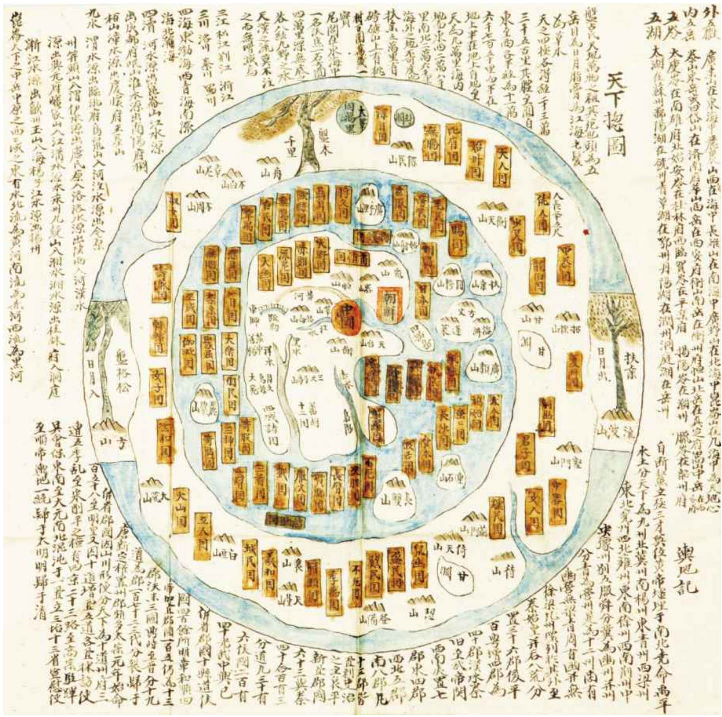


图2　朝鲜所绘“天下总（摠）图”

（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OPEN，图长29.8cm，宽28cm）

天下图可以说是超乎今人想象，另类的世界图。关于这张图的谜团，至今仍是历史学家热衷讨论的话题

然而，“真实”与否不是衡量该图的唯一标准，其中巧妙处甚多，值得一一申述。首先，朝鲜半岛的大小显然与现实不符，放大不少。其次，此图应作于清代，从图右下侧有“台湾府”，右上有“宁古塔”“沈阳”即可知之。其三，画者知道中国之外另有天地，左上角列有“荷兰国”“大西洋”“小西洋”，左下角注明“暹罗国”“占城”，透露来自域外的消息。不过绘者显然是以中国为中心，于是勉强将中国之外的地理知识，紧缩一隅，聊备一格。

那么，图中的中国本身有什么问题？

既然是一张清代的中国地图，为何北京旁写着“顺天府”，南京则是“应天府”，这都是明代的用语。再者，圆圈红底注明战国时期的国家，又用小字写下孔子、张良、东方朔、周瑜、郭子仪等历史人物，这张图似乎更像是历史教材。在我眼中，它所呈现的是层累叠加的中国历

史，而且明显是以朝鲜为中心出发的世界观。

朝鲜领土的尺寸膨胀不少，相形之下，日本则显著缩减。以朝鲜为中心，能够发现更多图中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例如不论是由陆路、海路，朝鲜前往北京的旅程，地名标记频繁，相对位置较准确。由朝鲜北上，经辽东、凤凰城、广宁、宁远、山海关，这些顺序皆符合实情。往西渡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北上直抵燕都，这些皆是粗略的轮廓中精细的存在。这位朝鲜绘者投射更多的，始终是朝鲜自身，而不是中国，这是阅读此图的法门，提醒我们表层印象之后别有洞天。

“中国地图”的意义是揭示另一条通往“真实”的道路，读者必须在中国聆听朝鲜的声音，才能明了辽东、山东的细节何以如此详尽，日本、荷兰国却遭受冷落忽视，这皆是有意识的安排，体现朝鲜的世界观。

现在，目光移至图2“天下总（摠）图”，此类型的图又被称为“天下图”，在17、18世纪的朝鲜极其流行。目前学界对此图所知不多，各有诠释。[(1)] 天下图吸引众多研究者注意，起因于它的不可解，这张图充斥太多未解之谜。天下图为什么是一张“圆形地图”，大陆与海洋为何是圆形的？中间的中国尚且容易理解，然而“三首国”“流鬼国”“大人国”，这些夹带着诡谲气氛与想象真实的名词，却满布纸上，引人遐想。

如果请一位18世纪的朝鲜人描绘世界的模样，上述两张图是最常见的答案，这都是“真实”，绝非虚构。探究朝鲜人的世界观令人着迷，图上未知的国度曾让人信以为真：中国居于天下之中，世界围绕着中国旋转。世界起源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继而女娲补天，中国的历史象征天下，纸上密密麻麻的批注说得更多的是中国，而不是今时今日的“世界”。中国曾经主宰东亚区域的知识，朝鲜上下莫不服膺。我总觉得，想读懂这两幅图，首先要了解中国，才能进而掌握朝鲜的位置。

从汉城到北京

前面提到的“中国地图”，对辽东的描绘最为细致，原因极其简单，因为这是朝鲜人最熟悉的路线。从元代开始，直至清末，朝鲜人沿着几乎一致的路线，络绎不绝，由朝鲜前往中国，从汉城到北京。相较于中国内陆，辽东地区诸如“凤凰城”“锦州”等小地名跃然纸上，理由不外乎这是朝鲜人的必经之地。

明清时代的中国曾有一套与周边国家互动的游戏规则，学术式的称

呼是“朝贡册封体系”，也就是经由中国承认周边国家的政治主权，周边国家名义上向中国效忠，相互允诺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关系。笔者无意深究朝贡体制的兴起与衰落，只想指出，缘此制度，朝鲜必须履行外交义务，逐年向中国派遣使节团。因此，朝鲜人在中国的旅行像是惯常的风景，他们穿梭于贡道上，从中国带回最新的情报。这条路线是通向世界的窗口，主要向朝鲜展开。

朝鲜使节团是浩大的巡礼，成员约三百人，按例连年向中国开拔。明清是传统中国的盛世，人口众多，百姓富足，制度精良，皆曾缔造文化的伟业，很难想见欧洲国家能够统领如此巨大的帝国，并各维系二百余年。朝鲜使者是亲历中国的见证人，他们约需耗费四十至六十日，走过一千二百公里，才能抵达北京。根据几幅朝鲜人绘制的地图，可知路程贯穿辽东，他们先是穿越崇山峻岭，见识沙漠荒野，然后目睹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接着走进最繁华的北京城。

朝鲜使臣在北京有固定的居所，也就是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因为就在玉河桥旁，俗称玉河馆。在明代，朝鲜贡使停留四十日，然后踏上归途。相形之下，清代较为宽松，使节团可以停留两个月，间或有超过的例子。从朝鲜人的世界图，谈至朝鲜使节团，实是因为使节团的成员值得一提，其中不乏朝鲜思想界的著名文人，他们来回往复中朝之间，形塑朝鲜的世界观。(2)

朝鲜素称礼仪之邦，自号“小中华”，也就是最像中华的外邦。为了凸显自身的文化高雅，朝鲜官方拣选颇具威望的高官，以及擅长汉文诗赋的文臣，担任使节团的要职。他们穿着明朝样式的服装，走在前往中国的道路上，处处彰显汉学素养，体现东国有人的尊严。朝鲜自1392年开国后，仿效明朝制度，科举同样使用儒学经典，是一个处处复刻明朝的国度。理解这一层，才能想见朝鲜使臣履及中国土地的喜悦与振奋：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宗主国，更是文化母国，前往中国的使行不唯是政治任务，更像是朝圣问道的实践。

这种情况在清代突遭巨变，代明朝而起的清朝不是汉人政权，而是源自东北，被朝鲜视为“夷狄”的“女真人”。如本书正文所示，清朝代替明朝兴起是对朝鲜最严重的打击，他们一方面咀嚼明朝灭亡的悲伤，另一方面思索何去何从。小中华如何自处世界，是数个世代朝鲜读书人的疑惑。从今人的角度观之，理解清朝的关键词绝非“夷狄”，事实上这是一个疆土远迈前朝，历久绵长的伟大时代。然而，对于这些身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人而言，“清国是胡虏夷狄”的观念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他们

认为中华文化已亡，指责清代的汉人不思念明朝。于是朝鲜使者在中国的旅程，像是寻访明朝的过往，他们凭吊逝去的文化母国，即使政治上服膺大清，内心却未曾退让一步。

中国见闻

明清时期的中国是怎么样的时代？这是复杂的问题，朝鲜使臣在中国的见闻像是一条线索，提供与众不同的答案。前往中国是此生难得的际遇，因此不少跟随使节团进京的读书人，将所见所闻写下，这可能是一份日记，也可能是提交官方的报告书。按照惯例，使节团中的“书状官”返抵朝鲜后，需要向朝鲜国王提交见闻，这像是官方差旅的核销报告，内容是最新的中国观察，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宫廷知悉世界变迁的消息。

相较于呈交官方的报告书，性质私密的日记更引人注目。日记像是封藏心底的悄悄话，只能跟自己说。根据现有的研究可知，写作日记的动机，部分是为了回国后出版一本最权威的“中国观察”，因为得以前往中国的终究是少数，光荣返乡的人才有话语权。无缘一睹中国的朝鲜人才是多数，他们通过阅读前人的笔记、日记、报告书，在朝鲜体验中国。由此观之，朝鲜使节团实扮演多重的角色，他们不仅仅是政治使者，更是中国观察团、中华文化的传译员，他们与朝鲜国内的读者共享眼前的中国。

深入朝鲜使者的日记，是理解朝鲜世界观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反复切换中国和朝鲜的视角，在交错变换的过程中捕捉朝鲜读书人的思想状态。观看中国地图的方法，是以朝鲜为中心，画一个同心圆，层递推展，含括全局。因此，阅读中国，就是理解朝鲜，而朝鲜使臣的中国之旅是完美的机遇，提供所有必备的素材——文化认同、历史知识，以及大时代的冲击，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故事。

燕行录

学界习惯将朝鲜使者的见闻称为“燕行录”，燕是北京的古称，可以简单地将此理解为“前往北京的记录”。然而，这种称呼流行于清代，不是明代的产物。对于景仰明朝的朝鲜人而言，这不是燕行，而是朝见天朝上国的行旅，因此常称以《朝天录》《朝天日录》，由此可见朝鲜人

对明、清两朝的观点迥然有别。

《燕行录》是来自域外的中国观察，历明清两代不断。根据统计，朝鲜平均每年向清朝派遣三个使节团，这是一个规律性“发现中国”的历史机制。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不只是目睹大山大海的旅行，朝鲜使节带回的信息比起所见所闻更值得关注。他们在中国寻访金石书画，竭力搜罗关于中国的知识，装箱封存，运回朝鲜。燕行是莫大的文化工程，向朝鲜输入最新的中国，我们能借此窥视朝鲜读书人对中国的感怀与观察，也能从中领略中国的风貌。

关于书名

明清两代的首都，除了明朝初年定鼎南京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肇基北京。朝鲜使者对于中国的首善之都另有称呼，尤其在清代，特别称为“燕京”。如前所述，因为出使的终点是燕京，于是又称使行为“燕行”。这个词在朝鲜的语境中，甚是平常。明万历元年（1573），朝鲜官方即派遣使者“发向燕京”(3)，最后一任赴明使节金堉（1580—1658）亦自称是“奉使燕京”(4)。

明清易代，相同的首都换了不一样的主人，不变的是朝鲜使臣继续使用“燕京”代称北京，有时甚至作为“大清”的同义词。清康熙十五年（1676），朝鲜君臣议论起清廷编修《明史》，便说道“燕京所修之《明史》”(5)，在此“燕京”等同“大清”。朝鲜国王接见使者，也是聆听他们“陈燕京事情”(6)，这里说的不唯是北京趣事，更是诸多中国见闻。

综观本书各章的故事，朝鲜使者登场的舞台散落两处之间，即朝鲜国首都“汉城”，与明清两代的京师“燕京”。笔者选择燕京取代北京，一方面考虑到朝鲜读书人出使北京惯用燕行的古意，一方面这个颇具朝鲜特色的词，(7)强调本书系从朝鲜贡使的视野出发，考察他们眼中的东亚世界（朝鲜、中国、日本）。

旅程

本书旨在述说朝鲜使者在中国的故事，目的是揭示朝鲜人眼中的景色，引领我们重新体会各种历史故事，进而探究朝鲜读书人的世界观，阐明他们心底的中国与天下究竟有多远有多大。故事的终结是朝鲜忘却

了明朝，为了追述这段思想运动的兴起与衰微，必须从一场东亚国际战争谈起，直至一段中国和朝鲜的真挚友情而止。以下，简述各章的构思。



图3　义州北京使行路

（现藏韩国奎章阁图书馆［古4709–78］）

这张地图清楚地呈现，朝鲜使者来往中国、朝鲜的路径

第一章“从义州到北京：络绎于途的求救信”从1592年的壬辰倭乱说起。关于这场战争的专精研究甚夥，学者关注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动机，以及在朝鲜半岛上四处燃起的狼烟。是谁击退日军，保卫山河，这是中国和朝韩史家的兴趣所在。相形之下，本书无意为战争盖棺论定，评断谁是谁非，笔者的企图是述说朝鲜使者的故事。我们容易忽略战争期间来回义州、北京的朝鲜使臣，他们拼尽一切，只为保全母国。当国家危在旦夕，这些使臣经历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这是本章想要探究的隐微故事。

第二章“在战争结束后开始：鲁认与姜沆的故事”试图描绘另一场战争。将目光远离朝鲜半岛，壬辰倭乱仍在持续。两位朝鲜人因缘际会被俘而流亡日本，奔回母国是他们毕生职志。他们如何出逃？在日本沦为人质俘虏的岁月，造就什么样的日本观？更重要的是，透过他们的眼睛，理解壬辰倭乱的另一面向。

第三章“皇明中华的尾声：最后的‘朝天使们’”目标是呈现明代中国的景貌。在壬辰倭乱之后，一般认为朝鲜知识人孺慕中国，感激明朝再造朝鲜的恩德，感戴明朝是中华文化的母国。细细审酌朝鲜使臣的明朝观察，在倭乱之后，他们如何评价中国？这是符合理想、实践儒家的乌托

邦吗？再者，朝鲜与明朝紧密联结，当明朝走向死亡，朝鲜游人能嗅出亡国的氛围吗？他们如何经历明末，面对大时代的崩裂？

第四章“清朝灭亡的隐喻：一棵等待盛开的枯木”说的是明朝灭亡后的故事。1644年，明朝灭亡，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难题，也是朝鲜人必须响应的设问。在明朝灭亡之后，朝鲜如何安排自身的位置，他们如何看待清朝的存在？最吊诡的莫过于大清入关后，历经顺治、康熙，直至乾隆年间，四境晏然，歌舞升平。信奉“胡虏无百年之运”的朝鲜使者，如何理解、响应这个世界？他们是坚守爱戴明朝的立场，还是悄然改变？

第五章“燕行即世界：18世纪的‘中国袭来’”着眼于物质文化，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商品。18世纪，中国制造的货物宛如潮水，席卷朝鲜上下。朝鲜使节团不仅肩负文化任务，同时也是重要的商贸管道。朝鲜如何通过使行贸易，向中国购买各种必需品？朝鲜使者与大清的物质交流，如何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观感，形塑新的世界观？此外，朝鲜使节团的亮眼明星，不应止于舞文弄墨的文人士大夫，那些随团出行的奴仆、译官、管理马匹的下人，同样值得关注。

第六章“朝鲜人的‘中国史难题’：中华？朝鲜？”作为最后一章，一方面总结前几章的脉络，呼应各种历史陈因的积累；另一方面，试图阐明朝鲜的世界观在18世纪的剧烈变迁。明朝灭亡之后，朝鲜读书人普遍思念明朝，他们热衷于撰写明朝历史，甚或放弃仕途，为明朝守节。这不是与众不同的选择，而是数个世代有志之士共同的表态。然而，这一切究竟如何终结？在最“思明”的世代，他们如何遗忘明朝，逐渐走向今日的主体认同？本章以一场中国、朝鲜的友情开端，进而申论其历史意义，道出思明现象的尾声。

朝鲜使者来往中国、朝鲜之间，写下无数关于中国的观察。但是，正如图1所示，即使在名为中国的场域，我们仍应注意朝鲜的分量，这像是画中画，提醒着朝鲜主体性的存在。越过高山与深河，朝鲜贡使看见了什么？这是最令我着迷的问题，而本书是最渺小的尝试。我想诉说，图上的未知有意义；我想描绘，一幅名为朝鲜的思想地图。

(1) 关于天下图的研究，请参阅海野一隆：《李朝朝鲜における地図と道教》；黄时鉴：《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目前的研究成果指出，天下图的知识体系不少源自中国典籍、佛教和道教，而原型推测来自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不少研究者认为，朝鲜人描绘中国以外的世界，天下图象征朝鲜突破中国中心。

(2) 关于朝鲜使节团的研究，请参阅全海宗：《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

(3)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己卯条。

(4)　《朝鲜王朝实录》，孝宗九年九月五日，己亥条。

(5)　《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二年一月十八日，辛亥条。

(6)　《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乙亥条。

(7)　已故福冈大学名誉教授山本治夫曾指出，“燕京”对于17—18世纪的朝鲜读书人而言，集结了各种关于清朝的负面印象。由此观之，燕京堪称一个颇具朝鲜特色的词汇，与同时代中国的用法不同。详参氏著：《十八世紀東アジアの開明思潮の隆替と現代意識（A）—燕行録類を基軸にして—》，第1—3页。

第一章　从义州到北京：络绎于途的求救信

如果让你编纂一本东亚的历史教科书，第一个登场的历史事件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始于1592年的一场战争。

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至今仍笼罩在东亚的上空，挥之不去。出于各种原因，这场战争有许多名称，如果按照天干地支的纪年方式，那一年是壬辰年，日本挥军攻打朝鲜，于是有人称之为“壬辰倭乱”。同时，这场战争入列明万历皇帝（1563—1620）在位的三大战役之一，于是被称作“万历朝鲜之役”。另一个参战国日本则是以天皇的年号命名，是为“文禄—庆长之役”。

三种命名方式，指涉三个政治实体。1592年，大明、朝鲜、日本，没有谁能够脱身，他们一同揭开这场“国际战争”的序幕。

历史学家对这场战争充满兴趣，它是一场跨国的“火药战争”，动用当时最先进的火药武器；导致大量朝鲜人被俘虏至日本，许多朝鲜的手工艺（如陶器）、图书艺术和儒学思想也传进日本国内；它促进大明和朝鲜两国的友好，在明朝灭亡（1644）之后，朝鲜君臣始终没有忘记这份恩情。更重要的是，四百年前日本攻打朝鲜，大明出兵相救，容易令人联想到20世纪初期的“日韩合并”、朝鲜战争时期的“抗美援朝”。1592年像是不断涌现泉水的历史古井，不断与世更新，时至今日仍值得深入探究。

关于这场战争的过程，可简单地归纳如下：

（一）1592年，丰臣秀吉（1537—1598）以征服大明为目标，出兵朝鲜。

（二）战争初期，日军连战皆捷，仅费二十日就攻下汉城。

（三）同年，朝鲜君臣逃到边境义州，向大明求救。

（四）大明出兵朝鲜，替朝鲜夺回平壤。

（五）之后两军僵持，互有胜负，进入和谈，间有小冲突。

（六）和谈破裂，开始第二次正面对抗。

（七）朝鲜名将李舜臣（1545—1598）在海上连战皆捷，大明—朝鲜联军占上风。

（八）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不久日军退兵，战争结束。

根据上述八点，三国的研究者耗尽精力，琢磨着如何还原战争始末，他们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战争发生，更想找出是哪些因素造成最终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尝试研究丰臣秀吉的生平，试图在他卑微的出身上寻觅出那“征服大明”美梦的来源。此外，战争初期，日本势如破竹，为何最终没能征服朝鲜？大明朝廷为何愿意援助朝鲜？历史学家认真厘清当时战场上的配置：大明的军队在哪里？朝鲜的军队在哪里？谁是主力部队？哪个战术错误导致最终的结果？综观大部分的研究，他们的目标始终在“战场”上，关注于战场上的“英雄”，是他们的决定为战争画下句点。

这场战争不缺英雄，大明将军李如松（1549—1598）一日就攻下日军占领的平壤城，朝鲜名将李舜臣在海上从未战败，两位都是永载史册的人物。平心而论，即使作为侵略方的日军，如小西行长（？—1600）、加藤清正（1562—1611）亦是不可忽视的将领，倘若不是他们勇武有加，日军的推进岂能如此顺利。

然而，这就是战争的全部吗？诠释丰臣秀吉的心境，还原战场的配置图，分析重要将领的战术，借此断言谁胜谁负；进而纳入坐在朝堂上的各国官员，以及战场上的军人，串起整个故事。然而，是不是还有一些新的面向？本章就是解此疑问的一种尝试。

在战争结束之后，一如预期，李舜臣、李如松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嘉奖，李舜臣虽然已在此役中殉国，但仍被朝鲜官方封为“第一等宣武功臣”，即荣誉最高的有功臣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另一群功臣不以“宣武”为名，却同样为朝鲜官方重视，他们的名称是“扈圣功臣”。单从字面上理解，扈圣可以说是跟随、拥戴朝鲜国王，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战争期间，始终不离国王左右，尽心尽力辅佐。事实上他们做得更多，其中多位肩负重任，被派往中国，与大明的官员周旋谈判，请求尽快出兵。这些朝鲜使者在两国之间居中协调，不仅促成大明发兵，更帮助明军加速熟悉状况，毕竟大明的军人将踏上一片未知的土地，与一众未知的敌人决战。

故事将从一位被遗忘的功臣谈起，他的名字是郑昆寿（1538—1602），战后受封为“第一等扈圣功臣”，理由是他说服大明为朝鲜援

兵。当他出发时，朝鲜国王曾说："国家的生与死，就看你这一次了。"（国之存亡，在卿此行。）[1]从后见之明看来，郑昆寿成功地完成任务，一切是如此顺利。然而，如果我们永远站在结果眺望过去，那将忽略许多"不如预期"的风景。大明真的会义无反顾地援助朝鲜吗？作为使者去中国求救是怎么一回事？郑昆寿的日记，以及他向朝鲜国王呈递的报告书，将带领我们深入1592年的北京城，体验历史的波折与不确定性。



聖功臣 教書須給時別 教書 王若曰無棄爾勞礪世之
當務有功必賞為政之所先永言搆亂之逆夷敢肆假途之宄
計極痛呼父於情固然以賊遺君雖死不可顧平昔至誠事大
予何敢云念奔走竭力周旋臣亦勞止乃至効忠貞之節以致
盡羈紲之勤雖事不同厥功則一宜敷渙汗之綸誕告盤血之
[illegible]李恒福鄭崑壽為一等圖形垂後超三階爵其父母妻
子亦超三階無子則甥姪女婿超二階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
及永世仍賜伴倘十人奴婢十三口丘史七名田一百五十結
銀子十兩內廐馬一疋信城君珝定遠君琈李元翼尹斗壽沈
友勝李好閔尹根壽柳成龍金應南李山甫柳根李忠元洪進
李𥐻柳永慶李幼澄朴東亮沈岱朴崇元鄭熙藩李光庭崔興
源沈忠謙尹自新韓淵海豐君者順義君景溫順寧君景儉申
磼安滉具宬為二等圖形垂後超二階爵其父母妻子亦超二
階無子則甥姪女婿超一階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仍
賜伴倘六人奴婢九口丘史四名田八十結銀子七兩內廐馬

宣宗大王實錄卷之一百八十 三十

與夫果毅偉功豈曰小補乎時哉盖亦將多乎前矣若非諸卿
之輿起而竭盡其心安能庶事之否艱而保有今日一生一死
雖死生之不同是褒崇之有異肆策勳李舜臣權慄
元均為一等圖形垂後超三階爵其父母妻子亦超三階無子
則甥姪女婿超二階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仍賜伴倘
十人奴婢十三口丘史七名田一百五十結銀子十兩內廐馬
一匹申點權應銖金時敏李廷馣李億祺為二等圖形垂後超
二階爵其父母妻子亦超二階無子則甥姪女婿超一階嫡長
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仍賜伴倘六人奴婢九口丘史四名
田八十結銀子七兩內廐馬一匹鄭期遠權快柳思瑗高彥伯
李光岳趙儆權俊李純信奇孝謹李雲龍為三等圖形垂後超
一階爵其父母妻子亦超一階無子則甥姪女婿加階嫡長世
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仍賜伴倘四人奴婢七口丘史二名
田六十結銀子五兩內廐馬一匹於戲出此三物旣共山河帶
礪之盟傳諸百代永享子孫仍雲之祿故玆教示想宜知悉○邑

图4 《朝鲜王朝实录》中关于赐郑昆寿"功臣"名位的记载

本书是基于朝鲜、中国的文献而撰写的，主角大部分是朝鲜使者，因此以下统一将这场发生于1592年的战争称为"壬辰倭乱"。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郑昆寿的脚步，踏上请兵求救的道路。请各位读者切记，有时情绪往往压倒理性，左右人的判断，有时候谣言比真实来得有力。请试着遗忘战争的结果，因为现在战争才刚刚开始。

被遗忘的功臣

1592年八月[2]，时值秋季，万物肃杀，朝鲜国王宣祖李昖（1552—1608）的心情是越发萧索。这一年是李昖即位的第二十五年，同时他恰好年满四十岁，古时称作不惑之年，意思是能够明辨是非，不迷惑于事物的年纪。然而丰臣秀吉的大军登陆釜山之后，李昖没能发挥明辨是非的政治智慧，他选择抛弃百姓，逃离首都汉城，一路北行。现在他落

脚于大明、朝鲜的边界，丢失绝大部分的领土，且尚未掌握敌军的相关情报。如果说朝鲜王朝有哪几次濒临亡国的边缘，这是最接近的一次。

面对这样的难题，李昖盘算的不仅是向大明求援而已，他甚至愿意率领嫔妃投奔大明怀抱，当一个安乐的王爷。在朝鲜臣僚屡次的劝阻之下，李昖虽打消念头，但仍不停地向宗主国讨救兵，渴望天朝的军队兵临朝鲜。

李昖曾几次派遣使者前往中国，也确实接受过大明辽东地区军队的援助，那是一支约三千人的军队。相较于日军倾全国之力，出动十六万人，这三千人真是杯水车薪。会出现这样的落差，必须责怪朝鲜与大明联系时没有交代清楚。最初只说是倭人来袭，辽东军以为是地方性的叛乱，于是只派了这么一支特遣队。

辽东派来的三千人由副总兵祖承训带领，他们于七月曾攻打被日军占领的平壤城，因为人数上的巨大差异，最终大败而归。此后大明再也没有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昖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既然内附不成，那么就继续讨救兵，直到赶跑敌人为止。他决定再拣选一位官员担任使者，火速赶往大明朝廷，恳求大军即刻发兵朝鲜。这个人选的官职不能太低，且必须要能察言观色，应对进退得宜，最好有相当历练。在这样的条件下，时任大司谏、位阶正三品的郑昆寿进入李昖的口袋名单，那一年他五十四岁，同样感受到朝鲜国的寒冬将至。

郑昆寿，字汝人，号柏谷。他六岁开始读书，二十一岁跟随著名的朝鲜儒者李滉（1501—1570）学习，文采在朝鲜国内极为出名。他的个人著作《柏谷集》，使我们得以勾勒出当时朝鲜君臣在义州（今朝鲜义州郡）的情况，其中也详细交代了郑昆寿出使中国的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



图5　郑昆寿肖像

（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OPEN ）

透过郑昆寿的日记可知，1592年八月的朝鲜可说离亡国之秋不远，当时朝鲜君臣所知有限，他们间断地获得一些情报，但难以判断真假。曾有传言说地方的起义军收复安东（今安东市），李昖却问官员“这是真的吗”，显见人心动荡，缺乏信心。更重要的是，身处义州的高级官僚对于战争缺乏整体的认识。自战争开打后，政治中心一直移动，他们跑得甚至比敌人追赶的速度还快，因此脱离原先的公文传递系统，缺乏足够的情报了解日军。

战争初期，最重要的任务是掌握敌军的走向，曾有一次宣祖李昖询

问官员，全罗道的日军突然没了音信，是去哪里了，居然没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相形之下，日军可说是做足功课，连朝鲜官员都承认："我们不能够探知日军的消息，而他们反而颇了解我们的状况。"（我国不能间谍，而倭反能为，颇知我国情状。 ）[(3)]

可以想见，当时朝鲜上下已然慌乱，他们不清楚敌军确切的数目，只知道"人数很多"；也不知道地方义军的动向、战果；不知道还掌握多少领土，有多少粮食、物资可以支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必须想出一套说辞，令大明即刻发兵。

求救请兵的艺术

一般印象中的"求援请兵"极其简单，不论是形诸影视作品，或是见诸文字，都像是一道简单的手续，立即完成。关于壬辰倭乱的电影、电视剧，提到朝鲜使者求救，不外乎就是快马出发，紧接着画面一转，大明官员就义愤填膺起来，开始商议出兵事宜。翻开专门记载明代历史的文献如《明史纪事本末》，针对朝鲜请兵使者的描述是"求救请援的使者往来不绝，充塞于道路上"（请援之使，络绎于路 ）[(4)] ，之后即是大明朝廷如何处置。请兵使的工作被想当然地跳过，像是战争的点缀，未曾深究。

事实绝非如此，求救请兵是项高超的政治艺术。简而言之，这需要能力强大的团队、动人的话语、有策略的行动准则，以及充裕的物质条件。当郑昆寿步入北京城，他必须知道该找谁做什么事，又应该要"怎么说"。因此，1592年在义州的行前讨论显得格外重要，朝鲜君臣评估大明需要派遣多少军队、日军大概动员多少士兵、如何让大明觉得问题严重到需要"出兵"，这一切都不简单。

从事后的结果看来，令大明意识到"此事与我有关"是成功的心理策略。如何引起大明朝廷的注意？丰臣秀吉出兵伊始，在在强调目的是征服大明，征伐朝鲜是希望朝鲜充作向导，为王前驱。朝鲜向大明求救，这可以说是至为有用的说辞。李昖屡次指示臣子，务必将日军"意图攻击辽东"的事转达大明朝廷。郑昆寿抵达北京后，在呈送给大明官员的文件中，确实屡次强调此事，深化中国方面对日军的警戒感。

其次是请兵来朝鲜，大明应该要动员多少人次，才符合朝鲜的期待。这牵涉两点，第一是日军到底出动多少兵士；进而才触及第二点：我们需要多少救兵。明军越多自然越好，万历皇帝曾下敕书，声称发兵

十万，不过这毋宁是为了令朝鲜安心的政治宣示。李昖主张五万人即可，不敢真奢望十万大军兵临朝鲜。相较于他的臣子，李昖可是保守多了。时任承旨的吴亿龄（1552—1618）认为兵员是越多越好，他建议军队可以驻扎辽东，倘若朝鲜战场兵力不足，立即从辽东征派，或是在朝鲜的军队若感到疲倦，需要修整，可与驻扎辽东的部队轮休。

那么，朝鲜愿意付出什么？能够负担多少军资、粮食？答案可能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朝鲜并不准备承担什么。李昖在与郑昆寿等人讨论时，明白地指出："大明必须运粮食过来，我们现在残破不堪，没有粮食！"（粮饷并为载来，我国残破之余，无粮，可虑也。 ）(5) 朝鲜当然不是全无粮食，但没粮也是"实话"。首先应该考虑到，当时朝鲜实际控制的领地已缩小很多，套用郑昆寿的话："朝鲜国君连往后退一步的空间都没有"（寡君无一步可退地 ）。 (6) 当时兵荒马乱，义州朝廷连各地义军的动向皆无法精确掌握，点算存粮、计划性的运输，更是难上加难。结论是朝鲜无法负担粮食补给，大明必须自行从辽东或山东运补粮食，他们不但必须出人，还得出粮。

接着进入更为细节的讨论：这个使节团的成员是谁？他们要带什么礼物去中国？正使人选由郑昆寿担纲演出，自无疑义，那么同行的另一要角"翻译官"呢？翻译人员在当时称作"通事"，意思是交通外国事务的人。李昖拣选最优秀的通事随行，这些人在后来的斡旋谈判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名字都值得记下，这三位是：洪纯彦、洪秀彦、韩润辅。通事的人数有限，派遣三人已是不少，毕竟还须考虑到之后明军抵达朝鲜，将另外需要通事居中沟通。通事一职在朝鲜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并不高，通常由身份地位较低的"中人"担任，往往不为高级官僚重视。然而，在此存亡之秋，正是这些人承担最为吃重的角色，联络大明、朝鲜两方的各种事务，他们也是今日被遗忘的功臣。

使节团的要员"正使、翻译官"备齐后，郑昆寿等人准备带什么出发呢？通事洪纯彦认为"白银一百两应该就足够了"，这些钱可以当作"人情"送礼之用，若用不完再缴还朝廷。明朝万历年间正是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时代，当时欧洲人在美洲挖掘银矿，制成银圆，以此购买中国货品。中国的瓷器、纺织品深受西方人喜爱，因此他们以白银交换货物，导致中国民间流通大量的白银，其数量之巨，明朝官方甚至认同将白银作为缴税的法定货币。然而，朝鲜官方并不以白银计价，而是使用实物货币，例如以布匹作为货币。洪纯彦口中的一百两白银，同时在大明、朝鲜有着完全不同脉络的价值：一个是法定货币，一个接近无用之物。

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国内没有银矿的国家而言，在战乱时期准备白银百两，仍是一件不容易的任务。李昖左思右想，这一百两权充路费，又另备七十两当作“人情”，分送一路的大明官员。

1592年在义州的行前讨论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这是朝鲜对于整个战事认知的全部，而这也正是郑昆寿与大明交涉的基础。郑昆寿的认识一如前述，不多也不少，其他就看临场表现。综观李昖、吴亿龄关于出兵人数的“深谋远虑”，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话术，毕竟出兵人数的多寡，决定权始终不在他们手上。这个位于义州，风雨飘摇的小朝廷，迫切地渴求救兵，天马行空地讨论军队的指挥权应属谁，其实说明他们有多么焦虑，希望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寻找救国的出路。现在，就看郑昆寿如何施展外交长才，搬来救兵。

1592，北京

从汉城到北京的使行路程，一般费时四十五日至六十日间，不过这通常包含许多观光行程。郑昆寿可是十万火急，他们一行人日夜兼程，仅费时约二十五日即抵达北京的处所“玉河馆”。玉河馆本名“会同馆”，是外国使节在北京的下榻处，因为馆旁有玉河桥，故俗称玉河馆。郑昆寿安抵玉河馆后，连忙打听哪些人士与主管军事的兵部尚书石星（？—1599）熟识，方便之后联系。

今日的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人在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刻，肩负着国家存亡的责任，是多么沉重。郑昆寿如何面对明朝的官员，这时他年已五十四，在朝鲜担任要职，他必须不计形象，摆低姿态，周旋于大明的政要之间，为母国寻求最大的奥援。我们无法深刻地体验这份情绪，只能借由他事后的报告书尝试再现这段刻骨铭心的历程。

显而易见的是，郑昆寿伊始就锁定目标，他一到北京就希望能面见石星，却不得门路。然而，这时战事方起，石星自然希望从朝鲜使者身上掌握情报，因此在郑昆寿抵京四日后，石星派遣官员与朝鲜通事联系，了解朝鲜方面的情况。郑昆寿持续摆低姿态，他特别呈文管理朝鲜外交事务的礼部，恳求免去所有繁文缛节，一切礼仪从简，不要过于张扬。同时，他又写了一篇给兵部的呈文，希望速速发兵朝鲜。

郑昆寿极为幸运，时势推了他一把。当时大明朝廷本来忙着处理另一战事——“宁夏之役”，这场战争在郑昆寿出使北京期间恰好结束。一如郑昆寿与副使施允济所说：“宁夏的战争结束后，大明必定专心处理倭

寇。”（宁夏贼刘东阳已就擒，朝廷必专意攻倭。 ）[7] 这对郑昆寿一行人而言，可是天大的好消息。郑昆寿给石星的信函中也表示：“今者伏闻宁夏之贼，兵不血刃，自就灭亡，已无西顾之忧；惟此倭寇独稽天诛，王师可以专力，以堂堂天朝十万兵，可以朝令而夕发。”[8] 三日后，石星召见郑昆寿、副使施允济，以及通事，郑昆寿等人当场痛哭，[9] 恳求石星立即出兵。根据郑昆寿的记载，石星感动不已，甚至也哭了出来，于是口头允诺应援之事。

石星会愿意发兵是考虑到几点：一是万历皇帝伊始就定调救援朝鲜，圣旨不可违背；一是综合各种情报，日军确实有攻略大明的意图，此事绝非中国的“外事”。正如郑昆寿所说：“大明发兵与否，决定朝鲜的生死，而中国边疆的安危，也与此紧密相关。”（小邦之存亡，果决于此举，而中国疆场之安危，亦在此 举。 ）[10] 李昖在义州特别指示，务必将日军即将进攻中国的情报传达给大明知悉，这无疑打动了石星的心。

然而大明的政治事务非一人而决，既不是兵部尚书，也不是万历皇帝能够决定出兵与否，这还需要舆论的支持。待在北京的郑昆寿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算是亲身体验到这样的政治生态。反对出兵朝鲜的官员如许弘纲（1554—1638）认为：“朝鲜、日本两国开战，我们只需要防卫边境就好，不须出兵。”（两夷相战，中国但当御之境上。 ）[11] 简单地说，反对出兵者主张“只防中国地方，不须救朝鲜”[12] 。相形之下，主战派如石星则不这么看待朝鲜问题，他们着眼的是阻挡日本于境外，伤害远比在本土战争低得多。肩负经略朝鲜事务的宋应昌（1536—1606）曾明确表示，朝鲜边境是京城水路、陆路的门户，“俱系要地”，现下日本“专图内犯”，自然需要“救援朝鲜，彰显中国之道”（彰字小之仁，以存中国之体 ）[13] 。朝廷的议论就在两边摇摆，最终由万历皇帝定调，平息此风波。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大多轻轻带过反对出兵的议论，毕竟出兵是既定事实，许弘纲等人的言论，不如说是铺陈出兵的一个情节设定。然而，根据郑昆寿的见闻，当时反对派的影响力并不小，甚至石星的心情也因此不太安宁，担心无法解决朝鲜问题。更重要的是，主战派与非战派的针锋相对，不限于1592年，而是贯穿整场战事。 [14] 透过郑昆寿的眼睛，我们得以重新体会一个“悬而未决”的氛围，其中特别令人讶异的是反对派带给主战派的压力，远比想象来得大。这种不确定感，始终缠绕在郑昆寿心上，即使石星屡屡强调必然出兵，但郑昆寿仍旧认为石星不明确保证发兵日期，代表中国的军队根本没有准备好，这一切仍是一

场空。

石星的口袋中没有明确的出兵时间，肇因他要考虑的事情远比郑昆寿在义州的设想来得多，同时也因为军队在开拔之前存在太多未知数。不过石星仍设法解决一些可以立即处理的问题，例如允许朝鲜使者购买“违禁品”，这包含武器、火药，他更直接赐给白银，让朝鲜使节团可以在回程沿路采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石星这贴心的举动，其实是坚定朝鲜的信心，这战争必将持续下去，大明支持你们。

郑昆寿紧握着每一个机会，他得到大明应允购买违禁品的命令后，回程沿途立即四处搜购火药、弓箭。使节团带回大量的军资，毕竟力量多一分是一分，现在朝鲜义州可谓家徒四壁。行经辽东时，他特地求见总管朝鲜军务的宋应昌。郑昆寿一进军营，发现这支军队器械精良，部队整齐有序，不禁称赞有加。面见宋应昌时，他质疑军队居然连前锋都尚未开拔，为何停滞于辽东，不立即前往义州？宋应昌自然不会泄露军机，只说大军尚在集结，至于“军队的事情，我自有打算”（进退机宜，吾自酌量 ）[15] 。既然军机不可泄露，郑昆寿只能继续赶路回义州，匆匆结束请兵陈奏的使行。

郑昆寿获得的成果远比想象的来得大，他出发时沿路给辽东军官写信，渴求立即出兵朝鲜，抵达北京后亦不断联系大明，却没有获得任何一个正面回应。伊始石星没有立即召见他，其焦虑可想而知。然而情况是一日比一日好，后来他争取到面见石星的机会，得到承诺。之后与大明官员沟通时，是通事在旁担任翻译，有时甚至是通事直接与中国官员沟通，往往是郑昆寿交代一个概念，再由通事临场发挥。任何人都不愿意为一个未知的事物付出太多，郑昆寿的任务就是令大明熟悉这个未知，然后征召有血有肉的男丁，前往未知之地。终于，他成功了。

壬辰之后，使者络绎不绝

认真思考郑昆寿在北京的过程，他向大明官员道尽朝鲜的情况，但他接收到的大明讯息实在少得可怜。当他踏上归途，唯一得到的是兵部尚书允诺出兵的保证，以及购买违禁品的许可。一位载入史册的功臣，在当时并没有因为完成任务而志得意满，觉得国家万幸，即将获救。因为他深知这一切尚在未定之天，石星真会履行诺言吗？即使真的言必信、行必果，又来得及吗？

战争不可能一帆风顺，大明出兵朝鲜也无法一夕之间扫除日军。大

明、朝鲜之间需要不止一位郑昆寿。在这场长达七年的战争中，无数的使者、通事前赴后继，传达最新军情，直送北京。在郑昆寿使行之后，大明益发了解这场战事的样貌，有比较清楚的认知。然而，即使一开始最坚定的人，也可能摇摆；即使看似顺利的结果，过程也可能坎坷。

李如松打下平壤城不久，1593年，李昖马上以“谢恩”的名义，派遣一个使节团前往北京。然而朝鲜使者郑澈（1536—1593）在北京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谢恩，仍旧是提供情报。这时距郑昆寿出访相隔一年，这三百天的时间没能为朝鲜带来改变。错误的情报流布于北京与汉城，对大明而言，朝鲜究竟能负担多少军粮，提供多少军资，日军究竟有多少人，这才是关键。相形之下，朝鲜需要的就是救兵，为了这个，他们可以将困难修饰得平顺，即使没有粮食也能凭空变出。

1593年，郑昆寿曾写信给李如松，承认朝鲜方面“运送粮食的成效不好，导致大军缺乏军用品、粮食”（移粟无力，仍致大军资粮缺乏　）[16]。直言这是“小邦之罪”。因此，郑澈与兵部官员的谈话，始终围绕着粮食和军资打转。大明官员提及，一年过去了，今年的田产如何，意即希望朝鲜运补更多粮食。面对这个问题，郑澈只能摆低姿态，继续喊穷。他表示因为战乱，百姓大多离开家乡，难以农作，简单说就是“没人种田”（具尽抛荒　）[17]，这实在是朝鲜使者自郑昆寿以降的一贯说辞。战争后期的1597年，朝鲜使者柳思瑗（1541—1608）近乎哭诉地向礼部官员说：“我们兵、粮都不多，根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倚靠父母之邦。”（小邦兵少粮乏，计无奈何，只仰天朝如父母矣。　）[18]

不论是战争初期的1592年，或是壬辰倭乱结束的1598年，朝鲜使者像是复制郑昆寿的成功经验，相同的戏码再三上演。根据1597年权挟（1542—1618）的记载，他在北京向兵部请兵的说辞一如郑昆寿，不外乎是“军兵十分单弱，兵仓十分匮乏”，如果大明再不派遣更多军队来朝鲜，则“人心更无所恃，丑贼益肆鸱突，小邦灭亡之祸立至矣”[19]。一谈到粮食，同样是粒米皆无。

朝鲜使者单方面的渴求救兵，不论是不愿意，还是没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的态势令大明官员深感不悦。毕竟哪有人倾全力帮忙，每次一问你能不能做些什么，却一无所获。兵部就曾发文柳思瑗，直言：“中国从来没有自己花钱出力，还替外国处理军务的。”（从前未有自费兵饷而代外戍者。　）[20]更大力责骂朝鲜君臣，表示朝鲜上下“自战争以来，就没听过君臣好好反省，积蓄粮食，训练军队。每次一听到日军打过来，就马上派使者过来求兵，络绎不绝”（曾不闻该国君臣痛加振

励，积饷练兵，以为预备之计。乃一经喝，便自张皇驰报乞哀，趾错于道）[21]。在兵部官员眼中，朝鲜方面“不知道练兵，只知道靠中国的军队；不知道积蓄粮食，只知道将中国的粮食当作自己的，真是只会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不知练兵，长以中国之兵为兵；不知积饷，长以中国之饷为饷。己享其逸，而令人居其劳；己享其安，而令人蹈其危）[22]。

兵部的愤怒其来有自，战争初期朝鲜为了搬救兵，自然需要适度地“低报”日军的实力，“修饰”朝鲜军队的战果，令大明觉得援救朝鲜的成本并不高。事实自然不是如此，石星就曾质问郑澈：“之前说你们在各地斩杀日军，数量不少，怎么一到求救的时候，就说军队数量不足。”（数称你国军兵在于各处斩贼甚众，到今却说军兵之少者。）[23]显见朝鲜虚报不少战功。朝鲜使者为了提高请兵的成功率，低报日军的人数。例如郑昆寿离开北京之后，宋应昌与石星通信时提及：“朝鲜急着我们派兵过去，他们担心我们不愿意，进而影响到出兵的事宜，所以把敌军很多说成很少，宣称敌军很弱，但其实很强，考虑到人情，这种处理方式是难以避免的。”（夫朝鲜求援甚急，方虑恐喝中国，阻饶我师，以众作寡，以弱掩强，人情大抵然也。）[24]

站在请兵陈奏使的背后

就是在这样吵吵闹闹的局面下，大明与朝鲜学习合作，互相帮助，完成这场战争。无论台面下的讨价还价如何激烈，大明支持朝鲜，全力驱退日军，乃始终未变的目标。我们可以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列举数条救援朝鲜的必要因素，但我们没有办法体会数万个家庭的生离死别，以及国破家亡的痛苦。聚焦于郑昆寿、郑澈等使节，以及洪纯彦等通事身上，他们在北京图绘朝鲜各要塞的地图，指明各地驻军的数量，以及山川险要之所在，功劳可谓不小。尽管为了完成请兵的任务，间或有所隐瞒，但这绝对是出于爱国的热情，从今人的角度看来，能够谅解。

大明、朝鲜在这个摩擦与磨合的过程中互相认识，借由前述的故事，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过去“一帆风顺”“中韩友好”论述下的龃龉，种种的“不合”提醒我们在大船驶近港湾前，波折不会结束。然而，仅凭一张负面或正面的标签，无法概括壬辰战争的全部。实情是在这七年间，大明与朝鲜的外交人员认真地比对资情，严肃地规划行军动线，大明官

员在少数情绪高涨的愤怒时刻之外，其实也尽量照顾朝鲜使者的心情，务求他们安心，坚定其信心。有愤怒与不谅解，也夹杂着同情与坚持，这更逼近事实。

权挟与兵部侍郎李祯会面时，李祯询问日军的情况，权挟说到一半，突然百感交集，情绪涌上心头，就这么哭了起来。李祯连忙摇手说“不要哭，不要哭”，安慰道：“近日的军情报告都很稳定，你们可以安心。”当权挟一边哭一边请求更多军队时，李祯大声地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立即答应权挟的所有请求，并以右手作拳，击左手掌，连称“日军实在太可恶了！”[25]

李祯在中国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官员，却是权挟得以接触到的“高官”，也是其来往至为密切的大明官员。李祯一如郑昆寿、郑澈、柳思瑗与权挟，都是消失在战场上的“战争英雄”，一群“被遗忘的功臣”。倘若在中国史料中寻觅李祯或这些朝鲜使者的身影，结果想必大失所望。明代官方最重要的史料《明实录》针对郑昆寿此次使行的记载只有“朝鲜陪臣郑昆寿等以国王越在草莽，实主辱臣死之秋，乞免赐宴……”[26] 如此一句而已，这是多么地简略。

銓屬言訪冊非定自今甲不過密行咨訪于吏科河南道二臣
以報堂官故不自列其名非昔年列而後不列也況考察以各
堂官考語為據又不盡憑訪冊乎今請京察年分訪單送科者
不列科臣名送道者不列道臣名不必列刻訪冊報可○調山
東海防僉事楊鎬管永平兵備選練主兵兼理屯田馬政○朝
鮮陪臣鄭崑壽等以國王越在草莽實主辱臣死之秋乞免賜
宴禮部請照例折給俾得遄歸從之○兵部言近報倭賊欲犯
義州拒敵勢不容緩宜行經略及督撫責令吳惟忠統領南兵
火器手各三千限五日內往遼併發到兵馬及本鎮兵丁一萬
尅日赴義州同朝鮮兵將協力堵剿保兩鎮各選精兵五千
宣大各選精兵八千馬步相半擇將統領文到五日即往遼東
聽經略調遣戶部速解糧料併秋文四川巡撫速催劉綎兵馬

图6　关于郑昆寿出使明朝的记载，仅见《明神宗实录》寥寥数语

朝鲜使臣耗费心力撰写日记、报告书，目的固然必须考虑到实务需要，李昖与主导战争的朝鲜官僚倚靠这些文献掌握大明的国情。然而，朝鲜使臣在北京的记录如此翔实，相较于中国文献的缺漏，两国对壬辰倭乱的关心程度实是天差地别。毕竟此乱对朝鲜是灭国之祸，在明代却只是万历三大征之一。透过使者的眼睛，我们才能够摆脱大叙事的势力范围，还原使者身历其境的感受，认识两国官员周旋谈判的技巧与历程。

最后，当我们站在请兵使的面前，聆听他们的各种说辞，例如“我来到这里所做的一切，决定我们是否会亡国”（陪臣来此，乃小邦存亡之所决）[27]，或是“倘若朝鲜灭亡，辽东就危险了”（朝鲜亡则辽左岌岌矣）[28]，我们不仅必须站在他们身后，考虑其立场与心态，更须同理地衡量大明官员的想法。大明朝廷有出兵的决心，然而发兵看似简单，若没有充分的准备，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兵部官员直言“发兵非难，运粮甚

难”[29]，朝鲜境内缺乏粮草，是明军始终难以摆脱的噩梦。

大明高层如宋应昌、石星等官员并非束手无策，他们曾试图就近从山海关、辽东购买粮草，从便发送朝鲜。战争伊始发兵十万，殆非虚言，问题是出动为数如此多的军队，后勤系统能否接济上，没人敢拍胸挂保证。认真审视朝鲜使者的说辞，以及宋应昌与石星的信件，他们从未担心大军人数不够，问题始终挂在粮食一事，宋应昌向石星说：“你担心军队集结完毕后，粮草不够，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台下虑兵集而饷难继，此正不佞前揭陈其艰难之状者。）[30]宋应昌发给朝鲜的公文特别交代：“将义州、平壤沿途确实存有的粮米数量，以及可以支应多久的数字报上来。”（开报义州、平壤沿途实在粮米、草料各若干，实足几月之用。）[31]

当谈到日军之强弱，宋应昌深知朝鲜将日军“以众作寡，以弱掩强”，低估其实力。宋应昌对日军自有定见，根本不信朝鲜使臣的说法，诸如朝鲜所称“倭在平壤者万余，在王京者二万余，散处者七八千”[32]，相较于实情十六万之众，相差甚多。宋应昌眼中的日军是值得尊敬的敌人，不仅“懂得军事上故意示弱、示强的技巧，而且善使谋略，绝非寻常的敌人”（倭奴辈不但得兵家示弱、示强之术，且有纵横诡谲之诈，大非寻常比，奈何漫然易视之也）[33]。战争初期因为有他做充分的准备，李如松才能在战场上指挥若定。

大明深知朝鲜使者的心理，同时了解日本军队的实力，他们不是如影视作品中，凭着一股“天朝上国”的气焰就出兵朝鲜，而是冷静地观察与分析；大明君臣不是胸有成竹，得知必胜地奋勇向前，过程间有挣扎与犹豫。历史不是理所当然，不论是郑昆寿在北京的辛苦周旋，或是李如松肃立平壤城下的气势昂然，他们都推动了历史的齿轮，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朝鲜使者是壬辰倭乱的重要角色，一封封递交大明官员的书信，今日看来可能细琐微小，却承载着不可轻视之重。

(1) 郑昆寿：《赴京日录》，页三六一。

(2) 除特别注明，本书的时间皆按阴历，方便读者查找史料，特此说明。

(3) 郑昆寿：《赴京日录》，页三六〇。

(4)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援朝鲜》，页九六三。

(5) 郑昆寿：《赴京日录》，页三五五。

(6) 郑昆寿：《柏谷集》，页一九一—一九二。

(7) 郑昆寿：《赴京日录》，页三七一。

(8) 郑昆寿：《柏谷集》，页一九三。

(9) “痛哭一场，恳乞兵马。”见郑昆寿：《赴京日录》，页三七二。

(10) 郑昆寿：《柏谷集》，页一九四。

(11) 郑昆寿：《柏谷集》，页一八四。

(12) 郑昆寿：《赴京日录》，页三七三。

(13) 宋应昌：《初奉经略请敕疏》，转引自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第19页。

(14) 如1597年，柳思瑗在北京时仍听闻这样的论战，见柳思瑗：《文兴君控于录》，页三〇七。

(15) 郑昆寿：《赴京日录》，页三九〇。

(16) 郑昆寿：《柏谷集》，页一九五。

(17) 郑澈：《郑松江燕行日记》，页一七七。

(18) 柳思瑗：《文兴君控于录》，页二八八。

(19) 权挟：《石塘公燕行录》，页二十八。

(20) 柳思瑗：《文兴君控于录》，页二九八。

(21) 柳思瑗：《文兴君控于录》，页二九八。

(22) 柳思瑗：《文兴君控于录》，页二九八。

(23) 郑澈：《郑松江燕行日记》，页一九四。

(24) 宋应昌：《十二月初三日报石司马书》，转引自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第45—46页。

(25) 权挟：《石塘公燕行录》，页二十八—二十九。

(26)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三，万历二十年十月六日，壬辰条。

(27) 柳思瑗：《文兴君控于录》，页三一一。

(28) 柳思瑗：《文兴君控于录》，页三四〇。

(29) 权挟：《石塘公燕行录》，页三十一。

(30) 宋应昌：《十一月初四日报石司马书》，转引自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第30页。

(31) 宋应昌：《十一月十七日檄朝鲜国差卫献纳、金庭睦》，转引自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第40页。

(32) 宋应昌：《十二月初三日报石司马书》，转引自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第45页。

(33) 宋应昌：《十二月初三日报石司马书》，转引自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第46页。

第二章　在战争结束后开始：鲁认与姜沆的故事

壬辰倭乱结束之后，留下了什么？

答案远比想象中难寻，首先这牵涉不同地域的人群，我们只要稍稍偏移立场，即可能推导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其次，这份战争的遗产，在历经不同世代的继承与诠释后，看似离今人越来越远，却又像不曾逝去的存在，不离左右。壬辰倭乱时而被提起，警醒着中国、韩国、日本对国际政治的信心；时而在政治话语沉寂之际，悄悄地沉默不语，仿佛消失一般。

认识战争遗产的最佳方式，莫过于走进战场，聆听每一位参与者的心声。因此，利用哪些人事物串联起整个故事，决定了我们眼中的世界。大明的皇帝、朝鲜的水师将军、发生于平壤与鸣梁的战役，背后隐藏着一套完整的叙事，从一个符合“当代期盼”的角度诠释着这段历史。

为了走出战争迷雾，本书特别着眼于那些非典型的战争人物，第一章以来往于大明、朝鲜的使者为主角，即是希望与那些堪称典范的人物“拉开距离”，创造一些空间，重新发现战争大叙事下的小细节。本章将继续透过两位非典型战争人物的眼睛，重历战争。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第一章那些奔走于中朝两边的使者，强调的是“目击”的当下；本章更聚焦于战争之后。故事中的两位主角历劫归乡，当他们回忆起从壬辰年开始的战争，他们脑海中究竟留下了什么？最后，借由第一章与本章的故事，希望能进一步讨论壬辰倭乱的历史意义。

那么，容我介绍第一位主角，他的名字是鲁认（1566—1622）。

丁酉再乱

鲁认气宇倜傥，气质非凡，作风洒脱，可以说是一位无拘无束、颇有个性的读书人。同时，他侍奉父母至谨，是出名的孝子，两种形象集于一身。1592年，战火蜂起，鲁认一家与朝鲜名将权慄（1537—1599）有旧，权慄写信敦请鲁认参军，他二话不说，立即拜别年逾七十的老父，踏上征途。鲁认一路上出谋划策，颇有成绩，也曾亲自上阵，镇守城寨，堪称允文允武。

1597年九月，岁在丁酉，那年鲁认三十一岁，这是他投入战争的第六年。虽已开打六年，战况始终没有稳定下来，这一年丰臣秀吉又派遣大量增援部队从釜山上岸，当时无人知晓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

战场本来僵持的局面，在日军增援、朝鲜守军防御失策的情况下，突然成为日军一面倒的优势。日军先是在闲山岛击溃朝鲜海军，接着由南向北，扫荡今庆尚南道、全罗南道地区。鲁认在得知消息后，只身脱离军队，着急地赶回老家，探望父母。行军半途就独自离营，只能说后人形容他气宇倜傥，算是符合实情。不过鲁认为了父母，倒也能屈能伸，在他护送双亲前往宜宁（今庆尚南道宜宁郡）途中，意外遭遇一群日军。双拳难抵四掌，鲁认用身体护着父母，乞求至少放过两位老人家。出人意料的是，日军或许为他的孝顺感动，就这么放其通行。

安顿双亲于宜宁之后，鲁认听闻大明副总兵杨元（？—1598）镇守的南原城（今全罗北道南原市）被日军围攻，于是只身一人骑马过去侦探敌情。从事后的资料来判断，这是极为愚蠢的行为，因为包围的日军有六万之众，但城内的大明、朝鲜联军却不足五千人，而且当他出发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然而，又有谁能知道，前面有什么等着我们。

果不其然，鲁认一靠近南原城即遭遇了刚得胜的日军。双方一遇，紧接着是一阵缠斗。鲁认很是勇猛，孤身一人边打边跑。坚持十余里左右，暂时摆脱敌人，遁入一片浓雾中。他策马狂奔，试图摆脱敌人，不料雾中射出一支箭矢，正中背部，他眼前一黑，接着不省人事。睁开眼时，他隐约记得自己被带上船，后来被安置在一个房间。就这样，他成为日军的俘虏，离开了朝鲜战场，已至“萨摩”（现九州岛）。

一位从战争初期即投身军旅的朝鲜人，被敌军俘虏真是奇耻大辱，立即自尽是极为常见的选择。鲁认自然也不例外，在前往日本的船上，他曾计划自绝，却因为手脚被日军捆绑而无法行动。退而求其次，他开始绝食，每有日本人靠近，便会遭到鲁认的叫骂。这些反应都呈现鲁认硬直洒脱的一面，轻性命、重名节。

尽管鲁认一路反抗到底，采取不合作姿态，仍无法改变既成事实，他已经抵达日本。沿路的景象深深地烙印在他脑海中，称为人间炼狱当不为过。他回忆自己一路所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悲惨至不忍直视。被俘虏的年轻男女，都是出身于大家世族的人，这样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人之多。”（积尸如山，流血成川，惨惨焉不忍见。至则我国年少男女被俘者，皆良家士族，而不知几千万计。 ）[(1)]

战争已持续六年之久，在鲁认之前，早有无数朝鲜人被掳至日本。鲁认发现不少在九州岛的朝鲜人，衣着早已改为日本样式，当他们看到鲁认穿着朝鲜服饰时，悲从中来，在路旁嚎泣起来。真是耳不忍闻、目不忍见的惨状。

难道也要像他们一样，只能以“倭形”生活吗？对鲁认而言，这真是生不如死啊！毕竟衣冠代表着文化，朝鲜人一直自豪他们的穿戴方式最像中华，至于日本人则像是野蛮人一般，与中华风俗不同。

那么，鲁认就只有寻死一途吗？在他眼中，日本人是丑恶的敌人，是家国大贼，既然第一时间没能自我了断，现已踏上日本国土，唯一所求就是生还朝鲜。幸运的是，鲁认恰好重逢务安（今全罗南道务安郡）人徐景春，两人在国内就是好友。鲁认与徐景春两人聚首，话题无不绕着“回家”打转，他们都朝思暮想着回朝鲜，于是一起筹谋如何逃离日本。

忍耐与等待

若要美梦成真，欠缺的是忍耐与等待；当然，运气也是不可少的催化剂。没有亲朋故旧，没有大笔资金，鲁认要如何返回朝鲜呢？

首先，他运用自身的才华累积财富。当时日本是一个以武士为核心、发展出一套身份阶级制度的社会，舞文弄墨的读书人“儒者”在政治场域中少有机会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日本与中国、朝鲜不同，没有以“文”为主体的科举制度，选拔文学人才进入政府体制。因此，儒学事业由当时感兴趣的人承担，这些人大多是儒生以及僧人。对于这些人而言，鲁认是一个“汉文化”“中华学问”的宝藏，不论是汉诗、书法，还是关于中国的知识，都能通过鲁认转介。

鲁认的书法并不出众，至少不是人们评价他的亮点。然而，他自小准备科举，读书练字可说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常功课。相较于汉学人口贫乏的日本，一般朝鲜读书人的程度就足以让他们眼睛为之一亮。一位日本僧人曾向鲁认索取汉诗，鲁认手笔一出，立即获得赏识。自此以后，日本年轻人常常拿着扇子来访，乞求诗作，只待鲁认把诗写完，一手交诗，一手取款。（自是倭官年少辈往往抱扇乞诗，诗成书罢，银子辄至。）[2] 通过这种方式，鲁认累积了一笔财富，有了行动的本钱。

其次，他利用这些资金招揽几个懂得朝鲜语的日本人，向他们打听

情资，主要是关于日本国内的政治消息。鲁认甚至以其所见所闻，画出一张地图，以备将来使用。他积极地认识日本，为的是逃脱后能够将这些情资传达朝鲜官方，即使没有用自我了断的方式尽忠，也日日夜夜期盼着复仇雪耻。

第一次机会来了，鲁认来到日本已十五个月，他始终没有放弃，等待着机会，现在就是验证运气的时候。1599年正月，鲁认联系徐景春，以及同样被掳的朝鲜人共数十位，趁着夜半时分，乘着小船，偷偷出了江口。可惜这次行动早就为人所知，他们被把守江口的日军逮个正着，行动宣告失败。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这数十人并没有遭到处决，只是被抓回本岛而已。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日方或许是为了防范朝鲜俘虏再次行动，便将这伙人拆散各地，鲁认的好友徐景春就被移送到大津城（今滋贺县大津市）。这次失败没有削减鲁认返国的决心，即使是孤身一人，仍旧要继续尝试下去。

天借顺风，便到中华

鲁认没有放弃，他始终无法接受永远地待在日本，因此即使面对种种艰难，仍尽其所能积蓄能量，日日夜夜期盼回返故国。鲁认是幸运的，也可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很快遇到第二次机会，相信这次会紧紧掌握。

一个月后，鲁认打听到一条重要情报，大明官方派遣了一个使节团来到日本，成员主要是福建官员。大明一直以来是朝鲜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合作抗日，更别说鲁认能流利书写汉字，以及吟诗作对的功夫，都可追溯至中华文化。大明官员的到访，真是一个天大的机会，通过这些人，说不定就能趁隙偷渡回家。

一确认大明官员的住所，鲁认当即登门拜访。叩叩叩，开门的是两位福建官员，名叫陈屏山和李源登。鲁认一见到身着大明衣冠的人，仿佛见到朝鲜亲人一般，毕竟两国的服饰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在日本国土见到相同打扮的人，真与亲人无异。在几句问候之下，鲁认表明身份，却没说出哽在喉头的心底话——带我走。原因极为简单，有鉴于鲁认曾经尝试逃跑，日方不仅分隔这群被掳朝鲜人的居所，同时派人就近监视。鲁认拜会大明官员时，身边就紧随一个名叫四郎的日本人。既然如此，自然不好当面表白，否则无异于再次自投罗网。[3]

鲁认似乎没有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尤其是向大明官员求救，当他被

送出门外时，不知心中有何感想。他感到失败吗？白白浪费一次机会？根据仅有的线索，这些都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日方派人监视，鲁认与大明官员之间仍旧有所“交流”，那些没能明言的话，双方都听到了。因为在拜会的隔天，陈屏山和李源登亲自去了鲁认家。

陈、李二人的来访，是鲁认的最佳机会，他立刻表明：“我愿意与你们同船起行，前往中华，我的父母之国，以便为我国报仇雪耻。”（愿与同舟，而得到中华父母之国，以图弊〔敝〕邦雪复之便。　）[(4)] 两位大明官员敬佩鲁认的为人，即使身处异域，仍旧坚持己志，于是答应鲁认的请求，允诺等归期一至，便一同返回中国。

鲁认、陈屏山和李源登的计划很简单，待确定归程，让鲁认先上船，然后一起回福建。然而，这个方案完全忽略日方可能的作为，事实上萨摩藩管理船只往来非常谨慎，为防有人趁机逃离，来日人员一律“团进团出”。同时在港口安排数百人拿着鸟铳、武士刀巡逻，每艘船都会“验明正身”才能离开。面对这样的考验，原先答应协助偷渡的陈屏山率先放弃，他向鲁认说：“日本人必定会检查船只，看这情势难以一起搭船了。”（倭必搜船，势难同　渡。　）[(5)] 原本近在咫尺的成功就这么溜走，鲁认只能待在家，体会那名为失败的难受情绪。

奇策

方法是人想的，再大的困境，都有解决办法。

始终没有放弃的人是鲁认，他找了三位住在附近的被掳朝鲜人，此三人名叫奇孝淳、郑东之、风石伊。鲁认很快取得他们的信任，首先他是一位朝鲜命官，其次他累积了不少钱财，以此备妥酒菜，让他们能够饱餐一顿。接着他道出全盘的谋略，这是最后一搏。鲁认希望三人合作，在大明官员坐船离港之日，能够事先划着小船出海，然后在海上相会。如此一来，便能摆脱日方搜船，又能登上大明的大船去福建。奇孝淳等三人当即应允，一想到能够因此返回朝鲜老家，感激得下跪叩头。

鲁认一方面拿出积蓄，请奇孝淳等人购置粮食、饮用水、煮饭用的器具，以及小船一艘。另一方面向陈、李二人报告新的逃脱办法，盼望双方能够合作。鲁认向二人说道：“我偷偷搭小船，先到十里外的小岛，等日本人搜船结束，你们张帆出海，我再趁机出去，追上你们的船，这难道不是奇策吗！”（我潜乘小艇，先出十里许小岛，以待倭奴搜船后，公等挂帆时，迎出中流，追乘贵船，此非奇策乎！　）[(6)] 两人认同这个

办法，决定向同行的主官福建军门林震虢报告，且得到许可。

就在约定的那一天，鲁认、奇孝淳等四名朝鲜人，准备粮食一百斗，一座炊鼎，三个水桶，划着小船偷偷出海。他们是在陈、李出海的前一天出发的，出航时是黄昏，抵达小岛后是漫长的等待，预计得一直到隔天早上大船才会出来。这一夜四人在船上煮饭过夜，忧虑日方一旦发现他们不见，暂缓大明官员返航的时间。他们是这样度过那个夜晚的。

隔日早上，他们等到了那艘大船，二话不说全力划船追上（促橹如飞 ）。大明的大船知道鲁认就在附近，他们仅将船帆张开一半，好放缓速度，等待朝鲜义士前来。鲁认等人很快地追上大船，并借由船上放下的大绳索一蹬一蹬地爬上，这是离开日本的最后一段距离。

鲁认爬上船后，陈、李争相握手，李边握手边说："你真是命大啊！"并递上一碗白酒，当作是庆祝他逃出生天。鲁认当下肯定是开心、兴奋，不知该怎么说出心里头的感受吧！（陈、李争执公手曰：子命贵矣。即馈白酒，喜气填胸，不食如饱。 ）(7) 几经波折，从未放弃的鲁认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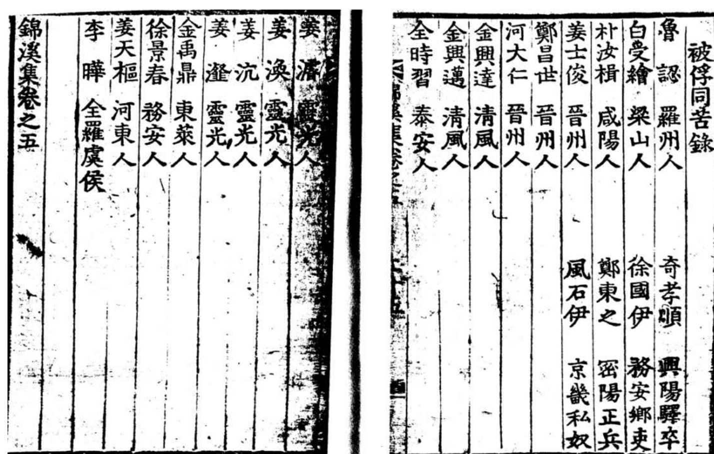

被俘同苦錄
魯認 羅州人 奇孝頤 興陽驛卒
白受繪 梁山人 徐國伊 務安鄉吏
朴汝楫 咸陽人 鄭東之 密陽正兵
姜士俊 晉州人 風石伊 京畿私奴
鄭昌世 晉州人
河大仁 晉州人
金興達 清風人
金興邁 清風人
全時習 泰安人
姜濬 靈光人
姜渙 靈光人
姜沆 靈光人
姜澄 靈光人
金禹鼎 東萊人
徐景春 務安人
姜天樞 河東人
李曄 全羅虞候
錦溪集卷之五

图7　鲁认《锦溪集》中的《被俘同苦录》

这些名字提醒我们，活生生的人被卷入无情的战争中

鲁认安然抵达福建后，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骚动。对于大明官方来说，他们看重的是来自日本的第一手情报；对大明的读书人而言，这不只是一个外国人，而且是曾经亲历战场的勇士，象征着大明援助朝鲜的功绩。每天都有很多大明士人登门拜访，请求他赋诗和韵，大明官员甚至馈赠白银给他，表达敬意。

在福建武夷书院短暂停留后，鲁认一路北上，进京面圣。鲁认在北京光荣地接受万历皇帝的诏书，以表彰他杰出的事迹。万历皇帝甚至赏赐了他一匹马，令他速速回家。他骑着马回家的心情想必又紧张又快乐，毕竟他奉大明皇帝谕令返家，备极光荣。但是，他走到家门时，才发现双亲已逝，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哀痛。英雄返乡，如果没有人分享荣耀，终究是时代的悲剧。

在南原的另一个人：姜沆

鲁认听闻明将杨元被围于南原城，于是奋不顾身前去助阵，因此才有了前述的故事。1597年，日军突如其来的增援，先是在闲山岛大败朝鲜海军，进而剑指南原。鲁认不是唯一接到消息的人，当时一位负责运补粮食、物资的朝鲜官员姜沆（1567—1618）正在前往南原的路上，而他也将踏上一段惊险至极的旅程。

姜沆与鲁认年纪相仿，只小鲁认一岁；不同的是，姜家是地方大族，自高丽时期（918—1392）起，族人历任政府要职。更令人称道的是，姜家盛产读书人，且都是享誉文坛的重要人物，如姜希孟、姜希伯、姜硕德，在当时都是著名的儒者。如果说鲁认武功出色，那姜沆则是具备文人该有的一切特质。除了良好的家庭环境，他天资聪颖，记性超绝，从小就爱读书，五岁时已能写文章，九岁时一夜就通读《孟子》，堪称神童。倘若没有丁酉年的战乱，姜沆想必能够一路在朝鲜朝廷工作，晚年以名儒之誉告老还乡。可惜的是，卷入1597年南原城的，又何止姜沆一人。

1597年，姜沆跟随分户曹参判李光庭（1552—1627）工作，责任是后勤补给。南原城破后，兵荒马乱，他担心长官的下落，四处探听关于李光庭的消息。没想到李光庭早已北上，逃离慌乱的南方。既然主官已经离开，姜沆开始为自己打算，他回到老家灵光（今全罗南道灵光郡），与朝鲜官员金尚宪（1570—1652）集结民众，组成义军，借此抵抗日军侵略，响应者达到数百人。姜沆本来的规划，应是利用这数百人保卫家园，可惜众人一听到日军逼近，“乌合之众，一时星散”。(8) 金尚宪一看苗头不对，也跟随李光庭的步伐，延长战线，出城北上而去。金尚宪不是灵光人，而是安东人（今庆尚北道安东市），他能够说走就走，姜沆这个灵光本地人不禁苦恼起来。

既然组织义兵无望，姜沆一族只得离开家园。伊始本想走陆路，不

料举家逃难者众，道路堵塞，于是找了两艘船，改行水路。这一路上并不简单，先不说为了逃避日军、抛弃家当的慌乱情绪，姜沆一族人数甚夥，总计四十几人，挤在两艘船上，很是狼狈窘迫。不过值此非常时刻，实无太多选择，即使姜沆的父亲容易晕船，或是“船小人夥，舟行甚迟”，[9] 一家人得以安然相聚，已是最大的幸福。

意外仍旧发生了。当时情况不明，对于未来的出处有几个选项：一是舍弃小船，上陆往北；一是开进附近的黑山岛，等战事告一段落；一是投奔李舜臣，一族四十几人为其效力，即使一死，也可以瞑目。姜沆与父兄商量后，决定选择第三方案，前往李舜臣军中。这项决定为一名掌篙的船工得知，这位篙工有四名子女在黑山岛，私心想载他们一起前去李舜臣军中，于是夜半时分，擅自将船开往黑山岛。姜沆发现时，父亲搭乘的另一艘小船已然消失，两船就此分离。姜沆急着找父亲，无奈风向不顺，又不知其确切的去向，无头苍蝇一般了无头绪。他就在沿海寻觅父亲的下落，一日海雾弥漫，突然一艘船从雾中窜出，居然是日本海军。姜沆一船人见到日军，立即跳入水中，希望自尽，不要被俘虏，以便保全名节。

姜家人跳海的勇气固然令人动容，但有时自尽也需要运气。因为他们都在沿海活动，水深不足，致死的概率并不高，加上日军很快地将他们拖上船，人人紧缚，集体自尽的义举最终以被俘收场。更令人心痛的是，姜沆虽然安然无事，但从家中特地带出的亡母牌位却在跳海之后遗失，遍寻不得；而小儿子姜龙、女儿姜爱生则是不幸丧生。战争的悲剧莫过于此，人没有太多可以选择，即使是选择失去什么。

姜沆就这么被俘虏，他们的坐船被日军拖曳着，前往务安县。一如鲁认，沿路的景象是他毕生仅见的惨剧，日军将俘虏集中于此，“船只数千艘，充满海港，白底红圈的旗帜飘扬着。我国男女一起被囚禁着，路旁的死尸堆积如山，四处号啕哭声，响彻天际”（贼船数千艘，充满海港，红白旗照耀天日。我国男女太半相杂，两边积尸狼藉如山，哭声彻天）[10]。姜沆接着绝食，结果与鲁认相同，没有成功。踏上对马岛后，他首先注意到的也是日本服饰，发现“衣装服饰都与我国不同，才知道到了另一个世界”（衣巾皆诡制，始知为他世界也）[11]。姜沆一行人不只是离开灵光老家，而且是远离母国，抵达日本。

好事空凭千里梦

姜沆落脚之处相当于今日的爱媛县，他到日本后，即使壬辰倭乱已结束，仍想方设法返回朝鲜。他曾经与一位被掳朝鲜人合作，趁着夜色时分出逃，一路向西，希望能在岸边寻船离境。两名朝鲜人身处异域，仅凭双脚移动，又无人协助，不免过于天真。两人很快遇到日本军人，没有什么抵抗，即被制伏。

先前提过鲁认也曾几次尝试逃离日本，初次被逮捕后，日方担心这些被掳朝鲜人串联，尽量隔离监视。姜沆亦不例外，他的居所从豫州移往伏见（今京都府），离灵光越来越远。好消息是京都伏见有不少朝鲜读书人，如金禹鼎、姜士俊、姜天枢、郑昌世，以及鲁认的好友徐景春。这些朝鲜士人部分在国内已熟识，通过诗文唱和集结成一个交流圈。对于这群人而言，作诗写字是从小就勉力练习的技艺，不乏日本官人或僧侣向他们讨教。姜沆被视为奇才，程度超迈众人之上，提着扇子来求诗的人络绎不绝。

日本儒者藤原惺窝（1561—1619）就是乘着这个特别的因缘，结识姜沆。藤原惺窝极为仰慕姜沆，向他学习朱子学，这在朝鲜是所有读书人自小钻研的学问。一位朝鲜读书人在日本传播儒学，这毋宁是对战争最大的讽刺。

与日本人讨论儒学，固然是件乐事，然而返乡才是姜沆的心愿，对他而言，回家像是仅存梦中的美事，每天只能凭借着横亘千里的梦境，一遂所愿。于是，当大明官员茅国科和王建功来到日本时，姜沆仿佛在急浪中抓住稻草，试图拼死一搏。

巾车返乡

姜沆听闻大明派人来日，与友人申继李前去拜访。他们利用为日本人写书、抄书累积的财富，贿赂守门人，偷偷进入大明使节的居所。姜沆打的主意跟鲁认一样，想请茅、王二人带他上路。大明官员同情姜沆的遭遇，询问姜沆目前受哪位日本大名管辖，表示愿意与德川家康（1543—1616）协商，安排姜沆返回朝鲜。

茅国科和王建功没能安定姜沆那颗慌乱的心，姜沆转而另谋他路。他与哥哥、申继李、林大兴等人，合资银钱八十文，订购一艘船，预计借此返乡。谁知当工程几近完成，因为申继李漏了口风，为日人所知，众人又遭囚禁。日人认为姜家兄弟不通日文，必定是申继李主谋，于是放走姜沆两人。真是福大命大，姜沆又逃过一劫。

1600年二月，日方释放姜沆等人，他们能够自由活动，这都多亏大明官员的协助。同年四月，姜沆离开伏见，前往对马岛，转往朝鲜，最终于五月十九日抵达釜山。[12] 历经千惊万险，姜沆得以如愿返乡，都得归功于他始终不放弃，不断寻找机会。然而，平安抵家，并得知父亲安然无恙，并未带来多少欣喜。姜沆亲笔记录整段在日本的观察与历程，原本将此命名为“巾车录”。巾车是古代为罪犯专设的座车，[13] 姜沆身为朝廷命官，第一时间未能殉国，竟遭敌军俘虏，在当时被视为奇耻大辱，姜沆曾自承这是“偷生苟活之罪”，[14] 可见其严重性。

朝鲜宣祖尽管有过几句褒奖，但对于这位忠心为国的灵光人，终究是弃而不用。执笔《朝鲜王朝实录》的史官即明白表示，朝鲜宣祖认为：“姜沆向日本人投降，有什么节义可言？”[15] 还有什么比起被君王蔑视，更令忠臣伤心？加上当时日益激烈的朝鲜党争，历劫归来的姜沆已无心于朝政，1602年、1608年断断续续有职缺希望由他担任，但他一概以“罪人”的身份拒绝。姜沆返回灵光，在那里开班授课，教育未来的读书种子，结束一生。如果没有战争，想必他能有不一样的仕途，甚至成为领议政（相当于行政院长）也未可知。然而时光终究无法重来。

战争少了点什么？

透过鲁认、姜沆的遭遇，重新体会壬辰倭乱，那些过去在大叙事下的小细节，慢慢地被勾勒出来。最后，我希望在本章进一步总结，在阅读前述两个故事后，有什么是需要用放大镜仔细端详的部分，并从今日回顾这场战争，反省它在东亚历史上的意义。

综观鲁认和姜沆的故事，尽管他们都是朝鲜人，在母国大地上抵抗日本敌军，却均被掳至日本，这可以理解为意外的巧合，但也不尽如此。鲁认说被俘虏的都是“良家士族”，[16] 也就是出身好的人家，或是两班[17]；姜沆问日人为何俘虏他，得到的答案是：“因为你们一行人都戴着丝质的帽子，身着轻暖之衣，认定你们是官人，于是绑去日本。”（以公等着丝笠，衣轻暖，认为官人，将缚致日本。）[18] 由此可见，他们识得文墨，出身较好，这些条件才是日军没有第一时间痛下杀手的原因。更进一步说，我们能够知悉他们的故事，也源于他们极高的文学素养，借此才能留下如此宝贵的记录。

其次，除却两人不相上下的坚决毅力，始终寻觅机会返回家乡，很难忽略过程不乏雷同之处。例如他们都因为拥有书写和阅读汉文的能

力，累积财富，鲁认借此收买人心，并购置若干食粮，方得以渡过难关；姜沆更是与日本儒者交流学问，汉文以及儒学是双方的共同语言，即使战火也无法掩盖。

最后，朝鲜人对大明的信任或许是最出乎意料的。朝鲜人对大明像是怀抱无比的信心，当大明官员抵达日本，仿佛天大的机会降临。试想一位葡萄牙人、菲律宾人，是否能得到朝鲜人相同的反应？更广泛地分析，不仅是对大明之人怀抱亲切之感，朝鲜人在日本借以谋生的技艺，亦源于对中华文化的学习。不论是书法或儒学，尽管朝鲜拥有自身发展的传统，与中国不尽相同，但鲁认和姜沆称大明将领是天将、天兵，鲁认视大明为父母之邦，再考虑到他们一身满溢汉文化色彩的技艺，壬辰倭乱中的“大明”实在不容小觑。

如果说这场战争少了点什么，我想来自“大明”的声音是最值得着墨的。经由前一章的讨论，固然不应过分推崇大明的大义凛然，动辄称以正义之师，多么义正词严。大明官员对着朝鲜使节质问运粮、出兵的事宜，有时是不假辞色的咄咄逼人，此些内容已如前章所述，不再赘言。即使是派往朝鲜作战的明军，亦不如想象中军纪严明，大明官员曾经坦白地向权挟说：“之前我们军队到你们国家骚扰百姓，十分可恶，你们的民生真是太可怜了。”（前者我军到你国扰害你民，十分可恶，你国民生岂不可怜乎？ ）[19] 甚至认为明军之扰害，较日军有过之而无不及。[20] 大明官方对战争的斤斤计较，以及对朝鲜的质问和侵扰，都是朝鲜方面的困扰，当考虑到明军无偿出兵的义举时，同时应注意到这些历史事实。

2016年，中国与大韩民国合资拍摄电视剧《壬辰倭乱1592》，不免重复这样的格式：朝鲜将军李舜臣的军功、大明的大义凛然、中朝友好，三个元素齐聚在“抗日”的旗帜下。当代关于壬辰倭乱的叙述，“大明”的出现除了呼应国际合作的友好意象，是否还另有可以扮演的角色？更清楚地辨析，站在大明的立场，应该怎么书写壬辰倭乱？那些与鲁认、姜沆相处过的大明官员，那群曾经站在朝鲜半岛上的大明军队，他们的声音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从另一场战争谈起。

那一年，我们站在一起

中国史书对壬辰倭乱着墨不多，甚至称得上漠视。清代一本流行于民间的历史教科书《纲鉴易知录》，从1592年战争开始直至结束，没有

一字提及明朝出兵朝鲜。(21) 即使是出版时间较早的《明史纪事本末》（一本关于明朝历史的读物），为这场战事所下的结论居然是：“若非丰臣秀吉病亡，日本军队解散，七年之间，阵亡军士十余万人，耗费金钱数以千计，后来善后也不得方法，倘若告之国法，有谁能逃干系！”（向非关白贯恶病亡，诸倭扬帆解散，则七年之间，丧师十余万，縻金数千镒，善后之策，茫无津涯，律之国宪，其何以辞！ ）(22) 明朝自然没有丧师十余万，更别说这种评论方式一笔抹杀明军的功劳。不论是《纲鉴易知录》对此事的空白处置，或是《明史纪事本末》的扭曲叙事，壬辰倭乱中的明朝在战后一百年，经历了许多变化，而这都得追溯至一场战争——萨尔浒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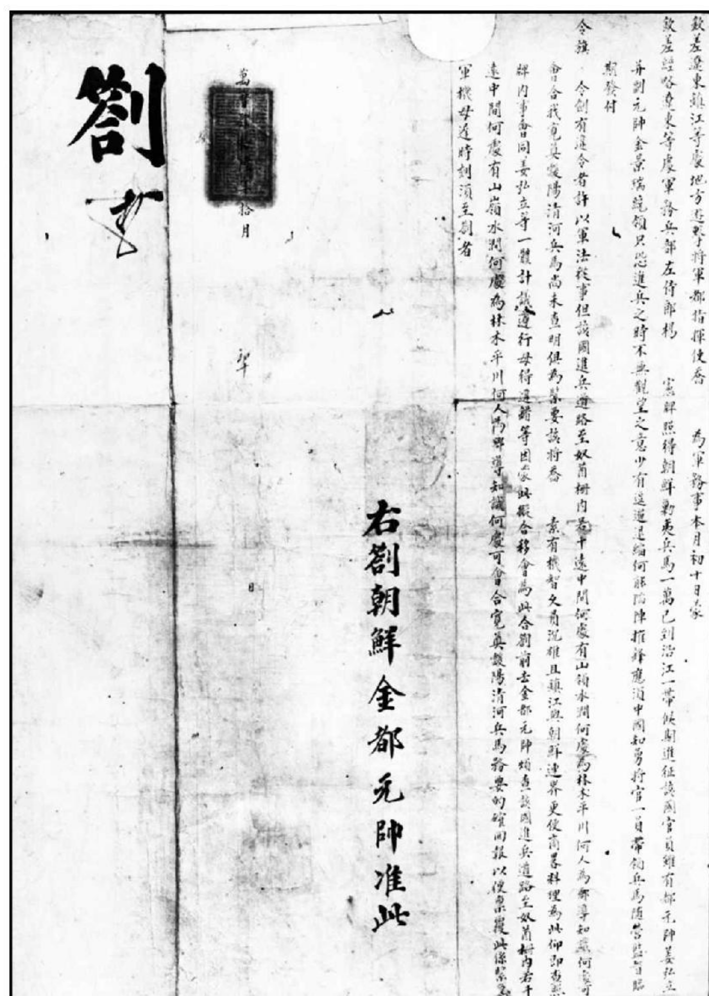

欽差遼東鎮江等處地方遊擊將軍都指揮使喬　為軍務事本月初十日蒙
欽差經略遼東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楊　案驗照得朝鮮勦夷兵馬一萬已到沿江一帶候期進征該國官員雖有都元帥姜弘立
并副元帥金景瑞統領只恐進兵之時不無觀望之意少有逗遛退縮何能臨陣推鋒應須中國知勇將官一員帶領兵馬隨營監臨
牌發付
令旗　令劄有違令者許以軍法從事但該國進兵道路至奴酋巢內若干遠中間何處有山嶺水澗何處為林木平川何人為嚮導知識何處可
會合我兵寬奠靉陽清河兵馬尚未查明俱為緊要該將喬　素有機智文勇況且鎮江與朝鮮連界更便商量料理為此仰即查照
牌內事會同姜弘立等一體計議遵行毋得違錯等因蒙此擬合移會為此合劄前去金都元帥煩查該國進兵道路至奴酋巢內若干
遠中間何處有山嶺水澗何處為林木平川何人為嚮導知識何處可會合寬奠靉陽清河兵馬務要的確回報以便稟覆此係緊急
軍機毋違時刻須至劄者
右劄朝鮮金都元帥准此
劄

图8　《明辽东都指挥使札》

（现藏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这是明朝官员发给朝鲜方面的公文书，时在1618年，正是萨尔浒大战前一年

那一年是1619年，大明与后金（后来的大清）在萨尔浒有过一场大战，大明与女真人较劲多年，迎来此关键性的战役。大明为剿灭努尔哈赤（1559—1626），特地征召一万三千名朝鲜军人，这是继壬辰倭乱之后，两国再次并肩作战的历史时刻。大明主帅是曾总理朝鲜军务的杨镐（？—1629），此外刘綎（1558—1619）、李如柏（1553—1620）等人，均是参与过援朝战役的将领。大抵上，历史学家将此战评价为扭转明、后金情势的关键：大明丧失能够野战的精锐，后金以少胜多，奠定最终的胜利基础。壬辰倭乱的叙事，就是从此卷进明清战争的格局中。

那些曾经亲临朝鲜战场、获得战功的大明将领，数年后踏上萨尔浒，遭遇惨败。清人应该如何评价他们？他们在朝鲜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在萨尔浒失败？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叙事。他们本来就是无能的将领，因此在萨尔浒遭到后金围剿，这是天命所至，因为大清的胜利是不容置疑的坚强。在朝鲜人眼中评价极高的杨镐、刘綎和李如柏，他们的一生在明清交替的变局中，被迫改头换面，以符合清朝官方预期的形象问世。

清代史书不关心壬辰倭乱的理由繁多，首先，自古以来中国史官不乐见在位者开疆拓土，大动干戈，均主张偃武息戈。明代的读书人，援救朝鲜的呼声固然很高，但评价时不免保守，其中包含警示未来君王的用意。再者，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之于不同国家，不尽相同。对于当事者朝鲜王朝而言，这是决定国家存续的战争，朝鲜也确实一度丧失绝大部分的国土，百姓流离失所，因此事后对此的追述与报告，数量甚夥，鲁认和姜沆的文字记录即是其中一种。相较之下，援朝鲜只是《明史纪事本末》之一章，仅是万历三大征之一，与明朝晚期至关重要的明清战争相较，更难以相提并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清人描绘战争的方式拥有更多的弹性，毕竟明朝留下的“遗产”本就不丰富，加之清朝统治者已掌握政权，编写明朝晚期以降的历史，必须考虑到清朝入关的合理性，调整明朝晚期的历史叙事，毋宁是极为合理的安排。

以研究明清之际著称的历史学家李光涛（1902—1984），亦曾针对壬辰倭乱进行深入研究。他在逐页翻阅《朝鲜王朝实录》以及若干朝鲜史料后，写下这么一句心得：“幸而上面有朝鲜国之言为证，否则我们几为《明史》所误。”[(23)] 此语是极好的注解，若仅靠清代产出的历史文献，误人者岂止于清人所修的《明史》？

朝鲜确实保留了丰富的文字记录，但仅靠朝鲜人所写的文字，就趋近于真实吗？清人确实有其考虑，但明代和清代史料就不值一提吗？历史的答案不是套用二分法的问答可以响应的。近年来，倭乱期间明军在朝鲜土地上的为非作歹，以及若干骚扰百姓和官方的恶行，为韩国学界关注。同时，大韩民国的影视作品动辄利用平民百姓，甚或朝鲜国王的角色，宣示着“朝鲜自主”“远离大明”的台词，学术与国情互为表里，一以贯之。

明将杨镐和李如柏曾是朝鲜战场的主唱，如今却沦为配角，乃至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战争期间曾担任领议政的柳成龙（1542—1607），于战后撰写了一本旨在反省战祸的著作《惩毖录》。书中关于“天兵”的描述多不胜数，柳成龙同意能够战胜，必须感谢明军出救，“不然则殆矣”[24]。今日所见的壬辰倭乱，历经萨尔浒之战的洗礼、明清交替的历史格局，以及朝鲜及韩国主体性不断膨胀的历程，其内容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成为今日的样子。中国的历史文献对此的描述固然存在前述的几种限制，但描绘一场三方交杂的历史，本就无法忽视任何一方。鲁认和姜沆曾与大明官员合作，双方充满温情与敬意；大明官员曾对朝鲜使者嘘寒问暖，却也曾直言不讳地指责补给不力、不思反省，凡此皆是历史事实。倘若无法理解一本清代的历史读物中为何缺漏壬辰倭乱的那一页，一如今人只记得李如松勇战朝鲜，却不重视鲁认和姜沆颠沛流离的故事，战争都将少了点什么。

(1) 鲁认：《锦溪集》，卷三，《丁酉被俘》，页一九六。

(2) 鲁认：《锦溪集》，卷三，《倭窟探情》，页一九七。

(3) 必须指出，这段对话，鲁认与陈屏山、李源登的沟通方式系笔谈，并非真的开口说话。

(4) 鲁认：《锦溪集》，卷三，《和馆结约》，页一九八。

(5) 鲁认：《锦溪集》，卷三，《和馆结约》，页一九九。

(6) 鲁认：《锦溪集》，卷三，《和馆结约》，页一九九。

(7) 鲁认：《锦溪集》，卷三，《华舟同济》，页二〇〇。

(8) 姜沆：《看羊录》，页三十一。

(9) 姜沆：《看羊录》，页三十一。

(10) 姜沆：《看羊录》，页三十二。

(11) 姜沆：《看羊录》，页三十二。

(12) 姜沆在日本的编年史，可参见姜沆著，朴钟鸣译注：《看羊錄：朝鮮儒者の日本抑留記》，页二九七—二九九。

(13) “夫巾车固罪人之乘”，见姜沆：《看羊录》，页三十四。

(14) 姜沆：《看羊录》，页十六。

(15)　《朝鲜王朝实录》，显宗九年四月十三日，辛巳条。

(16)　鲁认：《锦溪集》，卷三，《丁酉被俘》，页一九六。

(17)　“两班”即古朝鲜贵族阶级；后文出现的“中人之家”即中等人家。——编者注

(18)　姜沆：《看羊录》，页三十二。

(19)　权挟：《石塘公燕行录》，页二十九。

(20)　“天兵之侵害又不下于倭贼”，见权挟：《石塘公燕行录》，页二十九。

(21)　请参阅吴乘权等辑：《纲鉴易知录》，页二八四三—二八四九。

(2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援朝鲜》，页九八〇。

(23)　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第14页。

(24)　柳成龙：《惩毖录》，页一六一。

第三章　皇明中华的尾声：最后的“朝天使”们

17世纪最重要的“全球新闻”是什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东亚系教授古柏（Paize Keulemans）的答案是：1644年，明朝灭亡。[(1)] 回顾17世纪的世界史，明朝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是不可忽视的话题，不仅盘旋于亚洲邻近各国上空，同时也吸引着欧洲人的目光。曾经有一个时代，它的名字叫作明朝。

暂时不论“明朝灭亡”的意义，或是检讨“明朝何以灭亡”的难题，对于这段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在它轰然倒下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想说的是，在“全球新闻”跃上荧幕之前，倘若重新制作一份完整的新闻报道，应该使用什么标题，摆脱1644年的既定认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述说明朝晚期的故事。

著名的历史学家王汎森曾提醒研究者，探索历史问题时，史家有时会不自觉地将“事件的逻辑”与“史家的逻辑”相混。事实上，阅读历史文献，分析前后脉络，有时我们需要盖上名为“无知”的布幕。因为研究者对“历史”太熟悉，往往会下意识地先入为主，把对于历史线索的关注集中在那些有助于补充“已知”诠释的细节。[(2)] 此番议论，目的不是要推翻“明朝灭亡”的历史事实，亦绝非寻觅出满洲人没有入关的颠覆。历史已然过去，但在观看和审订的过程中，放空一切，重新开始，令人或许能有意外的发现。那么，明朝灭亡之前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明朝立国于1368年，如果以1644年崇祯皇帝（1611—1644）步上景山自缢身亡为止，国祚二七六年。当代明史学者将明朝分为“明初”“明中叶”“晚明”三期，如果特别关注晚明的历史，会惊讶于当时多彩多姿的庶民生活，以及多元创新的思想风潮。尽管各家划定的时段间互有出入，但晚明的起始大致落在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20）两个时代之间。如果从万历元年算起，距离明亡计七十一年，这么一个被研究者视为繁荣强大的时期，却又如此接近谢幕时分，当真令史家不胜唏嘘。

明朝晚期，乃至于明朝末年，一直以来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事实上，生活于晚明的人物，同样程度不一地领略着明朝的魅力，例如1637

年宋应星（1587—1666）曾表示："我很幸运地生活在大明极为强盛的时代，云南的车马能够直抵辽阳，南方的官员与商人能够遨游北方。即使远在万里，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 ）[(3)] 宋应星文字间的自信溢于言表，晚明交通往来之便利，信息传播之发达，令宋应星耳目一新，他像是时代巅峰的目击者，为我们扫去七年后即将亡国的阴霾。

将目光远离中国大陆，还有另一群目击者值得注意，他们是被派往中国的朝鲜使者。在危急万分的壬辰倭乱期间之外，朝鲜使者依旧按照外交惯例，频繁地穿梭汉城和北京之间。这些熟谙汉文化的朝鲜知识人，针对脚下的中国大地留下各种"目击"，这无疑是历史为明朝打开的一扇新窗，透过来自异域的双眼重新检视晚明社会，重访全球新闻发生之前的中国。令朝鲜人印象深刻的晚明，究竟是政治腐败、贪风不止的丑恶时局，抑或是宋应星笔下的"圣明极盛之世"？这是本文企图回应的设问。本章与第四章将围绕着朝鲜使臣的各种"中国观察"，从万历年间启程，直抵清乾隆年间。在本章正式开始之前，唯一恳请读者注意的是，以下活动于明代的各色人物，皆不像你那般真知灼见——知晓明朝将于不久后灭亡。

朝天·朝天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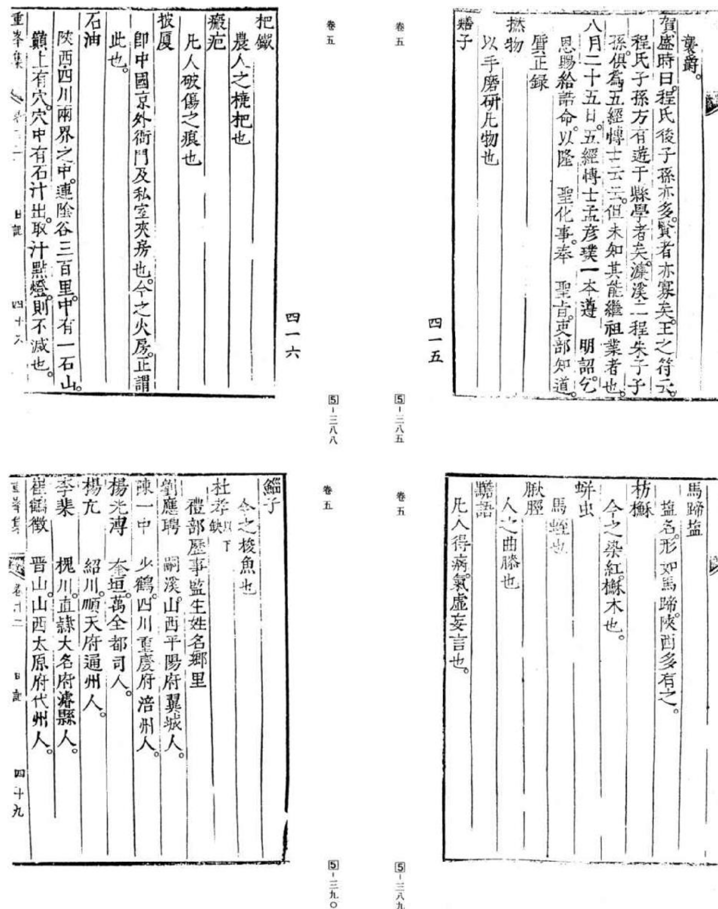
一路以来，赵宪（1544—1592）是越听越感失望，尤其考虑到他担任"质正官"一职，跟随使节团前往中国，更是显得讽刺。这一年是1574年，明万历二年，年幼的万历皇帝甫登基不久，仅仅十岁。不论大明皇帝是长是幼，朝鲜国按照外交惯例，派出使节团，祝贺大明皇帝生日，又称"圣节"。

万历二年的使行是赵宪的初体验，也是最后一次。不同于其他使臣，赵宪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他的职称是质正官，旧称"朝天官"，目的是向大明学习知识，准确无误地理解后，带回朝鲜。曾于嘉靖年间七次出使中国的鱼叔权，[(4)] 针对质正官一职说道："过去前往中国的使节团，会另外派遣一位文官随去，称作朝天官，后改名质正官。命令承政院抄录艰涩难懂的官方用语和地方俗语，交给质正官，询问序班，得到释文草稿而来。"（旧例于赴京使臣之行，别差文官一员随去，谓之"朝天官"，后改曰"质正官"。令承政院抄给吏语、方言之未解者，凭

序班草得注释而来。 ）[5]

朝鲜自立国以来的国策之一，就是引进大明的典章制度，进而修习其学术思想。质正官是一个极佳的佐证，具体而微地呈现那条联系朝鲜与大明的文化动脉，仍充满生机地跳动着。根据朝鲜官方文献《朝鲜王朝实录》，最早关于质正官的记录始于1477年，相当于明朝的成化年间（1465—1487）。 [6] 从那时算起，直至赵宪驾马慢行于辽东的贡道上，这个制度已运行逾百年之久。朝鲜士人研读中国典籍，同时不定期派出使节前往大明，检证各种知识是否正确，寻觅未解之语的答案。朝鲜与大明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或许连身处其中的朝鲜人都难以名状。

然而，赵宪却是越来越感矛盾，即使质正官不如过去受重视，但仍象征着朝鲜向大明吸收新知的意象；更深一层地说，朝鲜借此追随一个最具备中华内涵的国家，期盼自己也能“以夷入夏”，成为中华。嘉靖十八年（1539）出使大明的权拨（1478—1548），当他发现负责外交事务的礼部转给他们的公文中，将朝鲜称为“夷人”，立即表示：“我朝鲜国用中华法度，一改夷狄之风，行之已久。现在看到题本上有夷人之语，深感不安，还请大人稍微考虑一下如何？”（本国用夏变夷，有自来矣。今见题本有夷人之语，窃所未安，望大人酌量何如？ ）[7] 可见朝鲜士人心中，是如此介怀，如此看重“中华”。因此，当中国境内的辽东居民彭文珠抱怨起时政，这对赵宪及同行的使臣而言，真是一大冲击。



襲爵。
賀盛時日。程氏後子孫亦多。賢者亦寡矣。王之符云。
程氏子孫方有遊于縣學者矣。濂溪二程朱子子
孫。俱爲五經博士云云。但未知其能繼祖業者也。
八月二十五日。五經博士孟彦璞一本遵　明詔。乞
恩賜給誥命。以隆　聖化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
質正録
撚物
以手磨研凡物也
糖子

四一五

把鐝
農人之橈把也
瘢疤
凡人破傷之痕也
披廈
即中國京外衙門及私室夾房也。今之火房。正謂此也。
石油
陝西四川兩界之中。連陰谷三百里。中有一石山。嶺上有穴。穴中有石汁出。取汁點燈。則不滅也。
重峯集　卷之十二　日記　四十六

四一六

馬蹄塩
塩名。形如馬蹄。陝西多有之。
枋櫯
今之染紅櫯木也。
蛢虫
馬蜞也
胅脛
人之曲膝也
譫語
凡人得病。氣虛妄言也。

鯔子
今之梭魚也
杜拵　缺以下
禮部歷事監生姓名鄉里
劉應聘　嗣溪。山西平陽府翼城人。
陳一中　少鶴。四川重慶府涪州人。
楊光溥　奎垣。萬全都司人。
楊允　紹川。順天府通州人。
李棐　槐川。直隸大名府濬縣人。
崔鶴徵　晉山。山西太原府代州人。
重峯集　卷之十二　日記　四十九

图9　赵宪《朝天日记》中收有一份《质正录》

（出处：《燕行录全集》）

其中记载了朝鲜人士对中国为之事物的好奇

彭文珠名下有不少田亩，但一如赵宪的观察，彭并不富有，甚至有“穷相”。赵宪不改直肠子的个性，问道：“你有许多田，怎么有穷相乎？”(8) 彭文珠直说都是当地官府的问题，每年征收人头税一两银子，家有十人，就得上缴十两。赵宪念头一转，既然地方官出差错，自然得寻求监察体系的官员协助，于是追问此地的御史是谁。一提到监察御史，彭文珠更是生气，他表示御史是南方人，刚来的时候只是“瘦蛮子”，现在已是“胖蛮子”了。蛮子是北方人讥笑南方人的用语，至于由瘦而胖，指的是吸吮民脂民膏，累积可观的财富。赵宪听罢，认为御史不能弹劾贪官，反而贻害百姓，真是尸位素餐、败德害民。

深感大明吏治黑暗面者，除赵宪外大有人在，同行的书状官许篈（1551—1588）即是一例。书状官是使节团中的高级官员，与正使、

副使合称“三使”或“三大人”。书状官至为重要的任务是在使行结束后，撰写一份报告，又称作“闻见别单”，上供朝鲜国王参阅。因此相较于赵宪，许篈的记录更为细致，具体呈现出当时大明的样貌。

与赵宪一样，许篈越接近北京，越发真实地认识中国。辽东地方官员陈言屡次勒索朝鲜使节，连包裹外交文书的朝鲜纸（俗称镜面纸）都不放过。在许篈眼中，他“状貌狞恶，贪墨自恣”，[(9)] 真是丑恶至极。许篈与中国百姓莫违忠笔谈，亦提及大明赋税之重，此外又有杂役，例如要求无偿提供牛、驴，甚或是替官府酿酒、养官马，层出不穷。苛捐杂税名目之多，以致穷苦人家典子卖女，家破人亡。[(10)] 许篈认为此类官员“总以为百姓是愚昧的，于是放肆地欺压他们”（每以黎庶为蠢蠢，而侈然以肆于其上）[(11)]。当他面对大明官吏公然索贿，只能感叹：“这人只知道贪心，完全不顾廉耻，名为中国人，但其实与野蛮人没差别。”（此人唯知贪得，不顾廉耻之如何，名为中国，而其实无异于达〔鞑〕子。）[(12)] 这实是朝鲜人对“中华”的严厉批判。[(13)]

尽管在北京接待赵宪的中国馆夫直言“今之为官者，宁有不要钱者乎？”，[(14)] 但万历年间的中国似乎尚未走到尽头，真有为官不要钱的人。按照旧例，使节团准备礼品，沿路发送官员，一方面是为自己谋方便，一方面是替朝鲜国积蓄外交能量。行经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照例送到都御史张学颜府上，张只收下礼品列表，并将列表张贴于自宅外墙，上头写着“广宁四面与外国接壤，动辄有损国家清名，我不敢收受贿赂”（四临边陲，动有清名，不敢以贿赂来干）[(15)]。备御指挥使杨大烈和总兵官李成梁（1526—1615）同样不收礼品，兵部职方司主事裴赐仅接受砚台与白米，他表示“米以奉母，砚备文友”，[(16)] 谢绝其余的人情礼物。

除了拒收礼品的清官，也有被治下民众牢记姓名的亲民官。赵宪一行人曾于蓟州（今天津市附近）借宿民居，赵宪向主人家询问是否有“好官”，主人历数三位清勤爱民、性甚劲直、不为非作歹，且深晓民事、决断如流的地方官员。[(17)] 在朝鲜贡使痛批大明吏治之际，不能忘了这些坚持为官有道的人。

国防线上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从辽东绵延至北京的防御设施。朝鲜贡使横渡鸭绿江后，历经一片杳无人迹的大地，沿路山峦叠翠，宛若仙境。稍

稍靠近中国边境，以行政区“辽东都司”为中心，大明耗费心力，建立起数量可观的城寨、哨站、堡垒。朝鲜使者很难不注意到这些坐落于地景上的军事建筑，赵宪即评论道：“自辽东一路往西，每五里就有一座守望台，沿路不绝。台上有小屋，台下有简单的防御措施。按例五名士兵的家庭居其中，每名士兵月薪二钱重的银子。如果是边墙、烽火台的守军，另外补给冬天的衣服。大明养兵的功夫，守御边疆的策略，真是完善！”（自辽以西，五里一台，相望不绝。台上构屋，台下又设小城。城中例　令五丁率家以守之，丁给月俸银二钱。边墙烟台之军，则加给冬衣。其养兵之劳，守边之策，可谓至矣！　）[18] 赵宪对于贡道沿路所见的军备状况，称赞备至。

明朝在辽东一带的防御措施其来有自，堪称国防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有明一代，著名的外患不外乎“北虏南倭”。“倭”指的是日本，侵扰明朝东南沿海省份，后来进一步征伐朝鲜，引发万历年间的朝鲜之役。“虏”则是蒙古，肇因于元朝廷北遁后，势力北退而不散，长期笼罩明朝北边的国防线上。赵宪等人称誉备至的军事堡垒，铭刻着大明和蒙古激烈战斗的印记。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后女真取代蒙古，成为大明的主要敌人，此时朝鲜使者的脚下之地将是大明和后金首次交锋之所。

历史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大明国最终败北，努尔哈赤率领着八旗铁骑在萨尔浒击败明军，辽东都司全部失守。然而，有那么一个耳熟能详的地方，在明朝灭亡之后，仍旧屹立不摇。赵宪认为此处“军用物资，质量精良，数量充足”（军资器械，无不精完　）[19] ，这里就是以山海关为中心发展出的防线。山海关素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因为地势险要，又距北京不远，乃拱卫京畿的军事重镇。

今人或许很难由万历年间的中国直接联想到“军事强国”一词。透过赵宪的眼睛，大明对国防的重视与规划值得注意。他寓居北京时期，夜半时分仍旧听到军队操练的声音，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即使是夜晚，守城部队亦轮番训练，并顺便巡视，以防盗贼。 [20] 每天早晨则固定听到炮击声，系明军日日于射击场演练火器。赵宪表示：“军队每日照常操练，没有一天懈怠，这都是为了维持士气，熟习战技。”（日日如是，无时或废，欲其不忘战也。　）[21] 固然巡守京师一带的军队，必是万中选一的精锐，非驻防地方的部队能比，然而这仍旧有助于理解，大明不惜巨资于国防最前线的实况，尔后在朝鲜与日军一较高下的军事主力，即是辽东军队。

分析朝鲜使者对大明军事的观察，我们不应忘记一点，尽管朝鲜与

大明维持稳定的邦交，这却不代表朝鲜不提防或警戒大明的一举一动。事实上，朝鲜使者巨细靡遗地探听军事情资，如守兵人数、将领官阶，乃至防守的阵势、军资的多寡，显示出朝天之旅的目的除了学习知识，也包括国情观察。这才是与大国相处的真实心态，又敬又防，又爱又怕。

学术话题

“学术”亦是朝鲜贡使关心的话题，在朝鲜读书人心中，甚至可说这更能评断出一国力量之盛衰。学术看似生硬的议题，但从思想状态的脉络考察，学术实是最能使朝鲜、大明产生共鸣的话题。本书登场的朝鲜使者，皆是土生土长的朝鲜人，但他们记录所思所想的文字，大部分是汉文。尽管朝鲜士人不能言说汉语，却为了准备科举（文官考试），自小学习汉文，阅读出自中国先贤之手的儒家经典。试想一个中国人，能够熟练地运用英文撰写散文、诗词、时政观察，语言对他而言，不仅是工具性的存在，更可能影响他自身的文化认同。朝鲜人虽口说今日所称的“韩语／朝鲜语”，读书人却戮力研究汉文学，并以此为品评才华的依据。

既然如此，朝鲜人眼中的大明学术风向，又是如何？对于像许篈这般出身世家并以文学闻名的朝鲜才子，当然渴望能够正式与中国士人分出轩轾。明朝初年沿袭元朝的制度，科举考试允许朝鲜派人参加，洪武四年（1371）就曾有朝鲜人高中金榜。此制度后来因国际政治的问题而取消，许篈深以为恨，遗憾未能参与其事。 (22) 两国在科举的形式、场次和科目上虽有不同，但研读的经典却是相同的，因此许篈的“恨”倒也可以理解，倘若给予时间准备，或真能榜上有名。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与明朝共同分享学术经典的这个现象，在明朝晚期逐渐受到挑战，许篈和赵宪正是此景的见证者。

明朝科举的“指定教科书”本诸儒家经典，在选本与解释上依循程朱理学一脉。然而，长期以来主导学术思潮的朱子学在嘉靖年间遭遇乱流，以王阳明（1472—1529）为首的读书人掀起新风潮，最为简化的解释就是“心学的崛起”。笔者无意涉入晚明思想史的讨论，进行学术性和哲学性的辨析。唯一想指出的是，朝鲜受大明影响，自立国以降就是坚决的朱子学拥护者，最具代表性的两位朝鲜儒学家李滉和李珥（1536—1584）即因大力发展朱子学而受肯定，时至今日两人的肖像更印行韩

国1000元和5000元的纸钞上，备受推崇。

换句话说，朝鲜本就关心大明学术的风吹草动，也一直以能够掌握这些学问感到自信与骄傲。抱持此种心态的朝鲜使者，与沿路认识的大明读书人交流学问，大明的学术却已发生超乎想象的变化。根据几位底层读书人的说法，大明朝廷正准备将王阳明入祀孔庙，意义等同颁给这位朝鲜彻底敌视的学者“诺贝尔奖”。因此，许篈一抓住机会，便向大明读书人严词询问此事，他曾与辽东正学书院的四位生员笔谈，[(23)] 席间表示：“我听说最近王守仁的邪说非常流行，孔子、孟子、程颐、朱子一脉的学问凝滞不通，难道这正统学问即将灭亡了吗？！”（窃闻近日王守仁之邪说盛行，孔孟程朱之道，欝而不明云，岂道之将亡而然耶？！）[(24)] 对阳明之学提出了严正的批判。

相形之下，大明生员的回应，更加激怒朝鲜使者，他们认为：“我国的王阳明老先生，学问源自孔子和孟子，不是什么邪说可比拟的，而且他文章和事功均有可观之处，近来为人们所推崇。”（本朝阳明老先生，学宗孔孟，非邪说害道者比，且文章功业，俱有可观，为近世所宗。）[(25)] 显而易见的是，大明生员认为朝鲜贡使误解王阳明及其学问，于是多有澄清。双方来回往复，始终无法改变对方的立场，许篈送走四人后，不禁感慨：“今时今日，已没有人知道朱子的学问了。邪说四处横行，倡邪说的禽兽大行其道，正道将灭绝，国家将灭亡。”（今之天下，不复知有朱子矣。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26)] 许篈对万历年间的学风，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上，当时大明上下绝非一致赞成王阳明入祀孔庙，朝廷为此争论甚久，由此亦可见反对的声浪不小。[(27)] 赵宪和许篈在相当于大明最高学府的“国子监”与几位学生谈及王阳明，许篈无法理解“何以推崇阳明者众，欲举从祀之典乎？”，其中一位监生回应道：“此亦非天下之通论，南人皆尊阳明，而北人则排斥之，故从祀之议今尚未定也。”[(28)] 阳明入祀孔庙与否，万历二年仍充满未知数，这可以说带给许篈不少慰藉吧！

令人遗憾的是，眼前的国子监生名义上位居全国读书人之首，却没能为朝鲜客人带来一丝好感。朝鲜士人怀慕大明威仪来到北京，国子监、孔庙等代表“中华”的景点堪称圣地。赵宪等人穿上官服，戴上官帽，以最正式的仪态拜访国子监，[(29)] 即是此种心态的明证。然而国子监生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先是当朝鲜客人拿出准备赠送给监生的礼物，监生不顾形象地蜂拥而上，争先抢夺。许篈形容：“诸人杂起，相争

捽夺，无复伦次，余等甚鄙之。” [30] 赵宪则是奚落道：“与以笔墨，则群聚而角之，如恐不及。所谓日日劝讲，而所教者何事？” [31] 怀抱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彻底，许篈离开国子监后，痛骂此地老师不上课，学生散漫，管理者只想着当官，全然不知礼义廉耻！ [32] 这就是万历年间的学术风气，对朝鲜使者而言几近灾难。

万历年间的中国在赵宪和许篈眼中，乱象丛生，与想象中的“中华”不尽相同。那么，离开晚明，走进“明末”，又将是什么景象？

最后朝天

金堉（1580—1658）与李晚荣（1604—1672）是最后的朝天使者，这是莫大的荣幸，却也道出大时代的悲歌：大明即将走入历史。两人于崇祯九年（1636）出发，是时距离亡国不到十年。当时的情势已与万历年间大不相同，辽东已落入金国手中，那批骁勇善战、曾为万历三大征奔驰过的将领大多故去。朝鲜人熟悉的明将如李如松、李如柏、杨镐、刘綎等人，皆已不在人世，事实上大多数的将领就是阵亡在这场名为“明清鼎革”的易代战争中。

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伴随着辽东领土付与敌手，朝鲜使者专行的贡道不复存在，势必另谋海路朝天。这条海上贡道极不安全，李晚荣表示：“海路险恶，船只覆没不断，人们都将奉使前往北京视为必死，因此每当受到差遣，千方百计想要免去任命。”（海涛险恶，覆没相寻，人皆以奉使赴燕为必死之地，每当差遣，百歧图免。 ） [33] 不仅明朝的局势日益严峻，明末朝鲜使者的北京之行亦是危机重重。为保平安，朝鲜使者撰写祭龙王文，并定时于船上祭拜龙王。 [34]

历经风帆之苦，即使平安上岸，1636年的大明并不安宁。满洲人时常犯边，而朝鲜人前往北京的路程，又势必途经某些边境地带。事实上，又有哪里是安全的？崇祯二年（1629）即有先例，边境一带重军固守，皇太极（1592—1643）就曾越过重围，直接兵临北京城下。1636年的朝鲜使者与过去不同，他们不再关注学术脉动和民间风俗，而是紧盯着军事情报，并暗自揣测大明的气运。

满洲人和蒙古人联合犯境的消息不绝于耳，或真或假，时有两军于某处交锋的传言。唯一真实的是炮声，从远处传来轰隆轰隆的炮击声，李晚荣记载炮击声连续不断，有时甚至终日不绝，通常隔一天就得知是何处遭兵，谁胜谁负。 [35] 军事情报，事属机密，朝鲜使者自然不可能

与闻，于是连日不断的炮击像是压力课程，训练听者习以为常。 (36) 为确保前路平安，朝鲜使者想方设法打探情报，或趁着面见官员的机会，当面询问；或招来路旁识字的汉人，收集小道消息。忐忑不安是明末朝天使者特有的心理状态，因为无人知晓明日是否就会遇上敌军。

值此生死存亡的阵地一带，可以想象有时天外窜起一丝火光，接着是阵阵炮声，使者彻夜未眠。想当然尔，生活于沿边的百姓也不好过吧？真实的状况与设想有差距，至少根据李晚荣的见闻，战地居民已然习惯这种生活，即使外头有敌军出没，城防森严，但民众依旧四处玩闹，商店街照样营业，人潮汹涌，面无惧色。 (37) 战争看似没能侵夺太多的日常，金堉和李晚荣二人一同登上通州（今北京市）的高处，满载物资和钱粮的船只来往于南北，未尝止息。 (38) 不管战火如何肆虐，商人仍络绎不绝，牵着猪羊以及军用物资，奔赴前线争利，因此山海关外物资充足，没有沾染太多末世气象。 (39)

明末时不时出现矛盾而充满张力的画面：关外的疑惧氛围，相较于关内的平和，宛若平行世界。北京城内的秣马厉兵无疑是对衰世最好的讽刺，金堉和李晚荣在北京期间，曾前往教场观摩明军练兵。北京西门外的大空地上，骑兵、步兵约一万人整齐有序地排开，雪白光亮的枪刀与日争辉，盔甲鲜明，炮声动地，着实壮观。 (40) 不过京师的雄壮威武无法改变边境烽火四起的事实，朝鲜贡使眼中的景象虽然繁华平和，实则大明的国力已然一去不回，国防最前线的部队员额时常缺兵，甚至有商人和肉贩混入其中，战斗能力令人担忧。 (41)

本就遭朝鲜士人诟病的吏治更是雪上加霜，官员和宦官勒索的行径愈演愈烈。宦官竟然只因为朝鲜译官奉上的过路费太少，公然动手打人，最终加给十两白银，方才了事。 (42) 礼部尚书姜逢元更是屡屡强加勒索，动辄坐地喊价，横生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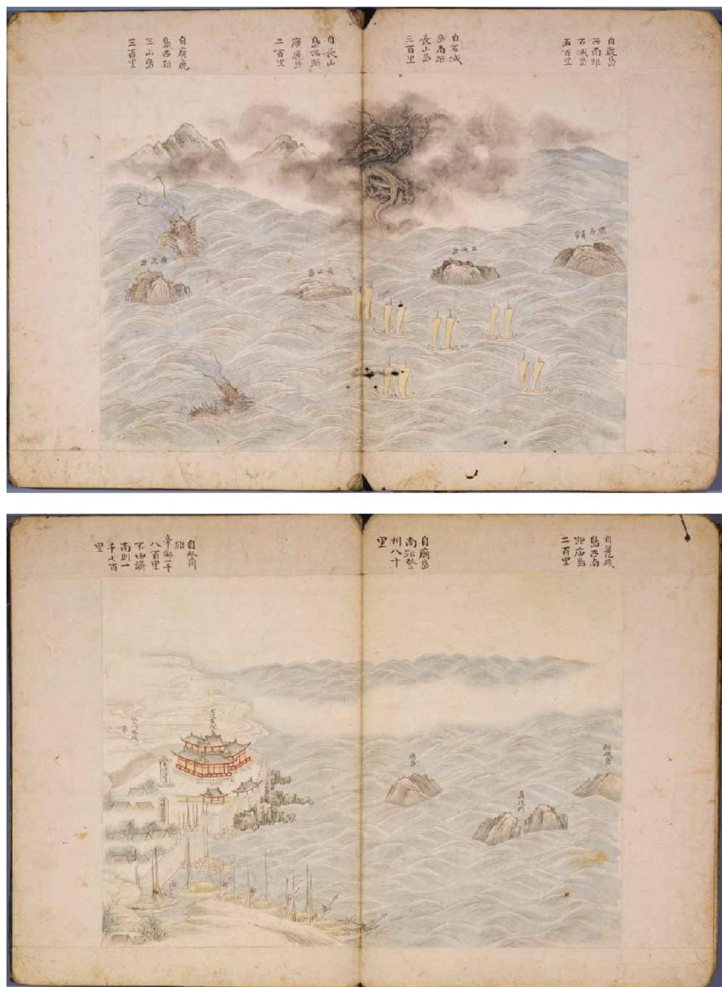


图10　李德泂（1566—1645），《朝天图》

（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OPEN ）

从这两幅图可以体会朝鲜使者循海路前往中国的风光与危险

衰败的氛围像是无意识地靠拢，上天也扔下难题。李晚荣注意到最近几年，中国连续数年发生干旱，又以当年（1636）为最。京城内各行政机关，为缓解干旱而努力，自行斋戒，不食酒肉。民间亦响应，禁屠杀牲畜，禁止饮酒，并四处做起法事。(43) 综合种种迹象，金堉益发不安，痛心疾首地表示：“大明边境之外有满洲人，内部又有流贼，加上天旱如此严重，朝廷大官却只是爱钱，天朝的未来堪忧。”（外有奴贼，内有流贼，天旱如此，而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　）(44) 当时明朝因为经济动荡，民不聊生，有的揭竿起义，成为流贼，最著名者莫如李自成（1606—1645）、张献忠（1606—1647），人数甚众，

为朝廷带来极大的麻烦。更且关外的清同时相逼，大明朝廷单拳难敌四掌，苦苦支撑。[45]

接着是出乎意料的事件，正当金堉、李晚荣停留北京期间，皇太极已提兵十万，再次攻打朝鲜，史称“丙子胡乱”。1637年，朝鲜国王仁祖（1595—1649）最终不敌城外的敌军，走出南汉山城，下跪投降。投降的条件极其单纯而残忍，朝鲜断绝一切与大明的联络，去其年号，改奉大清正朔。此外，还需派遣国王的儿子前往大清，作为人质抵押。[46]当金堉得知此事已是全盘底定之后，留给他的是无限悲鸣。当自己出使国外期间，母国遭敌国侵入，国王受辱投降，并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痛。

最后的朝天之行竟如此终了，不论对明朝或朝鲜而言，都是悲惨不堪的结局。朝鲜与明朝相交二百余年，源远流长，却在尾声同遭不幸，令人心痛不已。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是，朝鲜寄予无限希望的大明，未能在衰颓中奋起，而是持续低迷不振，直至灭亡。朝鲜使者目击了时代的光明与黑暗，是幸与不幸，安排最熟悉中国的外邦人参与这场世纪变局。

线性描述的末世预言

明朝于1644年灭亡，基于这客观的历史事实，史家遍寻文献与史迹，推导出最合理的论述，诠释大明瓦解的来龙去脉。清代的历史学家认为明朝的灭亡，必须归咎万历皇帝的无能，明朝灭亡的起始点是万历朝，而非崇祯朝。[47]受此说法影响，或隐或显，我们习惯“发现”那些有利于凸显万历年间种种乱象的历史证据，宣称大明亡国合道，理所当然。

如果暂时摆脱“全知全能”“预言式”的认知，重新检视万历以降的明朝历史，我们能否寻觅一丝丝“黑暗中的光明”？当时举国惶惶，不可终日，直觉亡国将近吗？朝鲜人历历在目，声言大明危在旦夕吗？我宁可相信世间没有先知的厕身之处，人们随着生活背景与知识水平的差距，各有判断事物的能处。前后矛盾、错综复杂的理解，才是常态分配的舆论环境。

万历皇帝是一位好皇帝吗？受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影响，那位以“不上朝”闻名的皇帝实是“享誉中外”。比起今人，赵宪与许篈拥有更宝贵的机会，亲眼一睹龙颜。赵宪就跪伏在万历帝面前，当皇帝亲自发

声，宴请朝鲜使臣，在赵宪听来，万历皇帝“为外人亲降圣谕，玉质渊秀，金声清畅，一闻冲音，感涕先零，太平万岁之愿，自此愈切”。[48]许篈同样认为“天威甚迩，龙颜壮大，语声铿然，不胜欢欣之极”。[49]且参与朝会期间，深深感到“大一统之美”，[50]可见两人对万历皇帝是一致的推崇。固然赞誉实应归功于实际主掌朝政的张居正（1525—1582），但朝鲜使者眼中的是万历皇帝，又非万历皇帝。对于这两位从未履及中土的朝鲜人而言，皇帝是极其遥远又具体存在的象征，朝见万历帝的过程无异于验证己身所思所学。他们见证的是万历时代的总和，是明朝最吸引人之处，唯其透过皇帝呈现。

赵宪抵达会同馆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当他发现里头放置着一套朝廷发放的棉被，他居然感念大明礼遇外国使节的恩德，坚持将棉被摆放原处，不敢使用。[51]从今人的角度观之，赵宪的决定颇令人忍俊不禁。然而，缺乏同情的理解，无法感受他不使用棉被的动机与决心。正如同朝拜万历皇帝的感动，如果只是纸上的一行文字，那么万历皇帝只能够代表自己，无法象征一个时代。

万历年间的官员，有的苛刻百姓、超收赋税，冠以“贪吏”亦不为过。与此同时，一文不收、两袖清风的清官亦并存于世。我们能找出支持阳明心学的读书人，也能传唤坚决反对的朱子学拥护者。尽管关外炮声隆隆，百姓却坚信守城有方，生活一如往常，商人来往如织，毫无战争的急迫感。堆砌数十乃至上百则关于万历年间官场腐败、民不聊生的史料，只凸显黑暗，却忽略光明。

书写在古代堪称是贵族独占的技艺，因为纸张笔墨获得不易，知识传承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万历年间正是出版业大放异彩的黄金时代，识字率提高，阅读与书写渐渐成为看得到、摸得着的社会资源，由此为史家留下近乎无限的宝藏。[52]学者珍惜每一则来自古代的情报，认真看待，以为这就是“目击”，就是“真实”；却往往过分集中于某些现象，甚或为了凸显“已知”的结果，将剩余的“真实”弃之如敝屣。即使结局一样，我们应该还能说些不一样的故事吧？

回到1630年，明朝灭亡前十四年，一位名叫郑斗源（1581—1642）的朝鲜使者出使大明，在归国后，他撰写了一份报告，准备呈交朝鲜国王。这一年明朝名将袁崇焕（1584—1630）被崇祯皇帝处决，有人说明朝自废长城，亡国自此始。郑斗源的报告是这么说的：“臣在本国时，或见自帝京还来者，问天朝事，甚可忧。臣行山东，数千里地居民妥帖。及到皇都，闻天子雄武，纪律严肃，兵精马健，将相得人。”

(53) 一如金堉在校阅场所见的兵戎壮盛，均是朝鲜使者目击的真实，即使时已深秋，逼近亡国。没有人能预期世界新闻的诞生，在金堉和李晚荣心急如焚地离开北京，踏上归途后一年，1637年，宋应星不正盛赞当代是“圣明极盛之世”吗？明朝就这么灭亡了，夹杂着各种谣言与猜测，轰然崩塌，紧接着才是喧扰纷乱的盖棺论定。

(1) 古柏：《开放世界的传说——作为荷兰戏剧、中国传言和全球新闻的明朝之亡》，第138页。

(2)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3) 宋应星：《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卷序》，页二十三。

(4) 鱼叔权：《稗官杂记》，页六十一—六十二。

(5) 鱼叔权：《稗官杂记》，页十七。

(6) 最早关于质正官的文献，系当时担任“汉训质正官”的金锡元向朝鲜国王呈上的一份报告，见《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八年闰二月十八日，丙辰条。

(7) 权拨：《朝天录》，页三〇七。

(8) 赵宪：《朝天日记》，页一四九。

(9) 许篈：《朝天记》，页七十二。

(10) 许篈：《朝天记》，页一九六。

(11) 许篈：《朝天记》，页一九九。

(12) 许篈：《朝天记》，页八十四。

(13) 关于朝鲜使者利用“中华”的观念批判明朝，最先注意到此问题并深入研究者，为日本学者夫马进，请参阅氏著：《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一五七四年朝鮮燕行使の“中華”国批判》。

(14) 赵宪：《朝天日记》，页二一八。

(15) 赵宪：《朝天日记》，页一六九。

(16) 赵宪：《朝天日记》，页一八六—一八七。

(17) 书写历史的一大目的，是为那些做过正确选择并努力坚持的人留下记录。这些好官的姓名是王名桂（河南怀庆府人）、汪洪（徽州人）、马貌（大同府人）。见赵宪：《朝天日记》，页一九八—一九九。

(18) 赵宪：《朝天日记》，页一六一—一六二。

(19) 赵宪：《朝天日记》，页一八四。

(20) 赵宪：《朝天日记》，页二一七。

(21) 赵宪：《朝天日记》，页二五九。

(22) 许篈：《朝天记》，页一八〇。

(23) 这四人是贺盛时、贺盛寿、魏自强、吕冲和。见许篈：《朝天记》，页一二〇。

(24) 许篈：《朝天记》，页一二一。

(25) 许篈：《朝天记》，页一二一。

(26) 许篈：《朝天记》，页一二五。

(27)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朱鸿林：《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杨正显：《王阳明〈年谱〉与从祀孔庙之研究》。

(28) 许篈：《朝天记》，页二五五—二五六。

(29) “至国子监，余等具冠服。”见许篈：《朝天记》，页二四九。

(30) 许篈：《朝天记》，页二五八。

(31) 赵宪：《朝天日记》，页二四四。

(32) 许篈：《朝天记》，页二六〇。

(33) 李晚荣：《崇祯丙子朝天录》，页七十一。

(34) 金堉：《朝京日录》，页二五五。

(35) 李晚荣：《崇祯丙子朝天录》，页七十六。

(36) 关于炮击的文献甚夥，在此仅引用一条为证：“闻关内之贼到永平府，炮声自关内而来，连续不绝。”见金堉：《朝京日录》，页二六三。

(37) “男女处处游戏，呼卢击球，市肆繁盛，人人按堵，少无惊惧之色。盖其习俗狃于兵革，而守城之具已完备故也。”见李晚荣：《崇祯丙子朝天录》，页七十七。

(38) 金堉：《朝京日录》，页二八二。

(39) “自宁远以西，路上驮载货物及羊猪的，驱来关上贸卖者，百千为群，连续于道。至于南浦，油菜果物，货卖接轸，故关外八城，百物填委矣。”见李晚荣：《崇祯丙子朝天录》，页八十。

(40) 金堉：《朝京日录》，页二七三。

(41) “巡按御史点阅之时，坐肆屠沽之辈皆列于行伍间，军政虚疏若此之甚，极可寒心。”见李晚荣：《崇祯丙子朝天录》，页七十八。

(42) “前行译官被殴呼痛，忙马驰回。棍徒随后驱逐，赤挺交挥，势极苍皇。扣镫旋马退出堑桥边下，坐问之则译辈惊目如环，喘息未定，答曰：守门宦官，以例给刀子纸束银两为不足，作拏如此，此前所未有之事。”见李晚荣：《崇祯丙子朝天录》，页八十二。

(43) 李晚荣：《崇祯丙子朝天录》，页八十八。

(44) 金堉：《朝京日录》，页三一〇。此外，关于明朝晚期的气候异常，请参阅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廖彦博译：《挣扎的帝国：气候、经济、社会与探源南海的元明史》，“第三章 九劫”，第97—99页。

(45) 正是处于此种内外交迫的局势，明朝方才灭亡，倘若面对单一敌人，明亡与否尚在未定之天。相关研究请参阅李光涛：《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

(46) 《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戊辰条。

(47)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首推何冠彪：《清朝官方的“明亡于万历”说》。

(48) 赵宪：《朝天日记》，页二二三。

(49) 许篈：《朝天记》，页二七五。

(50) 许篈：《朝天记》，页二三九。

(51) “馆夫持衾褥来，衾则以绿文锦制之，褥一以红文锦，用碧锦为中以制。又有重褥，置锦毯、棉枕。天朝之所以待我国者至矣，僭不敢居，卷而置之，止铺毯也。”见赵宪：《朝天日记》，页二一八。

(52) 关于晚明出版业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出版门槛降低，以及商业出版蓬勃发展的文化现象，请参阅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

(53) 郑斗源：《朝天记地图》，页二〇六—二〇七。

第四章　清朝灭亡的隐喻：一棵等待盛开的枯木

朝鲜使者口耳相传，贡道必经的玉田县（今河北省境内）一带，耸立着一棵谜样的枯树。因着此树的关系，当地被称为“枯树站”。此树虽名为枯树，却又不是如此，至少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闵镇远（1664—1736）亲自走近树旁，眼前是绿叶成荫的光景。附近的住民相信，女真人入主中原之后，这棵大树立即凋谢枯去，成为“枯树”。倘若有一天，它重新开枝散叶，枝叶繁茂，则“真人当出，而真人出则当定鼎于此地”[(1)]。意思是说，真命天子即将出世，而他将会在此建立霸业，一统天下。闵镇远回忆从汉城出发后的所见所闻，不由得同意谣言，认为布满绿意的路树正是真人出世的信号，大清正危在旦夕。

1637年，清军兵临朝鲜，朝鲜国王仁祖尽管在南汉山城奋力抵抗，最终仍不敌城外的重重铁骑，出城投降。按照大清的规定，朝鲜此后不得再使用大明年号，并与大明断绝一切关系，甚至需派兵援助大清，侵略大明。1637年是一个别具意义的年份，宋应星正赞叹着这个“圣明极盛之世”，朝鲜使者郑斗源也认为大明“天子雄武，纪律严肃，兵精马健，将相得人”。从后见之明看来，两人堪称明朝末期的“乐观派”；事实上不消几年，大清朝廷入主中原，取明代之，成为中华之主。朝鲜尽管有再多的不甘，仍必须接受政治现实的安排，明朝已然逝去，大清成为新的宗主国。

1644年，岁在甲申，从当时大明读书人的立场看来，这真是一场悲剧性的国变。皇帝殉国，蛮横无理的“流贼”与被视为野蛮人的“胡虏”，相继入主紫禁城，天下已不复大明所有。对于那些忠于大明朝廷的人而言，这真是“天崩地裂”的变局，世界在一夕之间改头换面，顿时应验孔子的左衽之忧。满洲人不仅衣着与明朝有别，发式也一改旧俗，颁布“剃发令”，俗谚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正是由此而来。

剃发令在中国尤其是南方激起大规模民愤，今人或许难以理解何以至此，但稍一假设一群外国人主宰本国上下，宣布禁食令，规定各行各业的衣着和发式，即可知道人民愤起的原因并非怀念旧朝，而是深惧那改变既有生活形态的新国。因此，从辽东到北京，从北京到广东、云南、贵州，当地百姓或因为官方组织的抵抗，或为了保卫乡里不受侵

犯，或为了坚守社会价值，以性命为代价，与清军鏖战，保留尊严。这是战火下残酷的真实，也是易代之际令人不忍直视的故事。[2]

朝鲜得知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鼎已革，是一个多月后的事情。朝鲜朝廷收到清廷来函，申明已掌控中国，并简要地交代了事件始末。朝鲜君臣的反应并不比大明读书人小，根据记载，尽管两国断绝音信已久，但一听到此消息，“虽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3]。所有人哭成一团，惶然失措，这同样是令朝鲜人感到阴暗悔恨的一日。

朝鲜人是怎么看待清朝的呢？尤其是延续外交惯例，向“中国”派出的使节团，如何在新的时代审视中国，也端详自己的样貌？闵镇远走近枯木的瞬间，或许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印象，他正等待着真人问世，推翻清朝。那么明朝呢？处于清朝时空的朝鲜人，是怎么想着明朝的？赵宪、许篈、金堉等人夹杂着憧憬、朝圣、鄙视、失望的大明，在灭亡之后又成为什么样的存在？凡此皆是本章意欲申述的故事。[4] 以下，我们将重历清代朝鲜使臣的中国之旅，特别关注他们对于明朝的情感、对清朝的描述，以理解枯木开枝繁茂的深意。

从“朝天”到“燕行”

朝鲜读书人对大明怀抱期待，“愿见中华”之心促使他们参与前往北京的使行团。赵宪的日记名为《朝天日记》，许篈的称《朝天记》，从这种命名方式即可一窥朝鲜使者的想法。他们认为前往大明是朝见天朝，即使如前述所言，他们对中华上国感到失望，甚或起而批判，大体上仍同意大明是天朝，使行即朝天。相形之下，清代朝鲜人不再使用朝天一词，即使偶一为之，意义也全然不同。简而言之，“燕行”取代“朝天”，燕是北京的古称，前往北京，“燕行”的意涵与“朝天”可谓天壤之别。

1637年，朝鲜臣服大清，与大明断交，此后按例向大清朝廷派遣使节团。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朝鲜官方恪守规章、依时履行此类外交义务的文献，证明朝鲜绝无二心。朝鲜官方备妥礼品，拣选使臣，一如既往地处理使行事务，仿佛一切如旧。尽管制度延续，朝鲜满足了清朝的要求，然而在政治制度的表象下，清朝无法控制朝鲜读书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应该注意朝鲜配合清朝的一面，也要思考他们拒绝妥协的一面，两者相互矛盾，却相生共存。

自1644年明朝灭亡后，朝鲜读书人有的放弃科举当官，自闭于家

门；有的逃入深山，自绝于尘世，悼念此剧变。今人可能难以理解这些举动的意义及影响，试想一位准备国家考试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读书人，因为“外国”的政治变动放弃一切，并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余生，这是多么深刻的生命抉择。当代少有人以自己的人生为代价，做出如此张力十足的“表态”。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朝鲜读书人通过今日难以理解的举止，宣泄他们的愤恨与哀愁。

许格（1607—169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许格正直有为，且文章颇为出名，1637年他正好年满三十岁，算是前途看涨的青壮年。许格风闻清军围朝鲜仁祖于南汉山城，急忙召集义兵，希望勤王护驾。不旋踵，仁祖南汉出降，战事终了，许格知道消息后，痛哭失声，赋诗曰：“君臣忍屈崇祯膝，父老争含万历恩。”指责朝鲜君臣居然背叛崇祯皇帝，提醒朝鲜百姓可还记得万历皇帝的恩德。于是他自绝于世，终身坚持不看大清颁布的历书，因为上头已非大明年号。当他知道有人将出使大清，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使者，内容是：“天下有山吾已遯，域中无帝子谁朝？”意思简单明了，中国没有皇帝，你去朝见谁呢？在他心目中，爱新觉罗家族永远不是中国皇帝。(5)

朝鲜读书人为“明”守节、自弃终身的故事，听来或许令人诧异，但许格并不孤独，甚至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个特例。郑栻（1683—1746）出生时，距明朝灭亡已有四十年，但他的行为一如许格，厌恨清朝，“浮游海岳，以终其身”，墓碑上只愿刻“大明处士郑公之墓”，即使他去世时距明亡已一百零二年。仅以这两位“大明处士”如何自处于世，即可明了朝鲜读书人对清朝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大明的依恋不舍。我总觉得，明朝灭亡后，才真正在朝鲜存在。

不论愿意与否，担任使者是政治任命，是外交礼仪，是务必恪守遵行的任务。有的读书人或许可以避免使行，仿效许格和郑栻游山玩水以遂己志，讽刺他人“域中无帝子谁朝”；有的却无从选择，只能踏上燕行之路。在这些使节心目中，一切已然不同，他们表示“此路朝天前日事，遗民思汉至今悲”，或是“今行非复朝天路，随遇空为感旧吟”(6)。颇能道出对时代剧变的感受，明明路是同一条，心理状态却已迥然有别。这就是从朝天到燕行，朝鲜使者去的是北京，不再是天朝。

大明衣冠

朝鲜在制度上学习大明，文化上仿效中华，仔细端详他们的穿着便

一目了然。朝鲜官服的衣制一如明制，可以说是标准的“大明衣冠”。朝鲜读书人对此的自豪溢于言表，衣着打扮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同时也承载了一套文化。按大明的礼仪应对进退，同时搭配这身衣裳，才得以匹配“小中华”的称誉。因此，清代《燕行录》频繁地记录各色人物的穿着，仔细到几近烦琐的程度，这必须考虑到朝鲜人借此凸显自身“有文化”的心态。在大清宫廷中，朝鲜人事后的记述，揶揄讽刺蒙古人、俄罗斯人、越南人，着眼点常以衣着为题，道理正源于此。

明朝灭亡之后，朝鲜使者身上的大明衣冠，像是中国一道少有的风景，别具意义。清人入主中原后，改正朔，易服色，中国人的穿着、发式不再沿用明朝制度。仰慕明朝、敌视清朝的朝鲜人，身穿大明衣冠，履及辽东的贡道，步入北京的宫阙，不啻历史安排的巨大讽刺。在中国的土地上，思念明朝的人来自朝鲜，他们是最能表彰中华的外邦人。

1645年，清人入关的第二年，朝鲜派出使节团前往北京，正使是朝鲜仁祖的儿子李□（1622—1658），书状官是成以性（1599—1664）。这时统领大陆南方的大明势力仍存，鼎革尚未结束，南北对抗仍持续不断。大清朝廷于1644年颁行剃发令，并申斥务必穿着本朝衣冠，后因阻力过大而收回成命。成以性一行人前往北京期间，恰逢清廷官方第二次颁布剃发令。当时信息传递的渠道不若今时，成以性在辽东仍发现“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7] 可见剃发易服尚未严厉执行，汉人的打扮依旧，一如昔日。

这种情况很快改变，清廷为贯彻剃发令，不顾百姓起义抗争，全力镇压，不再复见坚持穿着旧衣冠的人。短短四年后，即1648年，担任书状官的李惕然（1591—1663）行经沈阳，曾有一段奇妙的遭遇。他发现汉人都被驱逐到沈阳城外，于是路旁到处都是汉人。他们就这么穿过人群，继续使行任务，那些汉人就这么看着朝鲜贡使。必须指出的是，朝鲜人在贡道上行走时，官员均穿着正式服饰，也就是大明衣冠。当李惕然与同行朝鲜人的双眼对上汉人时，汉人举起手，抚摸头上光秃秃的部分——那被剃发的地方，并露出感慨惭愧的表情。[8]

顺治十三年（1656），李□再次出使中国，某次刚离开紫禁城，使节因为参与朝参，必须穿着正式的朝服，同样是大明衣冠。李□注意到，市街上的平民百姓看到朝鲜人经过，发现他们穿的居然是明朝衣冠，有的人甚至落泪。[9] 根据李□的经验，“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10]。在李□的时代，中国百姓每见朝鲜贡使的服饰，无不动容落泪。

朝鲜士人自然是鄙夷清朝官服的，朝鲜正祖（1752—1800）曾明白表示："夷狄乱夏，四海腥膻，中土衣冠之伦，尽入于禽兽之域。"(11) 意思是：女真人祸乱中国，导致中国大陆由文明转为野蛮，中华服饰的制度全都消失，国人成为野蛮人的样子。朝鲜正祖的话听来大义凛然，痛斥中原陆沉，这是朝鲜士人的共识，明代服饰象征更高阶的文明，然而意在言外的是，这已成为朝鲜独有的文化特权。

不过仍有人能穿戴大明衣冠，即使他不是朝鲜使节。朝鲜贡使发现，北京城内那些在戏台上登场的各色人物，当演出涉及前朝的故事，允许穿着旧衣冠。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在北京听戏时，注意到台上的角色各有装扮，其中就有明式衣冠，不由得感叹："礼失而求诸野，汉官威仪尽在戏子，若有王者起，必取法于此，可悲也。"(12) 李德懋认为汉官威仪都在戏子身上，未来若有人推翻清朝，必定在此重寻中华法度。他感叹高高在上的中华制度，居然匿踪于读书人看不起的戏班身上，着实可悲可叹。徐浩修（1736—1799）的意见与此相同，他表示："今天下皆遵满洲衣冠，而独剧演犹存华制，后有王者必取法于此。"(13)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明朝灭亡已逾百年，李德懋、徐浩修仍关注大明衣冠，并以此作为评价中国的依据，服饰的魅力与历史意义，远超今人的认知。

在没有中国的地方寻找中国

既然清朝的文化不如明朝，则朝鲜使节的中国旅行无异于一场"缅怀明朝"的盛大演出。他们一路上身着大明衣冠，沿途关注各式敏感的文化物品、历史遗迹，在日记中不时自问——"大明衣冠今何在？"清代朝鲜人的使行，像是对大明王朝的致敬，他们尝试捕捉某种熟悉感，体会一个已然消逝的时代。朝鲜王子李□离开朝鲜前，途经平壤城，他还记得城中的"武烈祠"，也就是"壬辰东征唐将画像处也"(14)，在那儿供奉着万历朝鲜之役期间，几位曾征战沙场的明军将领的肖像，而这是当时的中国人已然遗忘的存在。

朝鲜使者关心明朝，不论是在1644年后尚属去久未远的"新闻情报"，或是去古百年后的"历史传说"，明朝是话题，是前往大清的重要目的。1645年，成以性询问一位名叫高美的汉人，说天下大乱，人为鱼肉，有见识的高人都逃奔何方？又问北京城陷落时，是否有忠于大明的人士为明朝殉节。高美一一回答后，成以性又追问道："君有如许文才，

此后赴举耶？”[15] 试图借此探询人心的归向，是否中国人仍心怀大明，是否人心未死。这像是打听情报，其实说的也是朝鲜人自己的故事，他们想要寻觅志同道合的人，证明吾道不孤，“胡虏”必无百年之运。

有时答案令人失望，高美只是沉默不语，选择回避问题。康熙六十年（1721），李宜显（1669—1745）偶遇一位自称明朝国公后代的汉人常玉琨，他表明祖上是常遇春（1330—1369）的弟弟常维春。常遇春是明朝开国功臣，尤其以击败蒙古人著名，这在明清鼎革之后别具意义，李宜显不禁问道：“你是明朝人子孙，独无思旧之心耶？”玉琨只回了一句：“已顺他人也。”[16] 李宜显的表情想必比玉琨更加落寞。

不论是高美的沉默以对，还是常玉琨“已顺他人”的自白，全都不是朝鲜人期待的答案。无怪乎姜浩溥（1690—1778）认为汉人“全无思大明之意”[17]，尽管途间与一位名叫程㬇的汉人相识，姜浩溥却无意与他称兄道弟，理由是“嫌其剃发胡服，耻与呼弟兄”[18]。在姜浩溥眼中，剃发“胡服”就是野蛮人，同时也是不思念明朝的人，因此不愿深交。

不仅如此，初入境大清时，姜浩溥甚至不愿意看上女真人一眼，并拒绝食用源自大清的食物。朝鲜使节团时常在沿路搭起火架，就地取材，做成简易的餐点。姜浩溥自称，在看过女真人的容貌之后，一股恶心想吐的感觉盘旋心头。傍晚用餐时，他发现烹饪使用的猪肉虽然是随行的朝鲜人调理，但来源是当地买来的，是“胡人之物”，于是嫌其污秽而不愿意食用。[19]

姜浩溥的感受曾是朝鲜使者的普遍反应，他们惊愕于中华的子民不思念明朝，甘心臣服于女真人和蒙古人。讽刺的是，这群以明朝子民自居的朝鲜人，如今却同样得拜倒在大清朝廷之下，行礼如仪。姜浩溥走进紫禁城的太和殿时，清楚记得此处在明代名为皇极殿，是明朝天子接见臣子之处。当他跪倒在地，低身匍匐，心里感慨的是：“胡酋俨然坐其上已可愤慨，况我辈以皇明遗民，平日读经传、讲义理，其自视与视彼也何如？而今乃甘心拜稽于下，俯昂今古，无地洒涕。”[20] 显而易见的是，姜浩溥以明朝子民自居，并对于朝见雍正皇帝（1678—1735）感到羞愧不堪。抱着这种念头的人不只姜浩溥，1732年，韩德厚（1680—？）向皇帝行大礼时，不免感慨：“以我衣冠礼容，屈膝于犬羊之庭，追念皇明盛时，感愤之怀，自难抑也。”[21] 身着大明衣冠，扑倒在女真人的宫阙下，想必极不是滋味。

走进朝鲜使节的内心，就能稍微理解枯树枝叶繁茂的意象，对他们而言别具深意，同时多少也能透析他们的言谈与举止，追问其动机与用

心。李□对武烈祠的描述看似随笔带过，在我看来其实是有意识的行为，与此类似的例子甚多。同样在朝鲜境内，前往北京的贡道上，路旁有一座小馆，李德懋记得此处是明朝使者来朝鲜的必经之地，朝鲜和明朝的官员在此赋诗唱和。馆旁一棵长约一丈的松树下可容二十余人依地而坐。令李德懋遗憾的是，越来越少人认识这株松树，明朝灭亡以后，“无人识此松”。[22]

清廷派往朝鲜的使节，可能早已遗忘松树的典故，朝鲜却拼命想铭刻脑中。他们在中国境内移动时，多方注意各种与明朝有关的遗物，可能是一块匾额、一座碑铭、一列牌坊。尤其辽东一带是明清鼎革交火的热战区，朝鲜使者是唯一凭吊古战场的游人，借此寻觅明朝的踪迹。李宜显曾巡礼山海关外松山、杏山等处，他在附近找到一块明代立的碑文，是万历皇帝为嘉奖辽东官员王盛宗、王平父子而立。他发现碑文中有二字遭到挖空，按上下文判断，被去除的字应是“奴酋”二字。朝鲜使者或许是少数注意这块碑铭的路人，也是发现明朝的用语遭到时代挤压、渐渐消失的见证者。[23]

松山、杏山一带至关重要，这是山海关外重要的防守据点。明朝将领洪承畴（1593—1665）曾与皇太极在此对峙，争夺这些城寨的主导权。这场名为松锦之战的结局，清军大获全胜，洪承畴向清军投降，此后成为明朝的敌手。1721年，李宜显仍记得此处经历的故事，他说皇太极得到“松杏之后仍长驱，席卷天下之势，遂至于不可支”[24]。又有多少清人行经此处，从这样的角度看待古战场的历史意义？

李宜显对山海关外的堡垒情有独钟，因为这里不仅是明清两国的拉锯场，也是朝鲜国的伤心地。皇太极攻打松山、杏山、锦州一带，时在1639年，朝鲜已臣服清军，有义务出兵协助大清朝廷的南下之行。朝鲜王子李□站在松锦城下，忆及“清主征吾东数千精炮，替戍四五年”，在此处与皇明中华鏖战。李□不禁感叹：“东方将卒纵怯清人威令，含羞赴敌。国家数百年养兵，未用于当用之时，反用于不当用之地。”[25]朝鲜的养兵之功，居然付诸此地，用以对付大明，令思念大明的使臣心痛。李□眼前的杏山堡，满目疮痍，百姓萧条，不知他是否感到一丝罪恶？

孝宗北伐

朝鲜国不是没有二心，也曾计划反击，消灭清朝，最著名者莫过于朝鲜孝宗（1619—1659）的北伐雄心。朝鲜孝宗是仁祖之子，李□的哥

哥，曾在沈阳作为人质，以证明朝鲜有求和之心。在沈阳作质的岁月令孝宗更了解清朝，却没能让他钦慕大清朝廷。返国后，他召集各色以反清著称的朝鲜读书人，其中以宋时烈（1607—1688）为代表，极力宣扬反清思想。

1659年，朝鲜孝宗召见宋时烈，屏退左右闲杂人等，向宋时烈表明："今虏有必亡之形，前汗时，兄弟甚众，人才亦多，而专尚武力；今也，兄弟死亡略尽，人物皆笃下，兵事渐弛，颇效中国法制，且虏主荒于酒色，其势不久，此所谓必亡之形，予料之熟矣。天下事未可知，正宜无失其几，故欲养精兵十万人，俟衅而动，直抵关外，则中原豪杰必闻风而起，吾国子弟之为虏俘者，亦岂无为我内应乎？"[26] 孝宗意图准备精兵十万，攻打清朝，他深信大清败象已露，且关内的中原豪杰必定响应义举，大事可为。

孝宗北伐的雄心壮志没能化为现实，他在同年死去，这股热诚像是流星，转眼即逝。即便如此，这颗流星闪耀的光芒仍提醒无数朝鲜人，我们不仅思明，更且有颠覆清朝之志，尽管那是一项未竟的志业。姜浩溥看着女真人络绎于途，心中便想着，若孝宗北伐成功，这些野蛮人必定不容见于中国。即使他明知这"虽设意妄想，而颇若爽快矣"[27]。脑海中的幻想，也能令他心旷神怡。姜浩溥的自白直截了当，但就是这股豪气相对于燕行的苦闷，道出朝鲜使者心底的纠结心绪。韩德厚感慨自己得跪拜于胡虏之廷，也很自然地想到孝宗北伐，称誉"孝庙薪胆大志，昭乎日星。皇天假年，大计终成，则吾辈今日亦岂有此行"[28]。若孝宗北伐成功，今日何必燕行呢？

图11　宋时烈肖像

（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宋时烈以提倡激烈的思明论述著名，他同时是朝鲜孝宗尊以为师的官员，可以说是思明的典范人物

孝宗北伐的故事，一方面照映出朝鲜厌恶清朝的面向，一方面也透露他们审视大清的心理状态——危在旦夕。照理推断，亲眼目睹大清景况的朝鲜贡使，是朝鲜国内的中国专家，最明了中国实情。然而，细细品味朝鲜使者的“中国报告”，却不若此想。如果说朝鲜使者对清朝初期的国势判断，受限于明清鼎革不久、人心不稳的现状，加上后来三藩之乱的变动，难有准确的掌握。但有意思的是，被视为盛清时期的乾隆年间，却也被朝鲜使者当作随时必有大乱的危局。乾隆九年（1744），朝鲜英祖（1694—1776）询问燕行使赵显命（1690—1752）清朝实情，显命居然回答：“外似升平，内实蛊坏，以臣所见，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29] 认定中国不出几年，必将大乱。乾隆年间出使中国的另一使者洪大容（1731—1783）也曾询问清朝读书人：“闻说中国多灾异，民心多动，未知实状如何？”[30] 因为野蛮人“胡虏”不谙中华文化，无法治理中国，自然民心多动，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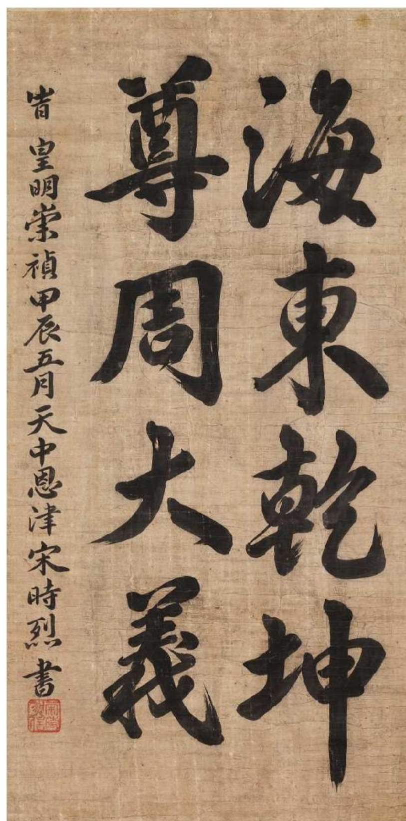


图12　宋时烈的墨笔：“海东乾坤，尊周大义”

（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这八字像是浓缩了一个时代的精神

按照这种认识，清朝自然一无是处，沈念祖（1734—1783）燕行归国后与朝鲜正祖曾有一次谈话，当提及清朝时，沈表示：“万里中土，尽入腥膻。所尚者，城池、甲兵；所重者，浮屠、货利。华夏文物，荡然扫地，甚至大成殿廊，便作街童游戏之场。檐庑荒颓，庭草芜没，而未见一介青衿之在傍守护，见之，不觉于悒。”[31] 在他眼中，清代中国专尚武力，重视佛教，热衷营利，忽略文教，全然与中华上国的形象不同，中国已不是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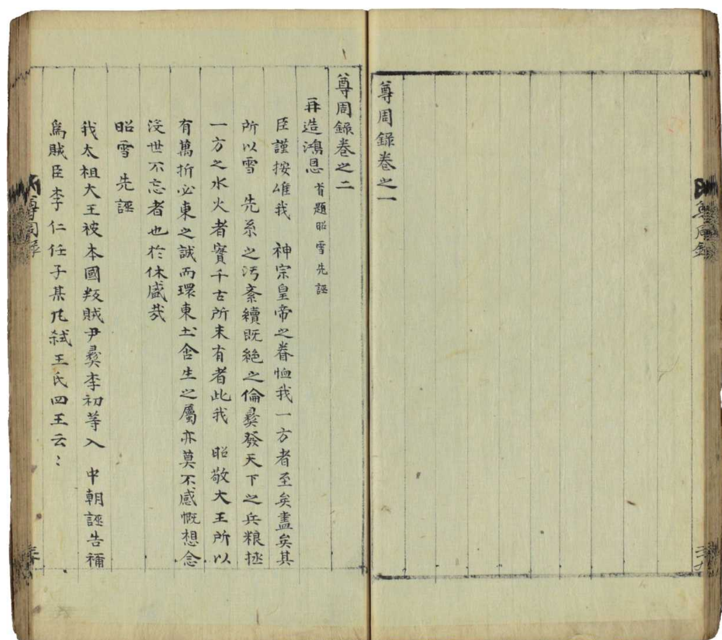
一开始是轻视大清朝廷的治理能力，接着是批判清朝的一切，最终甚至连中国擅长的文学也遭到抨击。韩德厚直言：一路上认识的读书人，通晓文字者并不多见，或有一二位拥有功名者，却都“蠢蠢贸贸，无足与语。中华文物无地可寻，足令人酿涕也”[32] 。中国读书人无能，中国没有半点中华文物，令朝鲜人失望透顶。更有甚者，朝鲜人认为满洲人治下的汉人，已然忘却老本行，导致“近来满洲文学反胜于中华”[33]

。

正是缘于孝宗北伐的典故，以及对女真人先入为主的偏见，朝鲜对清朝不仅语多鄙夷，且难以正眼直视清朝的实状，做出合理的判断。这是难以苛责的历史情境，因为任何人都可能囿于己见、拥抱成见，甚而错过真实，这是人性使然。

寻根：万历皇帝与思明

寻找朝鲜思明的根源，很难忽略万历皇帝。这位在中国史上毁多于誉的太平天子，居然是朝鲜对于明朝情感的重要目标，想必这是当时人们始料未及的事态。在明朝灭亡之前，因着壬辰倭乱的卫国之功，朝鲜上下莫不感恩戴德，将万历皇帝的恩德誉为“再造之恩”。1644年后，一部流传甚广的朝鲜私撰史书《尊周录》其中一卷即专载此事，卷首明确地表示：“惟我神宗皇帝之眷恤我一方者至矣、尽矣。……发天下之兵粮，拯一方之水火者，实千古所未有者，此我昭敬大王所以万折必东之诚，而环东土舍生之属，亦莫不感慨想念，没世不忘者也，于休盛哉！”(34) 通篇感念万历皇帝的恩德，因为是他指挥天下兵马，拯救朝鲜于危国边缘。朝鲜社会一个世代一个世代接力，传承这份永世不忘的想念。


尊周錄卷之一

尊周錄卷之二
再造鴻恩 首題昭雪先誣
臣謹按惟我 神宗皇帝之眷恤我一方者至矣盡矣其所以雪 先系之污蔑續既絶之倫彜發天下之兵粮拯一方之水火者實千古所未有者此我 昭敬大王所以有萬折必東之誠而環東土含生之屬亦莫不感慨想念沒世不忘者也於休盛哉
昭雪 先誣
我太祖大王被本國叛賊尹彝李初等入 中朝誣告稱爲賊臣李仁任子某凡弑王氏四王云云

图13　《尊周录》书影

（来源：早稻田大学古典籍数据库）

万历皇帝是一个极佳的话题，在这个时代发生壬辰倭乱，明清动乱亦由此始，那些遭逢鼎革的明朝人和朝鲜人，大多生长于万历年间。夸张地界定，万历之后才是朝鲜与中国深切交往的开始，承先启后，奠定入清后的心理状态。如果没有壬辰倭乱，朝鲜君臣是否会如此思念明朝，值得思量。

然而，历史不能只有同情的理解，必须兼具批判的眼光。思念明朝的根源可能来自万历皇帝，尤其是壬辰倭乱，但朝鲜上下对万历帝的推崇不无疑义，部分必须归诸历史的浪漫。沈念祖向朝鲜正祖说孔庙的大成殿廊成为孩童嬉戏之所，没有见到什么人看守，揆诸清廷崇儒尊孔的史实，自然是信口开河的谎言。

即便真如韩德厚所言，清朝的孔庙荒芜，儒风扫地，一无可取之处，我们也不应忘记，万历年间出使的许篈，不正批判国子监道："师者倚席不讲，为弟子者散处闾阎，祭酒、司业以骤升大官为念，监生、岁贡以得添一命为荣。慢不知礼义廉耻之为何事。"[35] 万历十五年（1587），裴三益（1534—1588）也说国子监："闾阎下贱阑入其中，圣庙卓上或有超乘踞坐者。所谓冠儒冠者皆贸贸无知，有欲得笔墨者，行囊才解而争乞不已，既或得之而犹求无厌，殊非所望于中华礼义相先之地也。"[36] 这幅景象与清代朝鲜人耻笑的清朝读书人相距不远。

沈念祖又说清朝重视佛教，这对崇敬儒学的朝鲜而言，不啻异端邪说。沈念祖却忘了许篈曾惊讶于明朝"最尚异教淫祀，每村必有一寺，或有三四者，谓之庙堂"[37]。许篈也承认北京城附近各种寺庙、道观所在多有，颠覆过往将大明视为中华文物礼乐集散地的想法。沈念祖的言论固然属实，难道明代的朝鲜使臣公然撒谎？事实是人总会选择性地记忆，同时选择性地遗忘，两者都是真实，都是选择性的真实。

从荒凉到繁华

花开花落本是天理循环，枯木又绿可能受气候变迁影响，或是人为照顾有加，朝鲜使臣却归诸真命天子即将出世，推翻大清王朝。走笔至此，多少能够体会闵镇远何以深信枯木预言，因为这为当下的忍辱负重找到了宣泄出口，抚慰思念明朝的人，你还可以继续等下去。今人看来荒谬的念头，其实缺乏同情的理解，古人深信的执念，皆非无稽之谈。

传统中国的当权者看重“祥瑞”，也就是天候和物种的变异，他们相信种种天变物异的征兆，是上天赐下的警讯或赞赏，皆具深意。雍正十年（1732），韩德厚寓留北京使馆期间，山东省巨野县一户人家有牛只产出麒麟，地方官府连忙作贺表，奉送雍正皇帝。传说麒麟为龙所产，是著名的祥瑞之兽，韩德厚却不作此想，他认为：“当此天地易位，华夏腥膻之时，不应有此。况牛生獜，灾也，非祥也。”(38) 明朝灭亡后，由非汉人的满洲人统治中国，天地本上下各有定位，现已易位，倒转颠覆，即世界不按原本的逻辑运作。因为天地易位，祥瑞不再是祥瑞，而是灾异，是不祥之物。

朝鲜使节沿着贡道的各种历史巡礼、感叹，其时间之长久，坚持之顽固，令人啧啧称奇。从1644年算起，姜浩溥开始不吃猪肉的年头是1727年，韩德厚不甘跪拜于大清朝廷下是1732年，他们出生时均距明朝灭亡三十年以上。三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两人父执辈的世代都曾经历过1637年的惨剧，目击过明朝灭亡的瞬间，这还不是远离他们的历史，而是口耳相传的故事。照理说燕行就是考验所见所闻的试金石，流言蜚语至此都能戳破，真相将一一浮现。

他们见到什么？

李□目睹无数无名尸汇聚而成的万骨冢，这些都是被清军屠杀的百姓。(39) 姜浩溥途经高桥堡，此后百余里之间是古战场，也就是松锦杏一带。姜浩溥抵达时已是1727年，他说当地仍“白骨累累于荒溪野草之间，冤气郁结不散，凄惨愁寂”。(40) 此处远离都市，连收尸之人都没有。相较之下，韩德厚没有提到白骨与无名尸，仅见“崩城败壁，断柳枯苇，一望萧然”(41)。虽比白骨累累好，但断垣残壁与渺无人烟的荒野，带来的也只是暮世的沉重氛围。评断朝鲜人思念明朝的文化现象前，不能忽略这些沿路的“风景”，这像是唤醒记忆的特殊装置，重播明清鼎革的战争桥段，以及那段朝鲜身不由己的历史。

当然，他们能看到更多。

姜浩溥抵达永平府时，称赞此地“闾阎市肆极殷富，城郭楼台亦宏壮”(42)。一进北京城，更是不得了，“市肆之繁华，人民之殷盛，自辽东而来所未见也。既入城，壮丽魁岸，生理豪富，物资委积，左右列肆亘十里于城之内外，炫目如画图”(43)。真是“天下壮观”！(44) 辽东永平府已令姜浩溥惊奇，作为首都的北京自然是更上层楼，被这位思念明朝的过客寓为天下最壮观的美景。

即使是悲情的战场，也能寻出生机。乾隆五十五年（1790），徐浩修在山海关一带参观古战场时，虽然还能回想起明将戚继光（1528—1588）、李成梁等“抗虏”英雄，却不由得承认“边尘之不警已百余年，见今田畴相连，鸡犬相闻，昼行夜宿，毫无戒惧。三卫百战之地，悉变为乐土，此历代所不能得也”(45)。原本充满血泪的回忆地，已经田连阡陌，鸡犬相闻，一片和乐升平，徐浩修更指出这是过去未曾出现的荣景。

累累白骨能够被义士逐渐收拾干净，或堆叠于草丛间，腐朽于地下。残破的宫阙与城池能够修复，市肆街坊能够重获生机，百姓能够耕种收成，一切重新开始。想象悲情是朝鲜使者的特色，他们的所见所遇有天造地设的安排，促使维持思念明朝的激情。同时也有参访当时最繁荣城市的机会，亲眼见证大清王朝鼎盛时期的伟业。我们应当注意朝鲜敌视清朝的一面，但同时还有另一面紧逼而来。他们还能看到更多更多，总有一天，一如李德懋感慨清朝使者不识此松，朝鲜使者也将忘却枯木开枝的意义。

(1) 闵镇远：《燕行录》，页八十二。

(2) 关于明末清初的研究，请参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洪业：清朝开国史》；顾诚：《南明史》。

(3) 《朝鲜王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五月七日，甲午条。

(4)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本文受此启发甚多，以下主要参考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97—1800）》二书；以及拙作《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1600—1800）》。

(5) 关于许格的生平，主要参考金钟厚撰写的行状。许格在得知朝鲜臣服后，奔上小白山，北望痛哭：“中宵起视众星繁，历历犹知北极尊。开辟从来几宇宙，帝王今日各乾坤。君臣忍屈崇祯膝，父老争含万历恩。青史莫论当世事，天无二日仲尼言。”自后废举子业，“常读春秋以寓志，不观胡清历”。每当“语及皇朝事，泪如雨下”。见金钟厚：《本庵集》，《沧海处士许公行状》，页五五四—五五六。值得注意的是三月十九日对明遗民同样深具意义，如杨照（1617—1692）的《三月十九日》云：“身是崇祯士，生在万历年。……故国能无念，今朝倍怆然。”见杨照：《怀古堂诗选》，页四十四—四十五。

(6) 这两首诗转引自张伯伟：《名称·文献·方法——关于“燕行录”研究的若干问题》，收入《“燕行录”研究论集》，第6页。

(7) 成以性：《乙酉燕行日记》，页六十七。

(8) 郑昌顺等编：《同文汇考·补编》，卷一，页七。

(9) 李𡎜：《燕途纪行》，页九十七。

(10) 李𡎜：《燕途纪行》，页一四八。

(11) 《朝鲜王朝实录》，正祖三年二月十四日，己巳条。

(12) 李德懋：《入燕记》，页二三五。

(13) 徐浩修：《热河纪游》，收入《燕行录全集》，册五十二，页四四一。

(14) 李□：《燕途纪行》，页三十三。

(15) 成以性：《乙酉燕行日记》，页七十。

(16) 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页一八七。

(17) 姜浩溥：《桑蓬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册十四，页一九三。

(18) 姜浩溥：《桑蓬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册十四，页二八四。

(19) 姜浩溥：《桑蓬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册十四，页八十一。

(20) 姜浩溥：《桑蓬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册十五，页九十一。

(21) 韩德厚：《燕行日录》，页二四三。

(22) 李德懋：《入燕记》，页二〇九。

(23) 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页一八八。

(24) 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页一八八。

(25) 李□：《燕途纪行》，页八十三。

(26) 成海应等编：《尊周汇编》，卷五，《皇朝纪年第五》，页四〇〇—四〇一。

(27) 姜浩溥：《桑蓬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册十四，页二〇二。

(28) 韩德厚：《燕行日录》，页一八六。

(29) 《朝鲜王朝实录》，英祖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丙子条。

(30) 洪大容、李德懋：《乾净衕笔谈·清脾录》，页四十七—四十八。

(31) 《朝鲜王朝实录》，正祖二年七月九日，丙申条。

(32) 韩德厚：《燕行日录》，页二〇七—二〇八。

(33) 徐浩修：《热河纪游》，收入《燕行录全集》，册五十二，页二五九—二六〇。

(34) 李泰寿、李寿彝：《尊周录》，卷二，页30a。

(35) 许篈：《朝天记》，页二六〇。

(36) 裴三益：《朝天录》，页三十八—三十九。

(37) 许篈：《朝天记》，页四八一。

(38) 韩德厚：《燕行日录》，页二三三。

(39) 李□：《燕途纪行》，页一〇二。

(40) 姜浩溥：《桑蓬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册十四，页二〇三。

(41) 韩德厚：《燕行日录》，页一九九。

(42) 姜浩溥：《桑蓬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册十四，页三一四。

(43) 姜浩溥：《桑蓬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册十四，页四〇三。

(44) 姜浩溥：《桑蓬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册十四，页四〇九。

(45) 徐浩修：《热河纪游》，收入《燕行录全集》，册五十一，页三八七—三八八。

第五章　燕行即世界：18世纪的“中国袭来”

任迈（1711—1779）的肖像完成于1777年，即乾隆四十二年，朝鲜正祖即位的第二年。这幅布局简单、笔触细致清新的小像，出自朝鲜画家韩廷来之手。关于任迈和韩廷来的文献记载不多，然而图画中自有故事可寻。先看任迈头上的“幅巾”以及“网巾”，这种穿戴方式其实源自明朝，是明代读书人流行的装扮。承续前章的讨论，朝鲜人对明式衣冠的“习以为常”，其实隐隐支撑着“清国灭亡的隐喻”成长茁壮。毕竟，清朝厉行剃发，臣民不需“网巾”整理头发，举目所及的“差异”提醒着观看者与被看者，他们身份有别。清朝百姓不是朝鲜人理想中的“中国人”，可谓一目了然。



图14　任迈肖像

（成于1777年，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大明衣冠在朝鲜的普遍流传，容易被塑造为感人的思明故事，他们因为爱戴明朝，矢志不渝，终身穿戴明式服装。正如前章所言，明朝服饰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同时承载大明和朝鲜两国的历史，并体现朝鲜读书人的思想文化。但是，这不是审视这幅赞像的唯一方式，我更倾向于将这身打扮理解为朝鲜式的。朝鲜学习“中华”的生活方式与学术思想，诸多成果具体而微地以画中的模样呈现；将朝鲜理解为勉力吸收中华文化并荣膺卓越成绩的选手，实更为恰当。明代朝天使臣对天朝上国的猛烈批判，正凸显朝鲜在这个名为“中华”的阶梯上勇往直前，大明是竞争对手，而不是衡量文明强弱的全部。

让我们重新看待任迈的肖像，如果说幅巾、网巾、深衣，以及桌上的朝鲜书籍，均是名副其实的“朝鲜制造”，那么有什么值得注意，可置于本章以“燕行即世界：18世纪的‘中国袭来’”为名的讨论中？图画中唯一不出于朝鲜工匠之手者，或许是桌上那副眼镜，它来自清代中国。画中的眼镜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这提醒我们，即使清朝灭亡的隐喻弥漫士众之间，即使将清廷视为胡虏的轻蔑众口一声，“中国”宛若洪水猛兽，依然漫天而来。朝鲜燕行使与清朝读书人交流学问，观察中国国情，带回的是针对政治局势和学术思想的文字报告。与此同时，各式货物商品依随人流，来回往复，出现在任迈的桌案上。

朝鲜使者基于“清朝灭亡的隐喻”，以及思念明朝的种种情绪，对清代中国的观察大多较为负面，这是理解赴京使行的重要面向，却不是燕行的全部。本章意欲述说的故事是，尽管朝鲜使者心底仇视清朝，沿路高唱思明悲歌，缅怀明帝明将的丰功伟业，仍无法阻挡“中国袭来”的既定现实。中国袭来指的不仅是清朝商业繁荣和百姓富足的印象深入朝鲜人心，更囊括来自朝鲜底层和上层的各色人物，从“物流”“技术”层面审视朝鲜人于清代中国的新发现。燕行即世界，意思不是前往中国就能看见世界，而是借由出使北京，朝鲜贡使不断地扩充对中国的认识，进一步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理解自身的样貌。

眷眷明朝，鄙视清朝，能够彻底诠释清代燕行使的历史意义吗？

不论朝鲜团的成员是有意为之，或是无意识的行为，联结清朝、朝鲜的锁链一日比一日更形坚固，并由此展开新一章的故事。

被遗忘的“使者”

朝鲜读书人自幼研习中华学问，倘若能够担任使臣亲眼见到中原，实是极其幸运的经历。如此说来，燕行被视为一生少有的壮行，是甚为合理的说法。事实上，目前为止在本书登场过的朝鲜使者，除却战争时期的特殊状况，大部分的使臣一生仅有一次机会，踏上前往中国的贡道。因为机会不多，朝鲜贡使才长篇累牍地记录所见所闻。倘若燕行是唾手可得的旅游行程，相关文献必定在数量与质量上大大改观，可能篇幅短小得多，且内容不再如此翔实琐碎。

然而，幸运之神确实曾怜顾几位朝鲜使者，如李廷龟（1564—1635）四次出使明朝，前述提及的鱼叔权更自豪于七次赴燕。 [(1)] 此类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具备优异的书写能力，为今人留下宝贵珍稀的

见闻，在当时这是第一手的中国情报，他们俨然是中国问题的专家。

这种评价自有道理，但视野不免狭隘，容易令人直观地将他们理解为使节团的全体，忽略其他成员。根据康熙五十一年（1712）闵镇远的日记，使节团的成员共二百二十五人，[(2)] “三大人”正使、副使、书状官，以及负责行政庶务的随行人员约三十人，其余的仆役一百九十余人才是主体。事实上使行中的译官和通事出身不比两班，唯出自中人之家，也是常被忽略的成员。

阅读朝鲜燕行使的文献，需要具备两只眼睛，一只紧盯使者的一举一动，一只观照马夫和仆役的言行举止。换句话说，我们既要端详思想文化如何在中国和朝鲜间流动，也要注意货物商品通过哪些渠道走进任迈的居所。两者构成联系中朝之间的一股力量，一显一隐，相互作用。将目光转移至这些“下人”身上，有助揭露更多使者的故事。

富贵险中求

崇祯九年（1636），最后的朝天使李晚荣在启程前遇到一件趣事。当时已是明末深秋，辽东贡道已绝，尽付女真人之手，于是使节团不得已改从海路朝天。明末这段海路的不平静，从李晚荣的自嘲即可略窥一二。他自称因为海象险恶，船只翻覆的消息不断，时人皆以为奉使赴燕是“必死之地”。李晚荣接受使命时，距离科举上榜仅八个月，正式受命当官也不过四个月。他的亲友听到消息，皆认为李晚荣一辈子勤奋读书，却落得此等下场，真是悲戚。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与李晚荣的亲戚一样悲观，许多人可是称羡不已。按照惯例，书状官可以选拔军官和奴子各一人随行赴燕，职责除照应李晚荣外，无非养顾马匹，或在马前引导而已。李晚荣家无壮丁，也没有相熟的朋友能够担任军官伴行，一时颇为苦恼。某日下班返家，李晚荣发现书案上有一包裹，起初以为是小孩子的衣服，尝试用手移开，不料分量颇重，以致无法举起。打开一看，里头居然有白银一百二十两，布二十匹。这是一笔贿款，买一个危险的机会。

原来是一位朱姓人家愿意担任奴子随行，希望借白金彩布买通李晚荣。朱姓人家相信，前往大明，购买中国商品回乡转售，能够赚进“千金之产”。最终，李晚荣没有接受这笔意外之财，反而拒之门外。朱姓不禁感慨，肯定是他人已提供更好的价码。[(3)] 李晚荣特意写下这段故事，用心不外乎是澄清自身，并借此嘲讽当时的风气。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

朱姓人家所说的“千金之产”，或是许姓友人开玩笑道“真利窟”，均可见不乏勇士不畏艰难，也要一去燕京。

朱姓人家以白银、布匹合计约二百两的价格，预计能够获致千金，意即数倍的收益，可谓暴利。李晚荣的趣事开启了另一种燕行故事，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仍有人不顾性命安危，也要拼死一搏，印证富贵险中求的俗谚，吸引无数人神往力行。从这样的角度思考，燕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或说是庞大的商购团体例行来回于中朝之间。如此说来，李廷龟、鱼叔权数次出使中国的经验自然无足道哉，因为更频繁地来往北京的朝鲜“使者”大有人在，他们是甘愿为奴的“下人”，担任军官的“商贾”，以及居中联系的“译官”，他们是被遗忘的中国专家。

李晚荣与朱姓人家所理解的中国，各自呈现不同的面貌，前者畏惧无奈，后者慕利而行。朝鲜使节团看待燕行一途存在歧见，有的将此视为事大朝天，有的只是当作利窟营生。李晚荣的经验不是罕见的个案，即使放诸清代中国，照样可行；尤其在歌舞升平的乾隆年间，两者的差距更大大拉开。读者需要同时把握这两种眼光，才能更具体地理解赴京使行的意义。下文将注意力放到乾隆年间，透过二位朝鲜使者的眼睛，重新体会两种视野的落差，及个中意义。

中国制造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1711—1799）准备盛大庆祝七十大寿。朝鲜方面也筹组使节团，赴京庆贺，担任正使的是朴明源（1725—1790）。明源的堂弟朴趾源（1737—1805）正值壮年，早有一见中国之志，于是以子弟军官的身份随行。朴趾源是不世出的天才，当时虽然年仅四十三岁，但已是享誉朝鲜上下的知名人物。他年轻时心思不在书本上，后来才发奋力学，三年不出门，博览群书，精通古代经典，以及军事、农学、钱粮杂谷等学问，更通晓天文地理。年约三十，朝鲜的青年才俊如李德懋、柳得恭（1748—1807）、朴齐家（1750—1818）、李书九（1754—1825），皆仰慕他的才华，拜入门下。[(4)]

朴趾源与传统印象中的读书人不同，注重实际有用的学问，务实不务虚。他同时是韩国历史上颇具分量的文学家，文笔甚佳，擅长小说。因着此些条件，他眼光独到，叙事细腻，为今人提供了一份与众不同的燕行文献《热河日记》。朴趾源花费不少篇幅描述仆役、马夫和译官沿途的作为，这是许多使者没能注意到的环节。例如来自嘉山（现朝鲜平

安北道博川郡内）的得龙，嘉山靠近中朝边界，得天独厚，不少居民靠中朝贸易营生。地处交界，有时中国人会越界而来，或是在中国内乱之际逃奔朝鲜。据说得龙的祖父就是向一位明朝遗民学习汉语，自此得龙一脉传承此技艺。

得龙自十四岁开始出入北京，因着家学渊源，他是使节团中最擅汉语者，行程大小事务都离不开他。朝鲜官方对得龙既重用又提防，每次使节团启程之前，必先“安置”其家属，防止出逃他国，由此可见他多么能干。时至1780年，朴趾源等人出行时，得龙已参与燕行四十余年，但他出身贫寒，无法参加科考，身份始终停留在“马头”一职，即管理马夫的头人。(5) 得龙是本章着眼人物之典型，他擅长汉语，结交了不少清朝友人，其中有的甚至是官员；另一方面他身份低下，缺乏书写的能力与条件，长期潜伏在朝鲜燕行使的历史中。

得龙不是少数，他只是特别突出的一位“下人”，其他如宣川（现朝鲜平安北道宣川郡）的戴宗，也已赴京六七次。(6) 这些边地居民是使节团的熟面孔，来往两地习以为常，对他们来说这是人生，没有太多政治和思想上的深意。赴燕既是为公家办事，替使节团工作，更实际的原因，与贿赂李晚荣的用心如出一辙——获致千金之产。朴趾源指出，当使节团接近中朝边界的栅门时，团中的马头和译官热情地与当地的清人握手问候。清人会关心他们沿途是否平安、天气状况、何时启程，甚至慰问家里人的身体健康，可见交情匪浅。

这些人与得龙和戴宗一样，都是义州人，年年出使中国，在朴趾源眼中，他们“习知燕中事”。清朝人称呼他们的方式与朝鲜人不同，在使节团的体系中，得龙是一名马头，身份与出身两班的朴趾源根本难以相提并论，但在清人眼中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通常称得龙为“相公”，即对商人的尊称。按照惯例，朝鲜使者能够自备白银，沿路贸易，有的读书人无法支应这笔款项，于是将自己携带白银的“额度”转售给感兴趣的商贾。这些商贾的念头与朱姓人家一致，或可以说他们就是同路人。身处松都（现开城）、平壤的商贾虽然出资买下额度，却大多无意亲身赴燕贸易，于是委由马头和译官操作。这是一片由利益编织而成的网络，使节团的成员均参与其中。

由此可知，朴趾源形容此等人“视燕如门庭，与燕市裨贩连肠互肚，兑发低仰都在其手”，(7) 当不为过。根据朴趾源所计，一行所备白银不下十万两，(8) 通计十年则为百万两，这在清代中国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财富。令朴趾源感到遗憾的是，这批财富大多轻掷于大清的商铺中。例如

三家位处“中后所”（今辽宁省绥中县）的帽铺，他表示这三家商号各有三五十间厂房，工人不下百人，专门生产朝鲜百姓喜爱的毛帽。使节团经过此地时，先向商家下订，回程取货，行之有年。这三家商号囊括全朝鲜的毛帽生意，朴趾源称“我国所着毳帽皆出此中”，这是中国袭来的一部分，专为朝鲜人定制的中国制造。[(9)]

第一壮观

我们也能从1780年的使行挖掘出不同的故事，他们像是站在得龙和戴宗的对立面，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朴趾源出生于1737年，距明朝灭亡将逾百年，出使时更是远距一百三十六年。在《热河日记》开篇第一段，朴趾源特别声明为何记录年岁的单位是“三庚子”。众所周知，传统中国以“年号”记录时间，耳熟能详的万历、康熙、乾隆，都是当时朝廷颁布的年号。《热河日记》以三庚子纪年隐含深意，代表在他的私人作品中，不愿意使用清朝年号“乾隆”。

通常将崇祯皇帝朱由检视为明朝的末代皇帝，三庚子的意思即“崇祯纪元后三庚子”，崇祯纪年之后第三个庚子年。古人以天干地支纪年，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两者轮流相互搭配。学界习以“甲申之变”指1644年明朝灭亡，肇因崇祯十七年是“甲申年”。在朴趾源等朝鲜读书人心目中，明朝灭而不亡。朝鲜国划鸭绿江为界，“独守先王（明朝）之制度，是明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10)]。三庚子是延续明朝纪年的权宜之计，宣示朴趾源的思明立场。

朴趾源曾询问随行奴子张福，是否愿意生在中国，张福答道：“中国，胡也，小人不愿。”[(11)] 居然连一位朝鲜下人也以文明上国目视中国，倘若清朝人得知此事，不知做何感想。张福说得直截了当，格外真实，如他这般心思的人并不少见。尤其是朝鲜读书人，少有机会奉使赴京，往往只能通过返乡的朝鲜使者得知中国实情。朴趾源形容无缘燕行的朝鲜人，一见使臣必定问道：“你在中国看到最壮观的景色，是什么？”答案各异其趣，有人云辽东一望无际的原野，有人醉心山海关、卢沟桥等建筑，有人爱书成痴，直言北京书肆琉璃厂的盛况。然而，同时也有朝鲜人表示——“都无可观”，在中国没令人惊艳的景色，全都不足一观。

中国都无可观，意有所指。此类人认为清朝皇帝、官员均剃发胡服，即使功德直追夏商周三代盛世，富强比拟秦汉两朝，仍无法抵消剃发的负面影响。他们强调：“一剃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于犬羊也何观焉？”即使追思明朝的风气历经百年，朴趾源笔下那些眷恋明朝的朝鲜人，仍铭记壬辰年万历皇帝发兵平定倭乱的恩德，“东民之踵顶毛发，莫非再造之恩也”。这是“清朝灭亡的隐喻”的两种面向，思念明朝，不忘再造之恩；敌视清朝，渴望“为中国复仇”。听来难以置信，然而1644年以降，信奉尊周攘夷论的朝鲜读书人，“磊落相望，百年如一日，可谓盛矣” [12] 。他们与得龙、戴宗并存于使节团中，亲历同一个中国。

消失的清单

思念明朝的朝鲜人沿途游览名胜古迹，在北京城参拜清朝皇帝，步入琉璃厂结交市肆里头的商贩或读书人，一切目的皆是寻访故国。在他们眼中，马头和译官是操纵使团贸易的“小人”，填饱自身的荷包，却致使国家蒙受损失。然而，大规模地输入中国商品的关键人物，不是这些具备书写能力的使者，只需摊开他们一路上的物品清单，即可知道贸易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此类朝鲜读书人关心的，不外乎是书籍、绘画、古玩、金石，富有文人气息的文化商品。他们少数提及的“俗物”，是沿途馈赠中国官员的物品清单，以及中国官方赐予的礼品，当时称为“下程”。

使节团启程前，按例会备妥沿路发放的礼物。对象下至低层士兵和护行将官，上至北京的中央官僚，各色纷呈。 [13] 至于下程，即清朝招待朝鲜使者的各种食物、草料、备品，根据《通文馆志》的说法：“顺治以后，户部供粮料，工部供柴炭、马草、器皿，光禄寺供各样馔物。” [14] 礼品大抵是朝鲜纸、扇子、银妆刀、靴子，具备本地风味的土物。下程则是围绕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打转，主要是在北京居所的生活必需品。综观这些物品，不仅与前述所及的毛帽和眼镜相去甚远，更且容易令人产生一种幻觉，这些是使行贸易的主角，朝鲜使者的贸易之旅不外乎此。

上述两种清单自然不能等同于使行贸易，我们有理由相信得龙和戴宗有一份交易明细，内载每次经手的货物清单。然而，管见所及，乾隆年间的燕行文献没能留下类似的记录，毕竟得龙和戴宗不是文人士大

夫，可以出版个人的文集、笔记；这些账簿很快消亡，像是一阵风吹过，转瞬即逝。姑且将此类隐蔽于历史的文字记录称为“消失的清单”，尽管依照推论理应存在，却由于种种原因尚未问世。这是研究历史的浪漫之处，总会缺失那么一张关键照片，无可奈何，但不是毫无办法。

事实上，我们仍能通过间接的手段拼凑清单的细目。还记得位于中后所的三家帽铺，朴趾源表示，朝鲜国内的帽子为此三家商店垄断。这三家店铺聘雇百余人，连日赶工，想必产量惊人，光是运回朝鲜就是一趟苦差事。帽子显然是重要的贸易商品，是清单中遗失的一项。旁敲侧击，还能够翻找更多未知的空白。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鲜方面主管边境事务以及调控朝贡贸易的部门“备边司”提交了一份目录，名为“赍去事目”，载明使团成员务必遵守的注意事项。除了预料内的规定，诸如避免泄露国家机密、听从长官指示等等陈腔滥调，其中几点值得注意，如禁止购买有奇巧花纹的布匹，或是携带人参前往中国转售。[(15)]

人参不仅是珍稀的药材，同时也因为售价高昂，能够替代货币，在中国民间交易。朝鲜官方明令禁止使者携带人参，理由极为简单，担心的是重要物资外流，更别说朝鲜国内早已不敷使用。赠送人参能够展现朝鲜的国力，在准备给日本的外交礼物中，人参扮演着要角，这不是货物，而是关乎国家战略的重要物资。[(16)] 令人讶异的是，织有纹样的布匹，居然同样被列为禁物。想必朝鲜向中国进口的纹布，数量惊人，否则在清代中国，布匹既与白银不同，不是流通货币的大宗，也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除非贸易状况已恶劣到官方需要介入，否则主管机关少有相关议论。

禁纹，禁奢，禁中国货物

朝鲜对中国的贸易获利，确实每况愈下，严重影响到内部安定。明万历年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结果是通用货币一准白银，甚至向官方纳税同样使用白银。这种情形延续到清代，没有太大的改变。朝鲜本来不使用白银，却因为参与使行贸易，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股白银旋涡。任迈肖像中的深衣估计是在朝鲜剪裁缝纫，但我推论布料与眼镜一样，更可能来自中国。朝鲜和清朝的贸易中，布匹是大宗，其次是各种“中国制造”的商品，俗称“唐物”。自康熙年间，朝鲜政府间有议论，管制向中国购买纹样布匹的数量，即所谓的“禁纹令”。使用这种样式华美、质地轻柔的布匹，在当时被视为僭越身份和奢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是

国家级的经济问题。

白银、布匹两相搭配，引发了一场朝鲜的财政风暴。当朴趾源看见三家帽店时，他考虑的是："以千年不坏之银，易三冬弊弃之帽；以采山有限之物，输一往不返之地，何其不思之甚也！"[(17)] 朝鲜人用千年不坏的白银，换来三年即坏的毛帽，朴趾源认为是极为不智的行为。他的好友洪大容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直言："我们以有用之银子，买京里无用的杂货，岂不可笑。"[(18)] 当时朝鲜受限于开采技术，以及蕴藏量的问题，两人均担心白银外流将引起经济问题。这种忧虑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朴趾源的时代，中国袭来是进行式，中国货物正铺天盖地而来。

如果走进任迈的居所，不仅止于他依身坐下的书案旁，我们还能发现更多来自中国的商品。朝鲜官员韩用铎（1759—1817）曾向朝鲜正祖反映，朝鲜士人的书斋中，"笔砚炉罐之类，陈列左右者，无非唐物"[(19)]，惯用的文房四宝，以及陈列左右的文物，全都是中国制造。朝鲜读书人不是唯一爱用中国货品的少数，商业的力量能够穿透阶级与智识，敲开每一户的门窗，不知不觉走上餐桌、走进书房。

使行团的马头和译官，间有混入其中的商贾，他们的目标不全是高档货品。书画、金石自然能够兜售高价，毕竟是小众的生意。得龙这类人的眼光更远大，他们放眼全国，想做朝鲜境内的大买卖。稍稍翻阅几则禁纹令的规范，即可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一开始只是富贵人家热衷唐物，禁令的对象是朝臣和命妇。后来连平民百姓亦起而效尤，大婚之日的服饰，必以华丽纹样的布匹织成，日常使用的器物也不离中国制造，"全国习俗不贵土产，必贵华物"，可见中国袭来的威力。[(20)]

禁纹、禁奢的命令通行全国，始终没能起到预期的作用。这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朝鲜使节团的管理阶层，这群以文才见长的燕行使者，自始至终对于亲身干预使行贸易并不热衷，他们似乎也无意借此牟利。可能受到儒家经典熏陶，对于商业事务缺乏兴趣与相关知识。由此，贸易的空间尽掌马头、译官以及随行的商贾等人手中，他们才是主导贸易的要角。政府可以严厉管制，但朝廷远在天边，总有办法可寻。禁纹令一度规定，若有违反者，译官和商贾枭首示众，但仍止不住货物倾销的狂潮。



图15　《朝鲜王朝实录》中关于禁奢的规定

（阅读次序：由右至左）

另一个无法禁绝的原因是，中国已经针对朝鲜发展出一套定制化的商业模式。中国生产的毛帽只是冰山一角，洪大容指出，赴京使行期间，不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的贸易，曾一度由中国的郑姓和黄姓两家族垄断。其中郑姓尤其豪富，当家郑世泰熟习朝鲜客人的品味，召来工匠，按照朝鲜风格制作，并大量生产，压低价格，得以独揽生意。[21] 朝鲜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看似蒙受损害的是朝鲜，然而营利的一方也依存着这条贸易打造的血管，维系生命。接待朴趾源的民宅主人就明白表示："若非贵国使行时，都没了生涯。"[22] 不论情愿与否，两国已然搭上同一艘船。

北学中国

透过朴趾源的眼睛，我们能够发掘赴京使行的两个面向：一是聚焦在奉命出使的官员和军官身上，对中国内外情势的暗查，以及学术风向的探寻，是其特色，也是职责所在；一是关注使节团的另一主体，本是服务使者的马头和译官，有时商贾也涉入其中。身份各异的两股人马，一路并行，他们着眼的目的不尽相同。如前章所示，明朝灭亡之后，朝鲜读书人不认同爱新觉罗家族是中国统治者，反而将之视为胡虏夷狄，是祸乱中华、抢夺圣器的盗贼。他们不甘心奉清正朔，私下沿用崇祯纪年，沿途高歌明室的丰功伟业，感叹世风日下，大明衣冠今何在。

相形之下，使行团中容易被忽视的马头、译官和商贾，却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包袱。根据朴趾源和洪大容的见闻，这些人熟知中国情事，

年年往来北京，并操持使行贸易。其中如朝鲜民人得龙，自十四岁开始赴燕，1780年时已逾四十年，是燕行使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得龙与清朝百姓交好，被礼称一句“老爷”，但在朝鲜使者眼中，他只是马头，是个下人。得龙、戴宗等马头和译官，与清朝商人、官员称兄道弟，原因在于赴燕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实践人文学术的政治使命。朴趾源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注意到两股人群的流动，提醒读者密切注意“中国”的矛盾与复杂。

研究中朝关系的学者，莫不称誉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原因正是他不仅能够运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中国的人文风景，同时巧妙地提出质疑：这样是正确的吗？

显而易见的是，朴趾源对于现状极其不满，他书写中国，但述说更多的其实是朝鲜本身。他兼具两种眼光，轮番审视中国：一方面能够体会思念明朝的情绪，与朝鲜读书人共鸣；同时他精通“俗务”，关心对于民生有利的器物科技。这是一种新的观点，协助他重新发现中国。朴趾源初入栅门不久，此地尚属大清东陲，繁华程度与沈阳、北京难以相提并论。然而他很快注意到，即使在如此贫困的地域，民宅却干净整洁，木柴堆放得法，眼睛为之一亮。 [23] 此外，他还发现中国的建筑物大都用砖，于是沿途关心百姓如何烧砖、造窑，他称赞中国的砖头“齐匀方正，力省功倍” [24] ，并认为清朝载物用大车、独轮车，形制轻便省力，感叹“中国之货财殷富，不滞一方，流行贸迁，皆用车之利也”。 [25]

朴趾源不是第一位注意到烧砖和车制的朝鲜使节，但可以说是观察最为全面且影响甚巨的重要角色。《热河日记》关于朝鲜读书人讨论中国“壮观”景色的部分，详述朝鲜人如何正气凛然地宣称“都无可观”，认为清朝不是中国，根本不值一提。朴趾源称此等人是“上士”，是将为中国复仇雪耻视为职志的朝鲜士人。讽刺的是，他这位“下士”的种种言说，今日却听来格外有力，二百三十七年后，令人肃然起敬。朴趾源表示：“余下士也，曰壮观在瓦砾，曰壮观在粪壤。” [26] 他认为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瓦砾砖头，是处理粪便的城市规划，这才是国家伟大的原因。

朴趾源深知朝鲜士夫思明仇清，但他强调：“为天下者，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 [27] 他对待清朝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即使《热河日记》开篇仍用崇祯纪年，申明朝鲜读书人能够独守明朝制度，保存“中国”于鸭水之东。他也愿意承认：“万方共尊一帝，天地是大清，日月是乾隆。” [28] 或云：“今清之御宇才四世，而莫

不文武寿考，升平百年，四海宁谧，此汉、唐之所无也。”(29) 他将清朝视为中华正统，且推崇备至。

从鄙视到直视，“中国”在朴趾源的世代应时而出，重新被发现。朴趾源主张向清朝学习，只要有利于百姓，即使取法的对象是众所轻视的女真人，他也将尽力模仿吸收。触动朴趾源思虑的来源，将在下一章详述。必须指出的是，18世纪大量中国货物充斥朝鲜，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因素。朝鲜热衷唐物，价格低廉只是原因之一，质量上乘的书画金石、日用器物，乃至任迈桌上的眼镜，在在揭示朝鲜习用“中国制造”是因为无可取代。挟带着大量的书籍、布匹，清朝俨然是一个文化和商业兼具的贸易大国，向朝鲜强力输出“中国”。朴趾源对中国的改观，进而提倡学习中国，从汉城到北京，沿路物质照映出的光景，是挑战思明的最强冲击。

朴趾源、洪大容等朝鲜读书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北学派”。他们引用《孟子·滕文公上》中“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这个典故，强调要北学中国，一改思念明朝、磊落相望、百年如一日的风气。这是两种朝鲜使者共同演奏的序曲，像是中国袭来的旋风，混乱而有序地前行。

(1) 鱼叔权：《稗官杂记》，页六十一。

(2) 闵镇远：《燕行录》，《行中座目》，页十八。

(3) 这段故事见李晚荣：《崇祯丙子朝天录》，《序》。

(4) 关于朴趾源的生平，主要参考李应翼撰写的《本传》，收入《燕岩集》；以及朱瑞平撰写的《点校说明》，收入其点校的《热河日记》。

(5)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七—八、一三〇—一三一。

(6)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十四。

(7)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九。

(8) 参照清朝官员的薪水，即可知道十万之数的重量。根据乾隆朝刊行的《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户部，俸饷上，在京文武各官俸禄》的记载，“在京文武各官俸禄，正、从一品银一百八十两”。一位正一品的官员，年俸仅一百八十两，可见十万之巨。

(9)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八十—八十一。

(10)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一。

(11)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十。

(12) 这一段均引用自《热河日记》，页六十—六十一。

(13) 礼单除常见于《燕行录》，另可参阅《通文馆志》，卷三，《沿路各处礼单》，页一八八—一九七。

(14) 《通文馆志》，卷三，《入京下程》，页一六五—一六八。

(15)　这份“赍去事目”出自《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十一年十月十日，甲辰条。

(16)　关于朝鲜王朝管控人参，以及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请参阅山本进：《大清帝国と朝鮮経済—開発·貨幣·信用—》，〈第三章　平安道江界府における蔘政〉、〈第四章　北辺充実政策の展開〉。

(17)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八十一。

(18)　洪大容：《湛轩燕记》，页二六四。

(19)　《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丁未条。

(20)　关于这部分的讨论，主要参考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第70—78页。此外，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状况自明代晚期就曾出现，《朝鲜王朝实录》在嘉靖年间有如下记录：“近来诸宫、权贵之家，争贸华物，非特为服饰之用，亦以牟利，有同商贾。”显然这里指的华物，也是布匹。出自《朝鲜王朝实录》，明宗十二年一月二十三号，丁丑条。

(21)　洪大容：《湛轩燕记》，页一一四—一一六。

(22)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二十一。

(23)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十二。

(24)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十九。

(25)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六十五。

(26)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六十一。

(27)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六十一。

(28)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一四六。

(29)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一〇一。

第六章　朝鲜人的“中国史难题”：中华？朝鲜？

名为“明朝”的流行病肆行朝鲜上下，他们着迷于陈述皇明中华的历史，追逐过去，即使明亡已越百年。朝鲜读书人深信“胡虏无百年之运”，清朝危在旦夕。他们像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独自守护明朝文化于鸭水之东，高举明室的旗帜，证明中国不亡。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结束的？时至今日，难以想见朝鲜半岛上的居民，怀慕明朝，甚至是中国。万历皇帝、万历朝鲜之役，以及朝鲜的思明故事，已然远离人们的视界，隐身于古籍文献中。如果有一个时代，它的名字叫作“思明”，相较其兴起的炽热，曲终人散的尾声更值得细细品尝。

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回顾朝鲜那段思念明朝的历史，这或许是最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我眼中，构成历史的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宏大结构，亦非唯思想精英的知识宣传；有时候，需要一点巧合与偶然，需要大势的铺陈与人为的介入。最终，创造历史的是人，再怎么微不足道的人类，都可能推动历史的巨轮，这是研究者的浪漫，也是人之为人的价值。

为眷眷明朝画下休止符的，绝非一位热爱清朝的朝鲜人，故事的主人翁对明朝满怀热情与敬意。然而，故事就这么发生了，1765年，一位名叫洪大容的朝鲜读书人，踏上燕行之路。他在中国的经历像是传奇故事，又像是时势使然。

本章旨在阐述洪大容与中国儒生的故事，与此同时，借由洪大容在北京的趣事，寻觅时代变迁的线索。我们能够从18世纪的朝鲜社会，发现诸多思念明朝的证据，例如使用崇祯、万历年号铭刻年岁，例如终身不见胡清历，例如认定中华必将再起。这是个矛盾且交错的时代，我们必须细细体察各种声音，才能描绘思明的样貌。

以下，将从一个偶然的相遇谈起。一位孤独的朝鲜人，跋山涉水，在中国结识此生至交，这是文化交流史的佳话，也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一副眼镜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二十六日，朝鲜使臣李基圣[(1)] 在北京琉璃厂闲逛。偶然间，他注意到二位路人所戴的眼镜，不假思索地上前攀谈，希望能够以高价入手。肇因他熟识的亲友眼力衰退，渴求一副眼镜。李基圣担心在北京会遭人讹诈，买不到真品，于是出此策。当下想必是一阵慌乱，因为他不解汉语，连忙索来粗纸，蘸上几重墨色，写下来意。

突如其来的这桩买卖没能吓着中国人，两人均来自杭州，名叫严诚（1732—1767）、潘庭筠（1742—？）。严诚相当大气，即使李基圣表明愿意以“多金”相易，他仍不经考虑立即摘下眼镜，脱手赠之。他写道：“求于君者，想是与我同病者也。吾何爱一镜？何用言卖？”没有多说什么，就这么转身离开。反倒是李基圣愣住，赫然发现自己举动鲁莽，就这么无偿收下一副眼镜，不知如何是好。他连忙追上严诚和潘庭筠，说道之前是戏言，请收回眼镜。这下严、潘二人倒是不悦起来，认为眼镜不过是件小东西，何必如此。最终，李基圣略问二人姓名、来历，揣着一副眼镜回到使馆。[(2)]

愿见天下奇士

李基圣的奇遇引起其他朝鲜使臣注意，当时一位名叫洪大容的子弟军官正在使节团中，他隔山渡海而来，目的正是结识中国奇士，严诚的洒脱令他赞赏不已。子弟军官是个闲差，名义上是见习军事，其实就是观光中国。洪大容在国内没有什么知己好友，前往大清纯粹是想见识中原的风光，与“天下奇士”成为朋友。[(3)] 洪大容的心愿并不寻常，按前文几章所述，朝鲜知识人无不渴望皇明复起，驱逐满洲。换句话说，朝鲜使者的中国旅行，是一场缅怀明朝的盛大演出，认识清朝读书人绝非出行的目的。

洪大容，字德保，号湛轩，是南阳望族，祖上不少人历任朝廷要职，是典型的两班家族。1765年，他的叔父洪檍（1722—1809）受命担任书状官，参与是年的朝鲜使节团。理解洪大容的性格，需要从两个面向思考。一是他受传统儒学熏陶，博览群书，严诚也称誉他“中国之书，无不遍读”[(4)] 。洪大容信服朱子学，极其虔诚，这造就他性格内敛克制，不苟言笑，且终身不作诗，以追求学问为职志。



图16　洪大容（左），洪檍（右）

（《日下题襟合集》，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

然而，这位出身南阳士族的洪德保，尽管年逾三十，仍不愿意当官，甘心一介白衣。除却儒学典籍之外，他耗费精力于天文、历算，甚至在自宅制作天文仪器以“观天”。洪大容的另一面是科学和实学，这些被传统士大夫视为末流旁支的学问，是他关心的重点；因此着实能够体会，何以他没有什么知心好友。身旁的两班子弟早早入仕朝廷，而他镇日“在家观天”，想必招惹不少议论。本就压抑克制的性情，由此添增一丝傲气与不甘。他似乎不是汲汲营营于宣扬理念的人，只是隐忍不发，同时又渴望被理解；矛盾是把握洪大容的主轴，这也令他成为充满魅力的人物。[5]

有别于一般朝鲜士人，洪大容在行前积极准备，自称：“宿有一游之志，略见译语诸书，习其语有年矣。”显然燕行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期准备。然而，在家看书学语言，终究隔一层，进入中国后，洪大容“虽寻常行语，全未解听”。幸好他在国内已打下基础，沿途不断寻觅机会练习汉语，至北京时，“音韶益熟”，熟练很多。[6] 我认为，良好的语言条件是洪大容与中国人交流的润滑剂，这免去部分将口说转成笔谈的时间差，令双方互动更为紧密。

天涯知己

李基圣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他始终将严诚和潘庭筠放在心上。当时赠送文具和墨宝是文人雅尚，李基圣可能自身的物品将用罄，于是向洪大容商讨一些，作为礼物送给严、潘。经过几日访查，李基圣确定二人的住处，遂带着这些礼物前去拜访。他满载而归，严、潘虽接受礼物，却也回赠不少。李基圣盛赞二位中国人的才华，向洪大容建议，此二人“必有过人才学，切勿错过”。[7] 洪大容素有一见天下奇士的抱负，受李基圣的鼓动，又见他带来二人准备科举的文章，颇精练巧妙，引起他的兴趣，于是决定偕同李基圣以及同感兴趣的金在行（1721—1789）[8] 前去拜会。

这是一场与众不同的相会，限于篇幅无法详细交代双方笔谈的内容。简要地总结，朝鲜人洪大容和金在行，与中国人严诚和潘庭筠等人的交流，处处表露真情。限于门禁，朝鲜使者难以私自外出，更别说是过夜；然而洪大容积极地安排，希望能够彻夜笔谈，竟日方休。他们是真心渴望见面，为的只是聊天。谈论的内容多不胜数，从辩证儒学经典的正确与否，到相互鼓励双方的人品德行，间或一两则趣谈轶事，逗得众人哈哈大笑，他们就像是多年未见的朋友一般真诚。



图17　金在行

（《日下题襟合集》，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

很难如实还原双方交往的情景，严诚说“金、洪二君频来寓舍，每谈竟日”，双方“对席操管，落纸如飞”，往往一次笔谈就“尽七八纸，或十余纸”，严诚形容“相见欢然如旧识”[(9)]，想必笔谈得很是畅快。他们不是日日见面笔谈，大多倚靠信件保持通话，金在行返回使节馆后，向严诚写道：“归来耿耿，达宵不能寐。”[(10)]洪大容说得更真切：“悄坐孤馆，寸心如割，夜则就枕合眼。闇闇之中，忽若二兄在坐谈笑不觉，蹶然醒来，殆达朝不能成睡。”[(11)]洪大容甚至梦想“来世同生一国，为弟为兄，为师为友，以卒此未了之缘”[(12)]，约定来世同生一国，完成这段未了情缘。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离别前夕潘庭筠感伤落泪，金在行曾表示“天下最苦之情，莫如别离” (13) ，看来当真如此。或许是久逢知己的喜悦来得又快又猛，离别显得加倍痛苦。洪大容曾感慨地说：“终归一别，不如初不相逢”；严诚附和道：“造物者亦何苦拨弄此终身不再见之人。” (14) 今人似乎已然遗忘这种情感，与君一别，不再相会。然而在我心中，有一种友情叫作洪大容和严诚。

千里之遥未能阻隔友情延续，连年进京的朝鲜使节团总有熟人在列，协助投递几封直抵杭州的信函，双方并没有断了音信。洪大容等人返国后，严诚始终去信不断，他思念着朝鲜友人，称“恨云山万里，不能与知己共相切劘” (15) 。相思像是病，缠绕严诚的身心，1767年致洪大容的书信中，他表示“诀别以来，每一念及，肝肠崩摧” (16) ，这真是令人为之动容的友情。洪大容也未曾忘却严诚和潘庭筠，但已然相隔千里，只能写道“种种悲欢，殆若一场梦事” (17) ，这像是一场梦，而现在是梦醒时分。

1766年在北京的偶遇，间接牵起严诚和洪大容的友情，至死不渝。在离世前夕，严诚招来好友朱文藻（1737—1806），当时严诚已是将死之人，他躺平床上，口舌不再灵活，手指颤抖，呼吸不顺，只留着最后一口气。严诚勉强地从床被中拿出洪大容寄给他的信件，要朱文藻读给他听。他听着听着，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然后将信件拿到眼前，嗅几抹墨香，这是严诚死前的画面，他或许觉得洪大容就在身旁，陪伴他逝去吧！ (18)

严诚的死讯是天大的噩耗，洪大容悲愤不已，在写给严诚父亲的信中，自承“五内崩裂，悠悠苍天，此何忍哉！山海隔远，面诉无日”。 (19) 时间的魔法没能消磨友情的深固，在一个没有实时通信软件、交友社群匮乏的时空，曾有人如此珍惜朋友，成全了一段佳话。然而，对我们而言，拉开与洪大容的距离，才能理解此事的历史意义，以及诸多巧妙之处。洪大容与严诚等人的友谊，越显真挚，越凸显时移世易，朝鲜历史正准备翻开新页。

因友情而起的论战

暂时抽离严诚与洪大容的交谊，才能在更大的叙事下重新领略其深意。双方交往之真挚不悔，着实令人太息再三。深究天涯知己的故事，关键仅只一处，就是双方以兄弟相称，成为至交。洪大容明言“天地为一

大父母，同胞何间于华夷”[20]，意思是以天地为父母，你我均是同胞，何必以“华夷”分别彼此？这句看来豁达开朗的告白，已然越过朝鲜知识圈的底线，因为如前面几章所述，朝鲜人眼中的清朝是夷狄，华夷作为分别“我者”“他者”的分析概念，怎么可能不重要呢？我们不应忘记，朴趾源问奴仆张福，是否愿意生在大清，他可是直言：“中国，胡也，小人不愿。”[21]就连一个下人，都深受华夷观念影响。

燕行归国后，将自身的见闻出版，在朝鲜知识圈极其流行。洪大容似乎也有此打算，他慢慢整理笔谈的草稿，希望能够结册问世。但是，洪大容眼中的“美谈”，很快地成为朝鲜读书人攻讦的对象。寓居北京时，洪大容向严诚等人称道一位朋友金钟厚（1721—1780），说他“功课精笃，见识通敏，文词亦高妙，时望甚重”[22]，归国后此人却是他最严厉的斥责者。

相较于洪大容对中国友人的敬重，金钟厚动辄使用“剃头举子”指称严诚等人，其鄙夷之情可见一斑。金钟厚惊讶洪大容居然对“夷狄”无所不语，甚且称兄道弟。在金钟厚眼中，这些人应试清廷科举，就是服膺清朝主权的人，就是忘却明朝与中国文化的叛徒。不管洪大容的答书如何辩驳，终归一句，金钟厚“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23]。他宁愿当朝鲜的“夷”，也不想与清朝有任何干系。洪大容身处的社会，评论这份友情的严苛，道尽朝鲜对思明的坚持。

朝鲜读书人对洪大容的责难颇多，可归纳为三点：（一）清人就是夷狄，洪大容与他们称兄道弟，绝对不可；（二）清人笔谈间毫无思念明朝的意思，而且应试科举，就是“夷狄”；（三）洪大容与他们笔谈时，竟然使用清朝年号，而不是用崇祯、万历纪年，是对明朝的大不敬。此时是1766年，明朝灭亡后一百二十二年，朝鲜社会似乎仍停留在1644年。洪大容的故事是极佳的切入点，提醒我们1766年的朝鲜，时间走得多么快，又像是从未拨动过。

本文无意介入双方的争吵，定调谁是谁非，只想提醒读者，这场因友情而起的论战，揭示朝鲜知识圈深信“清朝＝夷狄”的论述，这种观点风行草偃，上下莫不臣服。洪大容与严诚的交往是对此最严正的挑战，洪大容曾向严诚提及“吾辈称兄弟事，此间士友或有非之者”[24]。但他从未退缩，始终坚守立场，这益发凸显朝鲜人心正在波动。为了捕捉这一刻的错综复杂，必须暂时将视角聚焦朝鲜国内，略述朝鲜知识分子阶层思念明朝的努力与业绩，进而探讨其终结。下文将述说燕行使者家乡的故事，明乎此，才能理解发生于北京的历史事件，何以如此重要。

朝鲜使者喜欢探问中国儒生“明朝故事”，他们仔细端详清人的表情，想要知道这些中国人是否着实忘掉“中国”了。原因格外吊诡，这些信仰明朝的朝鲜人，似乎是要验证自己的信仰才是真确无误。他们在清代中国寻访明朝故事，说的是自己——最后思念明朝的外邦人。答案总令人感到沮丧，朝鲜使者闵鼎重（1628—1692）向一位中国秀才请教明朝历史，对方回道：“不便言前朝事，亦不敢尽述。”[25] 另一位朝鲜贡使吴道一（1645—1703）认识云南人朱秀，请教吴三桂（1612—1678）起兵的始末，朱的回应居然是：“自有万世公论，今不必烦问，亦不敢烦说。”[26] 与明朝有关的历史，像是公开的忌讳，无人敢申论。

相形之下，朝鲜读书人对明朝，伊始是悲愤至极、手足无措，后来则在时光的长河中无止境地追忆。1644年，清廷入主中原后，释放原本担任人质的朝鲜王子凤林大君（1619—1659）。他回到朝鲜宫廷，向众人报告明朝灭亡的消息。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当时“虽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27] 。所有人哭成一团，又惊又惧，大明居然就这么灭亡了。不同于清朝读书人，朝鲜知识人全然没有书写明朝历史的忌讳，1644年以降是朝鲜思念明朝的盛世，前仆后继，一个以思念明朝为名的时代，于焉开始。

郭浏（1597—1671）就是亲身经历明朝灭亡，在余生铭刻皇明的朝鲜人。1644年明朝灭亡，他年已四十七，并非“不懂事”的年纪。当时他在朝鲜第一学府成均馆就读，却因为时代巨变，断绝出仕为官的念头。他因为在万历丁巳年（1617）考中科举，进入成均馆，此后自号“万进堂”。退居乡里之后，他专注于完成两本书，一是关于明朝历史的《皇明记略》，一是关于夷狄大义的《春秋解义》。朝鲜读书人崇仰他的德性，礼称他“崇祯处士”，也就是为明朝守节、终身不当官的朝鲜人。

郭浏并不孤独，他是时代的缩影。曾经有那么一段岁月，朝鲜人用写作明史寄寓对明朝的爱与怀念。年纪小郭浏整整五十岁的李玄锡（1647—1703）是另一个例子，半个世纪似乎不够长，因为李玄锡的毕生职志居然是撰写一部最完善的明朝历史。李玄锡本在朝廷任官，却突然向国王上奏《乞屏退卒撰明史疏》，期盼能够专心撰述明朝历史。在这封奏疏中，他明白表示，退休写书的目的是“揭其不忘皇明之至意焉”[28] ，他想接棒，完成朝鲜先贤的遗志，编纂一套中外莫及的明史。

李玄锡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去世，这一年，他为《明史纲目》撰写的序言提道："明乎、明乎，终有所不忍忘焉者矣。倘其专附乎'续资治'之名，而没其国号，则岂余之始托意者哉！"[29] 明朝啊！明朝啊！这段始终不忍遗忘的历史，如果按照清朝的做法，隐没明朝，岂不违背我的本意？这是来自朝鲜的坚毅呼声，他们想要摆脱清廷，写一套属于自己的明史。

李玄锡编纂《明史纲目》是出于对明朝的眷恋，以及承继先人遗志的责任感，但也不是毫无顾忌。他曾表示"或谓外国之作中国史，古未尝有也"，[30] 自古以来，确实没有外国替中国写历史的例子，但这没能阻断他的工作，最终他完成了二十四卷并附录一卷共二十五册巨帙的《明史纲目》。管见所及，这可能是朝鲜人著述最丰厚的明朝历史作品。

李玄锡似乎过虑甚矣，尽管过去未有外国作中国史的例子，但其时编修明史像是时代的狂热，席卷全国。在李玄锡身后，七十年过去，朝鲜官方也开始投入明史工程。1772年，当时仍在东宫研习治国伟略的朝鲜王子李祘（1752—1800），这位以读书为乐的储君偶然接触一套中国典籍《通鉴纲目》，有感于独缺有明一代的历史，便召集宾客名士，补完明史，名为《资治通鉴纲目新编》。写出最完整的明史，是思明的象征，横亘百年，走进知识圈底层与皇宫深处的人心。

响应朝鲜正祖李祘的宾客之一是徐命膺（1716—1787），他极为认同李祘的志向，表示"说者以为皇明纲目不作则已，作之则其必在于东土"[31]。人们都说《资治通鉴纲目》关于明朝的部分必是由朝鲜人写的。在这个年代，朝鲜人写明朝历史，多么理所当然。

这是思念明朝的盛世，是洪大容、朴趾源栖身的时代。1764年，是甲申之变（1644）后一百二十年，又是一个甲申年。朝鲜读书人群聚一堂，纪念这个别具意义的瞬间。崇祯皇帝殉国，时在三月十九日，1764年的这一天，朴趾源目睹朝鲜读书人成群结队地走到宋时烈的旧屋，朝着宋先生的画像行礼如仪。他们走出屋外，行至近郊，向西面（大清所在的方面）大声呼喊"胡！"[32] ——表达对清国的鄙视。这个过程越显诡谲违和，越凸显思明的牢不可破。从1637年许格奔上小白山痛哭算起，至1772年徐命膺书写明史的大义凛然，已然度过一百三十五年，而朝鲜仍是那个眷眷明朝的朝鲜。

历史知识

思念明朝不是空口无凭的热情，也不仅止于纂修史书而已，这曾是长达百年的知识狂潮，为朝鲜读书人创造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康熙八年（1669），朝鲜使臣闵鼎重曾向一位中国秀才王公濯探听南明的消息。尽管习称1644年明朝灭亡，然而在大陆南方，确实存在一股顽强的势力，史称南明。闵鼎重问及南明的永历皇帝（1623—1662）的下落，他说："或云永历投缅甸国遇害，其太子为吴三桂所执，亦不善终耶？"(33) 闵鼎重显然对永历帝的下落半信半疑，希望王秀才证实传言，想要知道明朝灭亡的真相。根据目前所见的文献，不禁赞叹朝鲜使者搜罗情报的能力，因为句句属实，只是王公濯似乎有所疑虑，不敢明说，只表示"多虚传，未必实"。

闵鼎重与王秀才作为经历明清鼎革的当事人，将永历帝、南明的讯息视为"情报"而非"历史"，似无不可。然而，细细审酌一百一十四年后，朝鲜使者李田秀（1759—？）与一位中国儒商张又龄的对话，将揭示这些历史问答实有深意可寻。李田秀问道："永历皇帝不知究竟，或云后在安南云，然否？其亡果在何时？"(34) 李田秀的问题与闵鼎重如出一辙，永历皇帝究竟何去何从，这始终是缠绕朝鲜使者心头的大疑问。为什么相隔百年，朝鲜读书人道出相同问题？答案必须从朝鲜思念明朝的业绩说起，因为事出有因，而我们只见着那个结果。

朝鲜的历史教育：童蒙读物

我确信闵鼎重和李田秀关于永历皇帝的疑惑不是偶然，事出必有因，而答案需要耐心挖掘。固然得以将此归诸思念明朝的结果，倘若不是他们眷恋明朝，何以至此。然而，仅关注思明的种种言说，无异于遗忘思明时代的伟大业绩，他们不正写下无数关于明朝的历史吗？此类作品是朝鲜知识人的日常，无所不在，提醒着思明如此理所当然。稍稍翻阅当时流行的历史读物，如《史要聚选》，或是专业的历史著作，如李玄锡的《明史纲目》，能够发现更多证据。



图18　《史要聚选》书影

（来源：早稻田大学古典籍数据库）

《史要聚选》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历史教科书，在九卷的篇幅中交代了“帝王、后妃、圣贤、异端”等中国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书自出版之后，虽在乾隆元年（1736）、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再版，但关于“中国帝王”的记载仍停留在明朝永历帝。关于这位末代皇帝的下落，《史要聚选》称：

> 〔永历〕帝入南宁，遂入土州。严起恒等数人随去，后未详。[35]

至于那位以纂修明史为己任的李玄锡，在《明史纲目》亦称：

> 〔永历帝〕车驾趋南宁，遂入土州，唯严起恒、王化澄、马吉翔、庞文寿等随去，后未详。[36]

根据这两种文献，永历皇帝的下落确实未曾明言，都是“后未详”。因此，闵鼎重、李田秀的相同问题，立基于同一个知识来源。不确定的言说充斥耳际，亲临中国的二人，想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燕行中国的朝鲜人终究是少数，对这个遥不可及的邻国，绝大部分朝鲜人寓居乡里，认识中国的方法是书籍。永远不可忽视传统史书的影

响，不论是专业史家如李玄锡的《明史纲目》，或是通俗读物如《史要聚选》，它们主导朝鲜知识人关于“明朝”的知识数个世代。更往底层寻去，那些容易为人忽视的童蒙读物，影响力亦不容小觑。

当时最流行的童蒙读物，莫过于《童蒙先习》。这本出版于1541年的著作，本来是朝鲜读书人朴世茂（1487—1564）的私人作品，推测是他教育子女的一份教材。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分别教授“道德伦理”“中国历史”“朝鲜历史”。韩国学界对此书甚为重视，除了关注道德伦理的阐释外，更重要的是此书系第一部系统性教授朝鲜历史的文献，被认为是“朝鲜独立”历程的重要痕迹。值得一提的是，《童蒙先习》在明朝灭亡后受到朝鲜官方瞩目，通行全国，以眷眷明朝著称的朝鲜大儒宋时烈甚至为此书作跋文。

一本16世纪的童蒙教科书能够持续再版，除却文笔精湛、难易适中等优点外，为宋时烈看重的实是符合国情，是呼应思明时代的产物。稍一翻阅《童蒙先习》即可明了，这本书对于历史的描述满足朝鲜上下的期待。元朝是蒙古人的政权，是“胡虏夷狄”，《童蒙先习》称元朝是“胡元灭宋，混一区宇，绵历百年。夷狄之盛，未有若此者也”[(37)]。即使元朝统一天下，亦因为“夷狄”的身份评价不高。相形之下，皇明中华是“大明中天，圣继神承于千万年”[(38)]。大明将延续千万年，如日中天。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十分明确，《童蒙先习》记载：“天命归于真主，大明太祖高皇帝赐改国号曰‘朝鲜’，定鼎于汉阳。”[(39)] 上苍将天命赐予李成桂（1335—1408），国号由大明钦定，立都汉阳。我们不应小看这么几句话，因为这是面向幼儿的教科书，这在他们脑海中塑造了一种世界观，最伟大的国家叫大明，而我们的文化承继大明而来。

朝鲜转向内在

当洪大容与金钟厚争辩不休之际，历史已然步入新阶段。还记得洪大容遭受责难，理由是使用清朝年号，与中国儒生结为兄弟。清朝不仅是夷狄，也是历史书写的禁忌。1766年的论战像是时代的印记，象征一个属于思明的时代。然而，新的浪潮逐渐袭来，侵蚀原有的历史地景，塑造新的风貌，那是一个专属朝鲜的画面。

洪大容与金钟厚论战后十年，1776年，一位名叫李万运（1723—1797）的读书人出版他私自编纂的童蒙读物《纪年儿览》。《纪年儿览》的问世是划时代的变迁，与《童蒙先习》不同，李万运安排了清朝

的位置，明朝不再是中原王朝的尾声。如图19所示，永历皇帝的下落不是“后未详”，而是“为清吴三桂所执，遂遇害”，这是盖棺论定，也是前所未有的确认，核实一个时代的消亡。

不仅如此，无论是将《纪年儿览》视为科举教科书，或是童蒙读物，关于清朝的历史，李万运以“奉天承运皇帝”称呼乾隆皇帝，这是过往未曾出现的。1766年洪大容因为使用康熙年号的争议仿佛过眼烟云，一转即逝，清朝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朝鲜社会。

李万运正视清朝的笔法不是临时起意，实有寓意。在李万运眼中，举国倾心明朝的现状，无异于遗忘朝鲜自身的历史。他编纂《纪年儿览》时，将中国归诸“外国”，与郭浏、徐命膺、李玄锡的认知完全不同。郭浏写作《皇明记略》是为了缅怀明朝，徐命膺甚至声称只有朝鲜人才能编纂明朝历史。在这些思念明朝的人心底，明史不仅是文化事业，也是守护中华文化的终极任务。李万运却不作此想，他认为朝鲜人遗忘本地的历史：“学士文人脱略于名数之辨，粗识中朝（中国）年代，而于本国（朝鲜）则顾茫然不识，此何异不记祖父之年甲者耶？”(40) 朝鲜人只懂中国历史，对本国历史一窍不通，这不是数典忘祖吗？这是来自朝鲜本土的呼声，也是思明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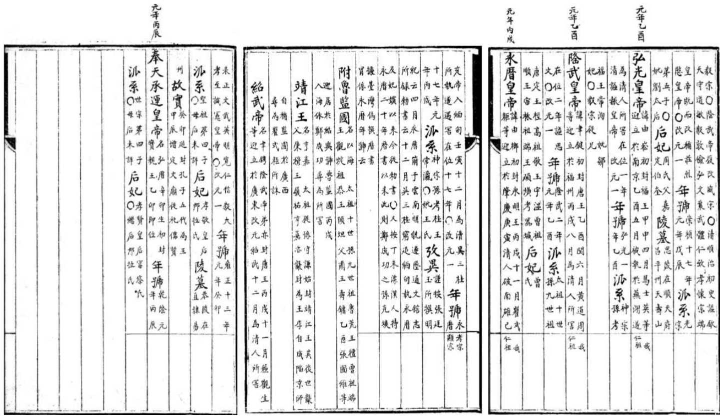


图19　《纪年儿览》书影

（阅读次序：由右至左；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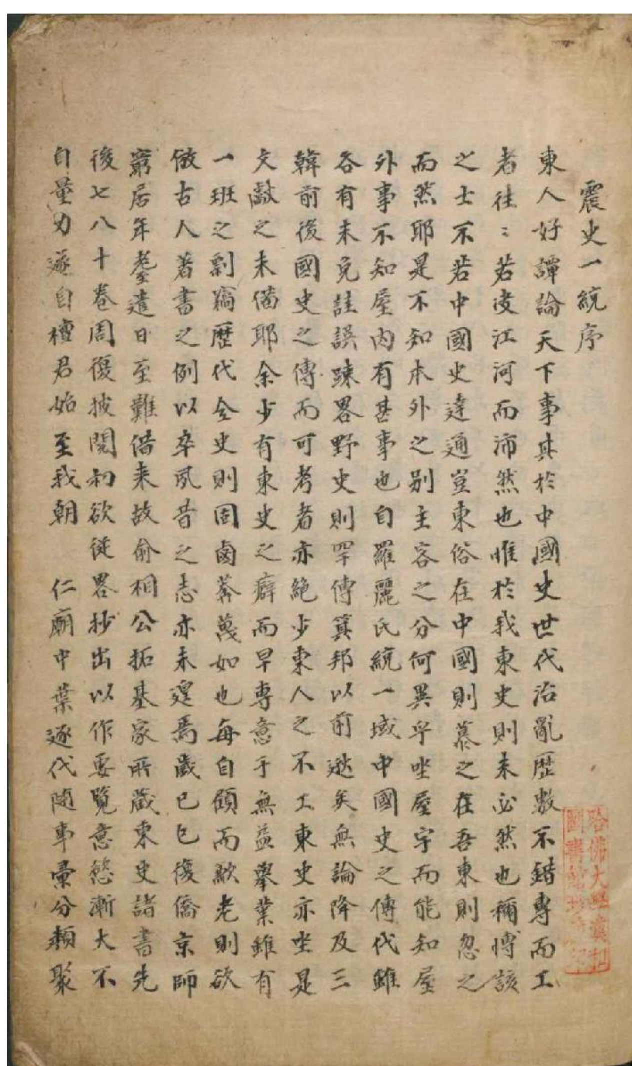
洪大容就是时代的见证人，潘庭筠曾询问他朝鲜历史，希望能寄上几本关于朝鲜史的著作，洪大容的回信却表示：“东俗崇信儒学，著述多门，但士子没齿从事，惟矻矻于中华文献，而东史典故，多阙不讲，骛远忽近，殊为诧异。”(41) 朝鲜读书人信奉儒学，专研的是中华文献，对于朝鲜的历史讨论不多，洪大容自己也惊异不已。这是注意力从中国转

向朝鲜的时代，洪大容的回应不是孤证，1813年一部朝鲜历史书《震史一统》同样表示：

> 东人好谭论天下事，其于中国史，世代治乱，历数不错，专而工者，往往若渡江河而沛然也。惟于我东史则未必然也，称博该之士，不若中国史达通。岂东俗在中国则慕之，在吾东则忽之而然耶？是不知本外之别、主客之分，何异乎坐屋宇而能知屋外事，不知屋内有甚事也？[42]

这本书直言，朝鲜读书人熟悉中国历史，专精者众，唯独对朝鲜历史陌生，他认为这无异于坐在屋中通晓屋外事，却对屋内没有丝毫认识。这些针对中国史的质问，不正是对思明最严厉的挑战吗？李万运笔下“不记祖父之年甲者”，归徕老人所指不知屋外事的朝鲜读书人，那些热衷于书写明朝历史的人，想必过半背负责骂。

时间越久，思明的表征持续维持，但记忆深刻的人越来越少。出乎意料，没有政治力量的介入，思明的大敌是时间与朝鲜人自己，李万运等人对本地历史的呼声，以及时间的侵蚀下，退场的声响鸣起。时间越往后，我们能够看到朝鲜读书人对思明的坚持，也见着更多遗忘与失望，源源不绝。殊为诧异的不是朝鲜人没有关于本地的历史著作，而是思明就如此终结，在时间的长河中默默消逝，伴随着中国与朝鲜的争论，伴随着朝鲜历史崛起的呼声。洪大容与严诚的友情，像是耀眼的烟花，提醒我们，这一切结束了。



震史一統序

東人好譚論天下事其於中國史世代治亂歷數不錯專而工者往往若涉江河而沛然也惟於我東史則未必然也稱博該之士不若中國史達通豈東俗在中國則慕之在吾東則忽之而然耶是不知本外之別主客之分何異乎坐屋宇而能知屋外事不知屋內有甚事也自羅麗氏統一域中國史之傳代雖各有未免詿誤疎畧野史則罕傳箕邦以前邈矣無論降及三韓前後國史之傳而可考者亦絕少東人之不工東史亦坐是文獻之未備耶余少有東史之癖而早專意于無益舉業雖有一班之剽竊歷代全史則固鹵莽蔑如也每自顧而歎老則欲倣古人著書之例以卒夙昔之志亦未遑焉歲己巳僑京師窮居年耋遣日至難借來故俞相公拓基家所藏東史諸書先後七八十卷周復披閱初欲從畧抄出以作要覽意態漸大不自量力遂自檀君始至我朝 仁廟中葉逐代隨事彙分類聚

图20　归徕老人著《震史一统》书影

（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

眷眷明朝

清廷未能摧毁明朝，对于朝鲜而言，时间才是思明的大敌。在外交上臣服大清，是政治表态，是逼不得已，不是心悦诚服。洪大容在北京的旅程，也曾高唱思明的悲歌，感叹生不逢时，这是时代照映出的特殊光景，属于数个世代的朝鲜读书人。偶然的相遇像是突然鸣起的枪声，提醒众人历史正在奔驰，没有人能够拦住。洪大容与严诚的真挚友谊，不是发生于乡里的美谈，而是时代的剧变。这是思明悲歌结束前的序

曲，引领众人聆听下一首歌，准备曲终人散，准备翻开新页。

从日本军士踏上釜山算起，朝鲜曾经濒临亡国边缘，一度复起，又在明清鼎革的战火中跌了一跤。17世纪的朝鲜历史起伏不断，拯救国家于危难，却也丧失文化祖国于旦夕，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轰然崩解。我总认为，明朝灭亡后，在朝鲜才真正展开一段属于明朝的时光。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它的名字叫作思明，烙印朝鲜人心，至死不渝。

洪大容像是突入历史的意外，提醒我们，朝鲜人与中国人不可结为天涯知己，却又警醒我们，世界正在改变，一去不返。朝鲜思念明朝的过程绝非一蹴可及，这是数个世代打造的伟业，无数朝鲜人舍弃余生，目的是写出最完美的明朝历史。他们用尽生命呐喊，呼吁众人莫踏上前往清朝的道路，独守中华文化于东土。

从许格奔上小白山痛哭的那一天起，朝鲜已然踏上归途，他们走在寻找自身历史的道路上。辗转曲折，终点未曾改变，燕行使终将返乡。利用那名为“世代”“时间”的眼睛，我们能够发现更多洪大容不知道的故事，原来思明也是能够磨耗的存在，几经变迁，亦可能消弭于无形。重新审视李万运和归徕老人的质疑，对朝鲜历史的重视不是对思明的正面直拳，在我眼中，即使再多的呼声都不能击倒这份对明朝的情感。遗忘才是历史的大敌，正视“敌人”才是杀手锏，当洪大容倾心交谈，与严诚结为好友的那一刻，历史已然论定，这是一场名为友情的中外美谈，也是思明的终声。因为啊因为，一位朝鲜人与一位中国人，缔结良交，成为莫逆，成为跨越一切的朋友。这是梦醒时分，一切重新开始。

(1) 文献亦有作“李基成”，本文依照日本学者夫马进的说法，李基成应是洪大容的笔误。请参阅洪大容著，夫马进译注：《乾净笔谭1》，页一七六。

(2) 这一段参考了两份文献：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四五七；洪大容、李德懋著，邝健行点校：《乾净衕笔谈·清脾录》，页三。

(3) 洪大容、李德懋著，邝健行点校：《乾净衕笔谈·清脾录》，页九、十三。

(4)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四六二。

(5) 夫马进也认为洪大容颇具魅力，因其人格特质，方才有这段天涯知己的缘分。见洪大容著，夫马进译注：《乾净笔谭1》，页二五一。

(6) 洪大容：《湛轩燕记》，页二四二。

(7) 洪大容、李德懋著，邝健行点校：《乾净衕笔谈·清脾录》，页四。

(8) 金在行，字平仲，号养虚，出身安东金氏，庶子。关于其生卒年，夫马进根据《安东金氏大同谱》，认为是1718—1789。但按《日下题襟集》所记，以及几人约为兄弟，盖依年岁排辈，严诚应不致犯此错误。严诚表示两人相交时，金在行年四十五，是年1766年，故生年准以1721年，特此说明。关于夫马进的辨析，请参阅洪大容著，夫马进译注：《乾净笔谭1》，页一七七—一七八。

(9)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四六一—四六三。

(10)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四七六。

(11)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四九七。

(12)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四九八。

(13)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四七九。

(14)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四八九。

(15)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四八五。

(16)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五五三。

(17)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五三一。

(18) 这段描述主要根据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四四六—四四七。

(19) 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一，《与严老伯书》，页一一七。

(20)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五二二。

(21)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十。

(22) 洪大容、李德懋：《乾净衕笔谈·清脾录》，页七十。

(23) 金钟厚：《本庵集》，卷三，《答洪德保》，页三八一。

(24)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页五四六。

(25) 闵鼎重：《老峯燕行记》，页三八七。

(26)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页一九七。

(27) 《朝鲜王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五月七日，甲午条。

(28) 李玄锡：《游斋先生集》，卷十三，《乞屏退卒撰明史疏》，页四八五。

(29) 李玄锡：《明史纲目》，《明史纲目序》，页1b。

(30) 李玄锡：《游斋先生集》，卷十三，《乞屏退卒撰明史疏》，页四八五。

(31) 徐命膺：《保晚斋集》，卷七，《纲目新编序》，页二〇〇。

(32)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九十三。

(33) 闵鼎重：《老峯燕行记》，页三九三。

(34) 李田秀：《入沈记》，页二三六。

(35) 笔者曾于复旦大学古籍部检阅这两种刊本，除序不同外，内容是一致的。权以生辑：《史要聚选》，上海：复旦大学古籍部藏清乾隆元年（1736）朝鲜由洞刻本；权以生辑：《史要聚选》，上海：复旦大学古籍部藏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重刻本。

(36) 李玄锡：《明史纲目·附录》，页三十七。

(37) 朴世茂：《童蒙先习批注》，页一八五—一八六。

(38) 朴世茂：《童蒙先习批注》，页一八六。

(39) 朴世茂：《童蒙先习批注》，页二四三。

(40) 李万运：《纪年儿览》，卷前不着页码。

(41) 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一，《与秋书》，页一一六。

(42) 归徕老人：《震史一统》，《序》，不着页码。

结语

重新思索本书开篇提供的两张地图，关于绘制者的目的，不妨留待史家细细深究。我深信谜底终有揭晓的一天，因为时间能够没收各种线索，却始终无法击倒真相。至此，还有一些关于“中国地图”“天下图”的故事，协助我们透过另一双眼睛，体验朝鲜使臣的视界。

朝鲜人不是唯一的幸运儿，拥有往来朝鲜和中国的门票。转换视角，才能描绘燕行的不同风景。展开一本名为《舆图》的画册，首先引人注目的，通常是右侧的“鞑子”，即朝鲜人眼中的“满洲人”。这张图展示了朝鲜人对满洲人的各种想象，他们面部扭曲变形，丑恶无文，说得更直接，这不是人类，而是“禽兽”。图旁的文字提及：“鞑子多丑恶，头戴红毡帽，衣与时制无异，耳垂铛。”基于朝鲜知识人的立场，完全可以理解，何以当时的朝鲜人如此描绘满洲人。因为这是想象的真实，观看者有心，绘画者有意，互为表里。

将目光聚焦在“鞑子”身上，强调朝鲜读书人思念明朝的特殊现象，这固然有趣，却也限缩了朝鲜世界观的格局。事实上，“思明”不应该是朝鲜世界观的全部，左侧的“西洋人”提醒我们，北京不只有汉人和满人，还有从世界各国涌入的人物，他们都在创造历史。根据《舆图》绘者的认识，西洋人“多深目高鼻”，来往东西，服饰与满人和汉人相同。这些穿着中国服装的西洋人是寓居北京的常客，为明清两代的宫廷服务。



图21　《舆地图》中的“㺚子”与西洋人

（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OPEN ）



图22　金允谦（1711—1775），《胡兵图》

（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

这同样是一幅满洲人的画像，却与前图完全不同。两者之间的矛盾益发凸显朝鲜人眼中的“蛮夷”的两面向，两者都是真实，细致描绘的“胡兵”则是眼前的真实

燕行即世界，中国仿佛巨大无垠的交流场域，文化相遇的浪漫引诱有心人靠近。朝鲜贡使早知西洋人的存在，清代的朝鲜使者前仆后继登门造访，拜访北京天主堂的朝鲜客人络绎不绝。1766年，洪大容曾表示：“康熙以来，东使赴燕，或至堂求见，则西人辄欢然引接。使遍观堂内异画神像及奇器，仍以洋产珍异馈之。”[(1)] 康熙年间（1662—1722）流连北京市肆的朝鲜使臣，没有忽略天主堂。西方传教士也乐于与之交流，大方地向来自白衣君子国的客人介绍各种器物，甚或奉送小物什，作为伴手礼。

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器之（1690—1722）就是那位频繁造访天主堂的朝鲜人。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和汤尚贤对李器之极其礼遇，双方谈论了不少关于科学技术的问题。值得

注意的是，两位传教士曾慎重地询问李器之，如何来往中朝两地，又问朝鲜的城市规模和民生状况。为荣耀上帝而来的外邦人，希望将福音传播得更远，直到东方的尽头。汤尚贤明白地说："吾们欲出往朝鲜，作天主堂，使天主之教，无远不行。"(2) 李器之吓坏了，他只能不断推托，借故转换话题。

相较于白晋传教朝鲜的企图，更令我关心的是传教士赠送的礼物，他们备妥"自鸣小钟""千里镜"以及"坤舆图"，(3) 期盼借此与朝鲜客人拉近关系。自鸣钟就是时钟，千里镜则是望远镜，至于坤舆图，想必就是传教士绘制的世界地图。今人眼底一场再简单不过的相遇，无意间启动了文化交流的开关，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以及世界观，悄然走入朝鲜。(4)

西洋知识东传朝鲜，不是康熙年间的专利，甚至不是清代的独特现象。万历十年（1582），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计划前往大明传教，他先抵达澳门，修习汉文。这位勤奋的"西儒"颇具才华，一路向上爬，结识了不少贵人，最终深得中国儒生的赞誉，如高阶文官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李甚至受洗，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这不是一段独属中国史的故事，因为世界向所有人发出邀请，只要你愿意一试。

万历三十年（1602），利玛窦绘制出一幅历史上最知名的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这不是中国第一次目睹"世界"，却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深受震撼的不只有中国人，肩负政治使命的朝鲜使者亦牵起这段最具文化意义的缘分。1603年，朝鲜使者李睟光（1563—1628）出使大明，他提及两位随团使节李光庭、权憘在北京购得《欧罗巴国舆地图》，这地图一件六幅，其实就是《坤舆万国全图》。

李睟光对这幅地图评价甚高："其图甚精巧，于西域特详，以至中国地方暨我东八道、日本六十州。地理远近大小，纤悉无遗。"(5) 显然他颇信服利玛窦的手笔。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坤舆万国全图》问世后一年，朝鲜使者就揣着它返乡，这是天造地设的安排，燕行是迈向世界的第一步。然而，今人目为"真实"的地图，不是李睟光脑中关于世界的全部，诸如"裸壤国""永结利国""户人国"，均是与"欧罗巴国"相提并论的"外国"。朝鲜的世界观不断扩充，与此同时，未知与陌生也被弃置在地图的四周，在竭尽此生都无法见证的千里之外。

即使是充满悲情的明朝末年，知识仍在开花结果。崇祯三年（1630），郑斗源循海路朝天，他没按大明规划的路线前进，在山东登

州停留二十余日。其间偶遇大明将领、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1582—1632）。孙元化擅长使用火器，特别是西洋人打造的大炮。当时一位名叫陆若汉（Johannes Rodriquez）的传教士，奉大明皇帝的命令，在此协助军队学习使用火器。郑斗源请随行的翻译官向陆若汉学习天文和历法，军官则是因之熟悉“红夷大炮”的操作方法。

还有更多朝鲜使者与世界偶遇的故事，朝鲜王子李□早逝的兄长李溰（1612—1645），在沈阳和北京担任人质的岁月，结识了汤若望（1591—1666），二人成为好友。李溰启程返国前，汤若望赠送他若干西方学问的翻译书，以及一座地球仪。李溰颇中意地球仪，计划归国后大力推广，可惜天不假年，成为绝响。

上述线索揭示了阅读地图的新方法，这些知识根于西方、来自中国，在18世纪之前已源源不断输入朝鲜。钻研天下图的人直言这张圆形地图与西式舆图有关，少有关心朝鲜燕行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我眼中，他们就是隐身于地图之下的藏镜人。笔者同意，西方的圆形地图是解开天下图谜底的关键，但不应放大《坤舆万国全图》的影响。这地图着实太大，一件六幅，长一百五十二厘米，宽三百六十六厘米，不适宜运送，也不便欣赏。

《坤舆万国全图》是重要的知识根源，但影响朝鲜更多的，应是传教士缩小复刻的版本，是摆在北京琉璃厂的取购方便的各种仿本。知识流传的脉络，需要从最普及的地方寻找答案。笔者曾寓目一本地图集《各国图》（奎章阁，古2802–1），第一页是“天地全图”，是西式的世界地图。绘制者为了在一页之内交代“全球”，于是以中国为中心，缩小各地，塞于一处。这具备“地圆说”的本质，在坚持中国中心的同时，更向读者展示世界远比中国辽阔的遐想。这幅地图的左上角用红笔写着“燕肆榻本，三才一贯图摹画”，提醒吾人，这是“中国制造，朝鲜代工”的产物。

这个在北京的摹本，出自朝鲜使者之手。他们将所见所闻“拍照摄影”，以图存证，于是诸如《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三才一贯》，都是摹画的对象。夹杂着中国和西洋，朝鲜带回最“真实”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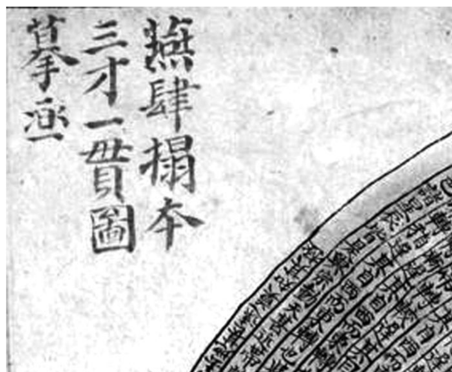


图23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各国图》，《天地全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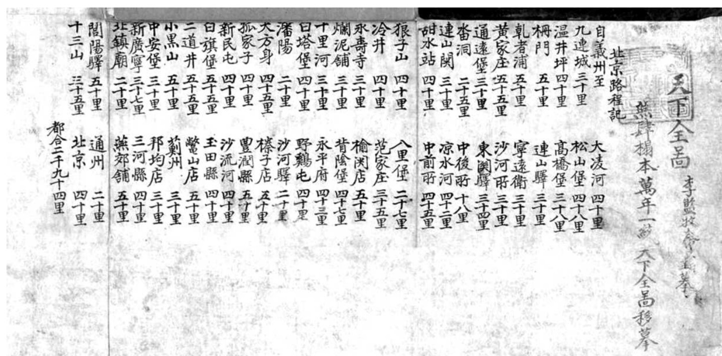

天下全圖
燕肆搨本萬年一統天下全圖移摹
北京路程記
自義州至
九連城 三十里
温井坪 四十里
柵門 五十里
乾者浦 五十里
黄家庄 五十五里
通遠堡 三十里
沓洞 二十五里
連山關 三十里
甜水站 四十里
狼子山 四十里
冷井 四十里
永壽寺 三十里
爛泥鋪 三十里
十里河 三十里
白塔堡 四十里
瀋陽 二十里
大方身 四十五里
孤家子 四十里
新民屯 四十里
白旗堡 五十五里
二道井 五十五里
小黑山 五十里
中安堡 三十里
新廣寧 三十七里
北鎮廟 二十里
閭陽驛 五十里
十三山 三十五里
大凌河 四十里
松山堡 四十八里
高橋堡 三十八里
連山驛 三十里
寧遠衛 三十里
沙河所 三十里
東關驛 三十四里
中後所 十八里
凉水河 四十二里
中前所 四十五里
八里堡 二十七里
范家庄 三十五里
榆関店 五十里
背陰堡 四十七里
永平府 四十三里
野鷄屯 四十里
沙河驛 二十里
榛子店 五十里
豐潤縣 五十里
沙流河 四十里
玉田縣 四十里
鼈山店 五十里
薊州 三十里
邦均店 三十里
三河縣 四十里
燕郊鋪 五十里
通州 二十里
北京 四十里
都合二千九十四里

图24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天下全图》，《北京路程记》

中国是朝鲜燕行使的文化母国，旅行以政治和外交为名，却处处飘散乡愁。他们在沿途与中国读书人言辞交锋，目睹山海关的雄伟，亲临北京城的壮丽，曾有人感动落泪，也有人失落惆怅。朝鲜使者以中国为题的书写，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空间，里头封存着中国、西洋与朝鲜自己的声音。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离乡远行是少数人的特权，待在国内的人渴望直面世界。于是，使团的见闻是魅力十足的新闻，引诱朝鲜读书人涉入其中。清代中国充斥“胡虏夷狄”的认知是虚假，亦是真实。因为未曾亲身远行的多数，唯在著述和阅读的过程中，体会中国的存在。燕行即世界，这就是朝鲜使者的秘密。

(1)　洪大容：《湛轩燕记》，《刘鲍问答》，页四十一。

(2)　李器之：《一庵燕记》，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册十三，页六十四。

(3)　李器之：《一庵燕记》，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册十三，页三十五。

(4)　本书以下关于朝鲜使者与西学的关系，主要参考李元淳：《朝鲜西学史》。

(5)　李睟光：《芝峰类说》，卷二，《诸国部·外国》。

同场加映：那些年，东亚其实很热闹……

使者彻夜未眠：申维瀚在日本的文学苦恼

日本最早提及“书籍”的记载见于《古事记》。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应神天皇（270—310）命百济国（公元前18—公元660）进贡书籍，于是百济派遣了一位和迩吉师（亦有一说称王仁）前往日本，他带了两种书，一是《论语》，一是《千字文》。

我们自然不会真的认为在此之前日本没有书籍，或是和迩吉师千里迢迢跑来，居然只带了《论语》跟《千字文》两种书。我想这个故事更有意思之处，应该是清楚地揭示了一条书籍旅行的路线。例如诞生于中国的《论语》辗转跑到朝鲜半岛，又经由百济国人之手，漂洋过海，落脚日本；绵延千里的书籍旅行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已经达成了。

每个人都能从里头找到自己喜欢的元素。尤其对那些踏上日本国土的朝鲜人而言，他们宛如和迩吉师一样，是造访东洋的贤人，为日本带去更好的文化。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朝鲜人除了有去北京逛逛的“燕行使”，也有前往日本的使节团，可以简单统称为“通信使”。虽然朝鲜和日本两国因为“壬辰之战”的关系，冲突不断，但战争终究结束了。尚且不谈如何收拾善后，适当地恢复外交关系，实是当务之急。于是两国首先就战争期间归返“俘虏”一事展开谈判，也因为如此，出现了江户时代的第一批通信使。

尽管通信使被派往日本的次数不多，贯穿江户时代二百六十四年间也只有十二次，却留下数量惊人的相关资料。首先，朝鲜人是当时少数得以深入日本内地的外国人，颇受日本上下瞩目，加上日本的文化界长期钦慕朝鲜，频繁地与朝鲜人“交朋友”，于是留下许多宝贵的资料。

其次，朝鲜方面一如燕行使者的情况，随行人员有的写了日记，有的则是整天收集撰写官方报告的资料，也记下不少所见所闻。此类文字记录像是坐落于朝鲜和日本两地之间的时空隧道，釜山、大阪、京都与江户的风景，两国知识分子各自的观察，使者写在日记里的抱怨以及行经富士山下的赞美，每一则记述都仿佛如实再现了过去的某个细节。

这些文献背后藏着不同目的，有的想窥伺日本的国情民俗，以及政治局势；有的保存了友情记录，诸如读书人之间的笔谈记录，或是单纯的游记。真要说这些文字的价值，如果我们从当时“外交工作”的角度来看，就好比“维基解密”所曝光的政府文书一样，里头是朝鲜人直接的没有隐晦的日本理解，夹杂着客观与偏见，越矛盾越显真实。

如果要为朝鲜人的日本记录下几个关键词，两国交战之后，17和18世纪的外交工作不仅仅是“亲善友邦”，观察他国民情也只是刚刚好而已，随行人员的另一重责大任就是“宣扬国威”。

什么是宣扬国威？从当时两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准备工作即可瞧出端倪。例如，两国的外交人员事先磋商一份清单，明白列举你要准备什么，我要做好什么。朝鲜方面有这样的安排：选择马术精熟、弓技绝妙的人，以供表演所用；随行的画家必须由经验老到、有显著成绩的人才能担任。 (1)

这些肩负特殊技能的朝鲜人，就是朝鲜国的代表，赴日宣扬国威。不过，上述不少还算是“武戏”，为了印证朝鲜的人才文武双全，当时在家孝顺母亲的申维瀚（1681—1752）收到一份公文，被告知他即将前往日本，等待他的职务是使节团中的重要角色——“制述官”。

1719年，朝鲜使者一行四百七十五人，带着朝鲜国王的“国书”（国王给幕府将军的信）前往日本，目的是恭贺三年前新就任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朝鲜官方为了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朝鲜人文化之深厚，特地拣选时年三十八的申维瀚担任“制述官”，也就是专门请来写诗文歌赋的好手。

按照申维瀚的说法，设立制述官的缘由是：“倭人文字之癖，挽近益胜，艳慕成风，呼以学士大人，乞诗求文，填街塞门，所以接应彼人言语，宣耀我国文华者，必责于制述官。” (2) 日本对文学的喜爱，促使朝鲜在宣扬国威的项目中创造制述官的位子。

这或许听来有点夸张，但一如和迩吉师带来《论语》和《千字文》的寓意，在三四百年前日本的文化界，朝鲜国一直因为汉文素养较高，享有极大的声誉。当然，申维瀚也知道上述的典故，在他心里，没有朝鲜人传播文化（带书来日本），日本根本没有文字。

申先生的观点当然是极大的误解，日本早有文字，有意思之处应该是他为何如此作想。这得考虑到朝鲜的读书人长期倾力学习汉文化，堪称当时中国以外最熟悉汉文化的国家。相形之下，日本不像中国、朝鲜

以“科举取士”，江户时代不仅是“武人社会”，同时也是世袭社会，导致学习文学的儒生没有好的出路。换句话说，江户时代的日本缺乏一个很强的社会诱因，令日本人愿意跻身儒生之列。有趣的是，汉文化的价值在当时仍被日本人（尤其是文化界）认同，因此即使不少人不以儒生为业，部分医生和武人也会学习汉文。

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顶级读书人的造访，对日本社会仿佛震撼弹一般。第一，自江户时期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以后，尤其是远离海港的内陆，一般庶民几乎没有见过外国人。不论是出于好奇，或是真心仰慕，朝鲜人一来便受到极热情的接待。第二，这对当时的日本读书人而言，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他们得以通过笔谈和翻译借机与朝鲜人切磋汉文。

透过申维瀚的眼睛，我们得以一窥朝鲜人眼中的日本文学，以及他们多么受到日本百姓欢迎。他的日记《海游录》中，时常评价访日期间的朋友。当说到日本僧人的时候，他认为“其人与文章皆不足道”。(3) 至于幕府将军专用的文学人士，如担任大学头的林信笃（1645—1732），都被申维瀚评为“观其文笔，拙朴不成样”。(4) 申维瀚眼中的日本汉文学，着实不值一提。

这可以说是朝鲜人单方面的自大吗？

如果从日本人的举动看来，朝鲜人确实于汉诗文有突出的表现。先谈谈一般民众，当申维瀚一行人抵达对马岛的时候，他形容当时的场景是：“观光男女，簇簇如鱼鳞，或坐堂，或窥帘，或立墙外，或在路旁。”(5) 至于稍微懂汉文，或者说喜欢汉文的日本人就更不用说了，申维瀚每经过一个地方，必定是：“群倭聚集如云，时时有夹纸笔而乞书者，余或随兴而写。”(6) 当申维瀚拿着毛笔写字的时候，甚至有日本人整天在旁观看学习。(7)

申维瀚就像文学明星，每次聚会都是众人眼中的焦点，他写的每首诗仿佛都是最高超绝妙的文学作品。他表示，日本人从他手中拿走诗文时，不论身份高或低，都把朝鲜人视为“神仙下凡”，那些诗文则被当作珠玉宝石般珍贵。即使是抬轿子的下人，或是不识字的人，也以得到朝鲜人的书法为荣，对他们顶礼膜拜，感谢再三。(8)

不过，每天应接日本人的“求诗”“求文”，看似达成了宣扬国威的任务，却苦了申维瀚。他虽然经由官方接待，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就连游览富士山都是日方派人“抬轿子上去”。但是，应接不暇的“文债”仿佛扎

在心头上的一根刺，挥之不去。这些乞求诗文的日本人时常挤在使节团的住处，从白天到黑夜。这给制述官申维瀚带来许多压力，毕竟他来到日本的工作就是专门写诗文歌赋。

1719年冬天，朝鲜使节团行至京都附近的吉田，或许有几个人得以四处闲晃观光，不过申维瀚已无暇欣赏风景，因为令人苦恼的文债不断累积，他有时一天就得挥毫数百幅字才能交差。最终，他甚至无法安心入眠，几个通宵熬夜，只为了写出应付日本人的汉诗。

可以想见，那一夜万籁俱寂，冬令时节带来些微寒气，使者彻夜未眠。

没有共识的共识：藏在外交辞令里的战争

外交场合像是由无数“礼仪”交织而成的图像，每一张都是精致的盛大演出。参与者无不露出开朗的笑容，一切是那么准确、到位。当我站在远离外交场合的对岸，与彼端的那一小段距离，仿佛产生一种美感。它掩盖了外交过程的种种折冲、谈判、讨价还价，以及时有时无的争吵。违和感在双方握手、交换礼物之间，完成礼仪的那一刻，烟消云散。

虽然时常阅读朝鲜人到北京的日记，姑且称得上是广义的“外交文献”，牵涉不少“礼仪”，我却对此一直没有那么理解，或应该说——“我没办法理解”。

朝鲜使节抵达北京，按例由中国官方款待，如接风洗尘有“下马宴”，即为慰劳朝鲜人风尘仆仆而来，在他们下马后的赐宴。紧接着的是一连串“朝廷礼仪演练”（古称演仪、习仪），教朝鲜人各种宫廷礼仪，以免他们在朝见皇帝时出糗。诸如此类的“繁文缛节”，基本上可以总结我对外交、礼仪的看法：它们像是例行的事件一样飘过眼，而我不曾深究其意义。

直到最近，翻阅朝鲜人到日本的日记和报告书，它像是美术馆导览员的解说，为我点出画里的秘密。数百年前的外交礼仪如果那般无趣，当时各国的谨慎遵守与锱铢必较，不就显得毫无意义？事实是，如果我仅仅将目光摆在外交礼仪上，诸如朝鲜人拜见官府的次序、双方的称谓用语，只在乎这里头的名堂，却不认真思考背后的含义与双方的用心，则永远无法道出礼仪在古代的定位。

本文旨在述说横亘日本和朝鲜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外交工作”，它像是经过层层包装的祭典，每一处的细节都揭示了双方的角力与企图。我们只需要稍稍站得远一点，就能看见他们争吵的原因，在那双方模糊的外交空间里，一点点体会古代外交工作的意义。



这个故事得从一封信开始说起。

江户时代，朝鲜向日本派遣使节，通常是为了庆贺新的“将军”（征夷大将军）即位，这在当时被称为“袭职”，也就是新的政治领导人就职。江户时代虽然在名分上有“天皇”存在，但只是一个虚位元首，实质统治的权力掌握在德川家手上，江户的幕府将军才是政治中心。朝鲜作为日本的邻居，双方派遣使节相互问好，实属意料中事。

1709年，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去世，同年新的将军德川家宣（1662—1712）袭职。在家宣就任的来年，日本通过专职负责“朝鲜外交事务”的对马藩，邀请朝鲜派遣使节来日，恭贺新将军的诞生。就在双方处于磋商的阶段，1711年，对马岛藩主宗义方（1684—1718）特地给朝鲜官员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日方希望朝鲜使节依例带来的“国书”，能够称德川家宣为“日本国王”。

在继续深入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谈谈什么是“国书”。

各位应该还记得申维瀚的故事，他作为“制述官”前往日本写诗，整个使节团统称为“朝鲜通信使”。

为什么叫作“通信使”？因为使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送信”，也就是将朝鲜国王的信通传到幕府将军眼前，而这封出自国王意旨的信被尊称为“国书”。我们时常可以从当时的绘画作品中，一窥朝鲜使节团多么重视国书。国书代表着国王，因此即使只是薄薄的一张纸，也需要出动八人扛轿“抬着走”。



图25　《国书楼船图》

（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OPEN）

朝鲜国王写信给幕府将军，里头的措辞可以说是“字字斟酌”，因为稍一不慎就可能“落下风”。不论是行文的语气，还是格式，都要求“对等”，至少不能让自己受委屈。如此想来，对马岛藩主宗义方要求朝鲜方面称德川家宣“日本国王”，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动。

朝鲜国王刚得知这个请求时，当下的反应是：“原本我们叫幕府将军‘大君’，已经七十七年了，怎么又要改成国王。现在我们正在磋商阶段，突然就来这一招，跟之前临时更改礼品的事情完全不能比。这必须严厉地回应，先请有关单位讨论一下。”(9)

在此之前，朝鲜国书称呼幕府将军“日本国大君殿下”，日方突然要求改为“日本国王”，一来是不知为何改动，二来是这样的称呼会不会破坏了“和谐”呢？

外交场合中，每个人的“称谓”都是有学问的，为了保持对等，要尽量寻求共识，剔除上对下、有主从关系的用词，避免损害国家的尊严。如果我喊你日本国王，你说我是朝鲜小老弟，那朝鲜不就向日本“称臣”了吗？通信使既然是外交工作的产物，双方你来我往的角力，争取国家的“面子”，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事。

奇怪的是，1711年，幕府将军怎么想当“日本国王”了？更重要的是，难道他不是吗？

顾名思义，“国王”就是一国之君，政治的中心，对外的代表。德川家康取代丰臣家，统一日本，承袭“征夷大将军”的名号之后，自称“国王”是极为正常的。因此日本与朝鲜的往来，一直都是“幕府将军”与“朝鲜国王”之间的事情，双方都是各自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朝鲜国王明白地说，“大君之称，已至七十七年之久”，也就是说在1711年之前的七十七年里，朝鲜国书上一直称幕府将军“日本国大君”，而不是“日本国王”。显然在对外的称呼上，德川家觉得征夷大将军的简称“将军”不是那么对等，于是采用了“大君”。毕竟在当时的清朝、朝鲜，“将军”不过就只是中阶的武职，你跑到清朝说我是日本将军，没有人觉得你重要到代表一个国家。

相形之下，“大君”就不同了，典故出自《易经》“大君有命，开国承家”之语，意思就是君王。骆宾王（640—684）那篇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里头有一句就是奉劝各地诸侯“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

命”，鼓舞大家起兵勤王，不要忘掉唐朝天子了。大君在中国和日本的语义，皆指向最大的君——君王。

同时，根据日本学者池内敏的研究，他强调日方使用“大君”还有一层含义，典故出自“大树源君”。简单地说，日本最尊贵的血统世系是天皇一脉，而源家与此有关，德川家自称大树源君，就是借此抬高自己的出身，这是大君的第二层含义。

问题是这套看似合理的逻辑，一面对朝鲜就不那么名正言顺。

熟悉韩国古装剧的朋友对“大君”一词估计颇感亲切，但绝对不会联想到“国王”。在朝鲜的语境里，“大君”指的是“嫡子”，是朝鲜国王的小孩。因此对朝鲜来说，“日本国大君”能够有不同的解释，他们派遣使节去日本，就像是“上国”出巡，毕竟朝鲜的汉文化较高，连名分上也占了点便宜。

日本人当然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也想在这个“看似对等”的杠杆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对日本而言，朝鲜人是“来朝”“来聘”，他们是入贡，这从当时日方绘制的图画名称“来朝图”“来聘图”，就能知悉其心态。按当时的外交惯例，先向对方送国书，或者是提出邀约，就代表着臣服，气势自然也就弱了一阶。因此日本与朝鲜的外交工作，从来就不是“幕府将军”vs“朝鲜国王”，一直都由对马岛主担任中介。

对马岛负责传递国书，与朝鲜磋商外交事宜，免除不少尴尬。对德川家来说，对马岛主就是他的臣下，请他处理这件事情很正常，而且由“对马岛”联系“朝鲜国”，不就代表朝鲜国的等级跟对马岛一样吗？同样的，对朝鲜来说，每次送出邀约的都是日方，是人家先邀请我，自己不是占了上风吗？

大家都在看似对等和谐的画面中自我安慰，利用着一块模糊地带，宣称那里是属于我们的。

那么，“日本国王”是一道解药吗？

1711年，德川家宣即位不久，他听从谋臣新井白石（1657—1725）的建议，对外改称日本国王，不再使用日本国大君的名号。新井白石的逻辑简单明了，“大君”的意思既然是君王，那日本名义上的君王是“天皇”，这样等于冒犯天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天皇就当名义上的主，德川家当政治上的主，因此直接称“国王”才是最适切的。

新井白石的主张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反倒是在朝鲜，这个争议很

快地结束了。朝鲜官员向国王表示："今天日本自己称王与否，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现在知道他称王了，那么国书上就写日本国王，也没关系。"(10) 朝鲜国王也顺从了，于是这事在朝鲜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朝鲜接受改动是有原因的，具体说起朝鲜的外交工作有二：一是与中国相处，也就是"事大"；一是与日本交往，则称为"交邻"。邻居相交的原则就是诚信对等，日本国王和朝鲜国王两相平行，没有吃亏与否的问题。我们不可以忘记，当时东亚列国的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册封体系"，不论是明代还是清代，朝鲜国王都经由中国册封。换句话说，朝鲜国王头上还有个"皇帝"，日本改称国王，对他们来说就是回到这个"朝贡体系"罢了，朝鲜的地位不受影响。

在当时如果想去大明贸易，与大明交往，就得买票入场（勘合），成为"朝贡体系"的会员。日本国王是有前例的，明成祖朱棣（1360—1424）就曾册封足利义满（1358—1408）为日本国王。后来壬辰倭乱期间，大明与日本也一度几乎讲和，其中一条就是册封丰臣秀吉（1537—1598）为日本国王。 (11) 德川家执政后，一度遵循日本国王的用法，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改为大君。 (12)

日方使用"大君"就是希望脱离这个系统，独立自主，不受中国影响。

我们能看到日方试图突破，却处处受到掣制的尴尬处境。如果称大君，一来对朝鲜有点吃亏，二来与天皇有所冲突。如果称国王，那么代表回到中国的世界秩序里吗？

关键一直在心态：日本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臣子。对于朝鲜更是如此，姑且不论古代传说日本神功皇后征服朝鲜半岛，近一点也有丰臣秀吉出兵征战，朝鲜在某些日本人心中"本来就是我们的"，而且贫弱可欺。因此朝鲜通信使去日本，被视为来聘，朝鲜带来的礼物被理解为"特地献上地方特产"（土物）。朝鲜人的造访，等于替幕府将军进行政治宣传，借此展示德川家的权势，好让其他地方诸侯（大名）知道：我在外面颇具威望，你看朝鲜人都来了。

问题就在这块模糊的灰色地带，大家都想插旗争胜。名为"诚信""对等"，所以没有一方愿意吃亏，都想占尽便宜。结果是凭借着一块模糊的外交空间，朝着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发挥"；一个出使，各自表述。

朝鲜使节认为日本没有文化，看不起他们的儒学和汉文学，于是每到一处就讥笑日本人的汉诗能力低下，谈到自己就说："明朝灭亡之后，

我就是继承汉文化的第一人。”（我独为东周。　　）日本人也轻视朝鲜人，朝鲜来日本是为了拜见将军，日本才是中心，所以“外夷”来朝。

重大的历史事件、相互较劲的文化意识，两者像是随时能够引爆的炸药，也像是一把抵在使节背后的刺枪，双方都有不能后退的立场。于是看似平等和谐的外交场合如同战争，国书里头的称谓、几里外下轿步行的规矩，里头没有诚信，却样样高呼对等的口号。

1711年，朝鲜依约派出通信使，使臣赵泰亿（1675—1728）、任守干（1665—1721）一行人风尘仆仆，刚落脚对马岛不久，日方高层随即请对马岛主“转达”朝鲜使者，希望更动这次的许多礼仪。朝鲜使节还没搞清楚状况，出于本能地几次拒绝：“此事既非前规，且在节目讲定之后，未及禀定于朝廷，决难之。”(13)

后来朝鲜、日本两国因为“国书”发生争执，两派人马在每天“光鲜亮丽”的外交场合后，卷起袖子，板起脸孔，义正词严地相互抗议。任守干的《东槎日记》写下了这段故事，当时他们认为日方给朝鲜国王的国书触犯忌讳，要求重写，并说“未改之前，有死而已”(14)，又说“未改之前，绝无归国之理”(15)，坚持不肯退让。

日方一开始先好言劝说，后见毫无效果，最终收起笑脸，丢下一句：“使道虽不畏死，失欢败盟之后，两国无辜生灵，将入于涂炭，岂不念及于此乎？”(16) 战争是恫吓敌人的最佳工具。

形势比人强，毕竟江户是日本人的地盘，任守干一行共四百八十一人，还是没能坚持，选择离开。他们归国后，遭到朝鲜官员极力攻击，罪名是没能在千里之外坚守国家的尊严，(17) 惩处是使臣和翻译官全都罢官，有的被流放，有的则被勒令返乡。



我们可以轻易地为这个故事下结论，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突然改变礼仪，国书犯了忌讳又不改。那些朝鲜使节也真没骨气，奉命出使就代表国家，稍有损害朝廷体面的事情，就该据理力争，有死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尝试站得远一点，再远一点，我们就能看到支撑着双方对抗的力量与历史渊源。

朝鲜自从壬辰倭乱之后，对日本有着极大的仇恨，通信使的出航像是另类的复仇。他们选拔最好的马术专家、画家、文学家、弓箭手，在

日本国土上喧腾着精美的大鼓，穿着雅致的大明衣冠，这不只是为了展示最好的仪容，同时也是宣告自己比较有文化。

日方也有自己的企图，他们想摆脱中国的朝贡体系和华夷秩序，新井白石的改革想解决幕府将军和天皇之间的名分矛盾。日本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规则，而且证明“它可以运作”。（当时反对新井者也不在少数，后来也确实改回“大君”。）

双方都有所坚持，都有各自的历史成因，于是引发了这场礼仪纠纷。值得注意的是，仔细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我们难以听到“个人”的声音。在外交场合，国家的力量在每一个人身上放大，言辞上的针锋相对使得画面张力十足，像是一张力量满盈的弓，弦随时可能断掉。

有没有可能缓解冲突？有没有那么一点的可能，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1719年，朝鲜又派遣了一次通信使，使臣申维瀚始终瞧不起沿路接待的日本人。旅行的最后，他曾与著名的日本儒者雨森芳洲（1668—1755，通朝鲜语）有一段谈话。我们可以想象，芳洲鼓起勇气，慢步凑近申维瀚，他先是说：“吾有所怀，欲乘间言之。”接着才缓缓说道，“窃观贵国人所撰文集中语及敝邦者，必称倭贼、蛮酋，丑蔑狼藉，有不忍言者。”(18)

雨森芳洲平时穿着儒服，对汉文化有所向往，又精通朝鲜语，自然与朝鲜使臣有不错的交情。(19) 在这个场合，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雨森芳洲希望“对等”“诚信”的外交关系，能够从片面的承诺达成实质的履行。

申维瀚是这样回答他的：“平秀吉为我国通天之仇，宗社之耻辱，生灵之血肉，实万世所无之变，为我国臣民，谁不欲脔而食之，所以上自荐绅，下至厮隶，奴之贼之，语无顾藉，发于文章者，固当如此。”(20)

雨森芳洲看申维瀚如此“义愤填膺”，知道也没法再说下去，转而提及：“你这样说当然没错，不过你们都喊我们‘倭人’，这也不是我们喜欢的称呼方式。”他诚挚地继续说道，“今后则愿饬下辈，呼我以日本人可矣。”(21) 最终，申维瀚没有答应，此后的朝鲜人也继续称呼日本人为“倭人”。

至今，我从未从事过外交工作，也没有一次需要向别人澄清“如何称呼我”。但是我能想象身穿儒服的雨森芳洲，揣着诚恳的口气，向朝鲜客人诉说“可以的话，请叫我日本人”的请求。我希望如果还能有机会，在

文字记录之外存在一个可能性：雨森芳洲鼓起勇气，又说了一次自己的想法。这一次申维瀚不急着表达自己的愤慨，宣示朝鲜的大义凛然，他能够尝试聆听雨森芳洲说更多话，并愿意称呼他为日本人。

(1) 这份清单见仲尾宏：《朝鲜通信使》，页一一六。

(2) 申维瀚：《海游录》，页二四四。

(3) 申维瀚：《海游录》，页三〇七。

(4) 申维瀚：《海游录》，页三一七。

(5) 申维瀚：《海游录》，页二五八。

(6) 申维瀚：《海游录》，页二九一。

(7) “终日在傍，意颇惓惓”，出自申维瀚：《海游录》，页三二一。

(8) “求得我国诗文者，勿论贵贱贤愚，莫不仰之如神仙，货之如珠玉，即舁人厮卒目不知书者，得朝鲜楷草数字，皆以手攒顶而谢。”出自申维瀚：《海游录》，页三六五。

(9) “大君之称，已至七十七年之久，而请复之说，猝发于意外，此非向日礼单之比。不可不严辞峻斥，令庙堂禀处。”出自《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癸丑条。

(10) “今之自王，非我所能禁，而知其称王，则改送国书，固无所妨。”出自《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乙卯条。

(11) 册封诏书原件现藏大阪历史博物馆。

(12) 如柳川一件，请参考仲尾宏：《朝鲜通信使》，页二十六—二十九、六十九—七十一。

(13) 任守干：《东槎日记》，页一七六。

(14) 任守干：《东槎日记》，页一九一。

(15) 任守干：《东槎日记》，页一九二。

(16) 任守干：《东槎日记》，页一九四。

(17) “人臣奉命出疆，少有难处之端，则随机应变，善为周旋，不然则死生以之，期于埋骨，事理当然。”出自《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二月七日，庚申条。

(18) 申维瀚：《海游录》，页三八〇。

(19) 雨森芳洲和新井白石的“朝鲜观”迥异，简单地说，新井白石是轻视朝鲜的，雨森芳洲则主张和平交往，平等对待。关于二人的朝鲜观，请参阅上垣外宪一：《雨森芳洲》，页一二九—一三三。

(20) 申维瀚：《海游录》，页三八〇。

(21) 申维瀚：《海游录》，页三八〇。

后记

本书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在一开始的构想中，它其实是历史故事书。自2017年7月在台湾出版后，常有朋友提及，将本书定义为“通俗书”根本名不副实，建议改口为“科普书”。读者很容易通过作者的背景、书名，判断一本书的“属性”。这种模式套用在我身上，答案不外乎是“一名历史学系出身、研究中朝关系的博士生”，而这似乎局限了这本小书的意义。说来或许令人发笑，出版后的苦恼与忧虑，较多是向友人澄清与阐述《从汉城到燕京》是什么，而非深入地讨论内容。

我会想写这本不成熟的小册子，原因除身为一名博士生的“学院身份”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原因。我从高中时期开始较广泛接触历史后，特别着迷于剧烈变动的时代下，人们的抉择与行动。例如两宋之交的“南北人”“归正人”，或是清初的“明遗民”，他们深刻地触动着生活在21世纪的我。固然得以为此添加不少学院色彩的按语，或借用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分析方式，揭露更多“学术的我”，然而事实很简单，赵园先生说“被光明俊伟的人格所吸引，是美好的事”，诚哉斯言。

由此我拜入林丽月老师门下，也是缘于本书出现的朝鲜知识人有太多太多吸引“明遗民研究者”的地方。探究具有魅力的思想文化，对我而言是致命的诱惑。尽管当我冒失地闯入这个研究领域时，关于朝鲜的“思明”议题已有极为丰厚的研究成果，如葛兆光、孙卫国、杨雨蕾诸位先生的著作是书案上永远不会下岗的守护神。更不用说张存武老师，我不敢擅用任何名词形容和评价老师的学术成就，只能仰望而已。

对于曾就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而言，“中研院”近史所是很奇妙的地方。修过丽月老师的课的同学都知道，郭廷以（1904—1975）先生是近史所的创办人，也是师大历史系的教授。郭老师教授“明清史”“中国近代史”，直从近代早期（early modern）一路向下，探究近代的形成。

此后不免受到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影响，亚洲学界开始关注朝贡体系、中国对外关系，乃至周边国家的历史。张存武老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入所，尽管他本打算研究中美关系，但从哈佛大学归国后，他倾注大部分的心力研究清代的中朝关系。这些回忆片段之间的联系，构成师大生活的日常，以及那有一搭没一搭

的与丽月老师、张老师的闲谈，全都积累成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而我总尝试著述说出来。

还记得写完硕士论文后不久，与罗乐然博士一同吃意大利面。当时我在许多方面遭遇无法解决的麻烦，心烦意乱之下遂当着他的面说道："此后不再研究《燕行录》。"现在想来冒失无礼，尤其是在几年后出版本书，更显得前后矛盾吧！但是，人的思想与言行本就随时可能改变，所谓的前后一致，乃至忽略情绪和境遇的判语，说得更多的是作者自己的话。

尽管已有所警觉，并严格按照古代遗存的文献考究和再现，本书或许不免也会有我"自我言说"的可能。值得庆幸的是，前辈学者的业绩，以及丰富的古籍数据，随时能纠正错误。"豆瓣读书"上卧虎藏龙的读者不啻期刊论文的审查者，虽然很害怕，但这样的机制才能更快找出问题。

不过评分和评语真的就能带领这个时代，让这个世界更好吗？有时候面店老板可能心情不好，有时候店里客人可能特别多。各种场合变幻莫测，而我们只见着眼前的那一刻。评分系统无法考虑到老板的父亲刚去世，或是刚聘入新人的窘境。评语自然也需要一定分量的"情绪"推动，才能督促人们打开手机，为"日常"写下几句自以为是的建言。

量化产生的数字指针，无法准确地承载"缘分""情绪""巧合"、人与人的各种相遇，以及一位作者深夜写着后记的心情。一碗拉面好吃吗？一本闲书好看吗？我希望这能是一本有趣的故事书。

2018年1月23日
台北厦门街

※本书2017年繁体版蒙刘序枫、张大春、蒋竹山三位老师指正，谨申谢忱。

主要登场人物

（各分类的排序按登场先后，名称按书中首次出现的称呼）

使者

郑昆寿（1538—1602）

本贯清州，朝鲜官员。壬辰倭乱期间，奉命担任请兵陈奏使，前往大明，说服明朝官员派兵援救朝鲜。

吴亿龄（1552—1618）

朝鲜官员，曾多次出使明朝。

洪纯彦（生卒年不详）

朝鲜翻译官，随郑昆寿前往中国，其间与明朝官员多方交涉。

施允济（生卒年不详）

朝鲜官员，与郑昆寿一同出使，担任使节团的副使。

郑澈（1536—1593）

本贯延日，在朝鲜国内以文学闻名，于壬辰倭乱期间出使中国。

柳思瑗（1541—1608）

本贯文化，壬辰倭乱期间担任急告奏闻使的书状官，后受封功臣。

权挟（1542—1618）

壬辰倭乱末期出使中国。

赵宪（1544—1592）

本贯白川，朝鲜官员，于万历二年（1574）出使中国，后死于倭乱。

鱼叔权（生卒年不详）

活跃于嘉靖年间，曾七次出使中国。

权拨（1478—1548）

朝鲜官员，曾于嘉靖十八年（1539）出使中国。

许篈（1551—1588）

朝鲜官员，同赵宪一起出使大明，担任书状官。

金堉（1580—1658）

朝鲜官员，最后的朝天使者。

李晚荣（1604—1672）

朝鲜官员，最后的朝天使者。

郑斗源（1581—1642）

朝鲜官员，曾于明末出使中国。

闵镇远（1664—1736）

朝鲜官员，曾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使中国。

李□（1622—1658）

朝鲜王子，父亲为朝鲜仁祖李倧。

成以性（1599—1664）

朝鲜官员，曾担任书状官出使中国，与李□是第一批被派往清国的使者。

李惕然（1591—1663）

朝鲜官员，曾担任书状官于顺治五年（1648）出使中国。

李德懋（1741—1793）

朝鲜官员，著名学者，曾担任奎章阁检书官，并于乾隆年间出使中

国。

徐浩修（1736—1799）

朝鲜官员，曾担任奎章阁检书官，并于乾隆年间出使中国。

李宜显（1669—1745）

朝鲜官员，曾于康熙六十年（1721）出使中国。

姜浩溥（1690—1778）

极度思念明朝的朝鲜读书人，伊始甚至不愿意食用清国的猪肉。

韩德厚（1680—？）

朝鲜官员，曾于雍正年间出使中国。

赵显命（1690—1752）

朝鲜官员，曾于乾隆年间出使中国。

洪大容（1731—1783）

著名的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期间结识了三位中国读书人，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裴三益（1534—1588）

朝鲜官员，曾于万历十五年（1587）出使中国。

朴趾源（1737—1805）

著名的朝鲜燕行使，他随堂兄朴明源（1725—1790）出使中国。

得龙（生卒年不详）

活跃于乾隆年间，本贯嘉山，自小来往中国和朝鲜，兼做买卖，负责处理使行团大小事务。

李基圣（生卒年不详）

1765年朝鲜使节团的随行军官，在北京寻觅眼镜时偶遇严诚和潘庭

筠。

洪檍（1722—1809）

朝鲜官员，1753年文科状元，1765年担任书状官出使中国，洪大容的叔父。

李器之（1690—1722）

朝鲜燕行使，曾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出使中国。

李睟光（1563—1628）

朝鲜官员，曾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出使中国。

君王

万历皇帝（1563—1620）

明朝第十四代皇帝，万历是其年号，又称明神宗，本名朱翊钧。他任内有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其中之一就是出兵朝鲜，抵抗日本入侵，史称壬辰倭乱。

丰臣秀吉（1537—1598）

日本战国时代大名，位至关白。晚年一手挑起壬辰倭乱，在战事结束之前离世。

朝鲜宣祖（1552—1608）

朝鲜王朝第十四代国王，名李昖。在其任内，党争加剧，又遭逢日本入侵，可以说不是一位太平君王。

努尔哈赤（1559—1626）

后金的创立者，他成功整合部落，成为能够威胁明朝的竞争者。

皇太极（1592—1643）

努尔哈赤之子，继承后金，并在任内改国名为清。他两次出兵朝鲜，第一次与朝鲜约为兄弟之国，第二次则是确立大清的宗主地

位。

李自成（1606—1645）

明朝末年的农民军领袖，最终打败明军，入主紫禁城。

朝鲜仁祖（1595—1649）

朝鲜王朝第十六代国王，名李倧，在位期间遭遇明清鼎革。

崇祯皇帝（1611—1644）

明朝末代皇帝，本名朱由检。1644年，李自成率兵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史家通常将此视为明朝灭亡。

朝鲜正祖（1752—1800）

朝鲜王朝史上著名的君王，本名李祘，他与祖父英祖两人，并称英正时代。

雍正皇帝（1678—1735）

清朝入关后第三任皇帝，本名爱新觉罗·胤禛。他勤政爱民，同时强化专制体系，是备受史学家瞩目的皇帝。

朝鲜孝宗（1619—1659）

朝鲜王朝第十七代国王，本名李淏。他曾在沈阳担任人质，归国即位后提倡反清，召集不少心同此念的臣子，计划北伐清朝。

朝鲜英祖（1694—1776）

朝鲜王朝著名的国王，本名李昑。他在位五十二年，与孙子正祖治下的朝鲜，被称为朝鲜文艺复兴的时代。

永历皇帝（1623—1662）

南明皇帝，本名朱由榔，是最后以明为国号的朱姓皇帝。

将领

李舜臣（1545—1598）

朝鲜将领，著名的海战英雄，数次以少胜多，扭转劣势的英雄人物。

李如松（1549—1598）

明朝将领，辽东人，长期镇守边疆。壬辰倭乱期间，奉命领兵前往朝鲜，战果丰硕，令朝鲜君臣钦佩不已。

小西行长（？—1600）

日本战国时代大名，壬辰倭乱的主要将领。

加藤清正（1562—1611）

日本战国时代大名，壬辰倭乱的主要将领。

祖承训（生卒年不详）

明朝将领，曾领兵支持朝鲜，可惜因为兵马人数悬殊而败北。

宋应昌（1536—1606）

明朝官员，主导壬辰倭乱期间明朝军事战略的重要人物，曾担任朝鲜经略。

权慄（1537—1599）

朝鲜将领，壬辰倭乱期间少数能够以少胜多、在野战打败日军的将领。

杨元（？—1598）

明朝将领，跟随李如松前往朝鲜，后因丢失南原城被斩首处刑。

杨镐（？—1629）

明朝将领，曾担任朝鲜经略，主持战局，以清廉和治军严谨，颇受朝鲜君臣好评。

刘铤（1558—1619）

明朝将领，曾参与平定倭乱。

李如柏（1553—1620）

明朝将领，曾参与平定倭乱。

李成梁（1526—1615）

明朝著名将领，李如松、李如柏的父亲。

袁崇焕（1584—1630）

明朝将领，明朝晚期少数能够对抗清军的军事人物。

王盛宗（生卒年不详）

明朝将领。

王平（生卒年不详）

明朝将领，王盛宗之子。

洪承畴（1593—1665）

明朝、清朝官员，才兼文武，两朝都位极人臣，也因此备受衷怀明朝的人批评。

戚继光（1528—1588）

明朝将领，以对抗倭寇颇有成效著名。

学者

李滉（1501—1570）

朝鲜著名的儒者，致力发展朱子学，今韩国千元纸钞上的肖像即是李滉。

藤原惺窝（1561—1619）

日本儒者，姜沆与之交流学问，是战争意外带来的馈赠。

朴世茂（1487—1564）

朝鲜士人，曾编纂教育儿童的教材《童蒙先习》。

李万运（1723—1797）

朝鲜士人，《纪年儿览》的编纂者，主张朝鲜人应该重视朝鲜历史。

官员

石星（？—1599）

明朝官员，壬辰倭乱期间担任兵部尚书，初期主战，后来转而主和，最后死于狱中。

许弘纲（1554—1638）

明朝官员，曾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反对出兵朝鲜。

李祯（生卒年不详）

明朝官员，壬辰倭乱期间担任兵部侍郎。

陈屏山（生卒年不详）

明朝官员，协助鲁认逃离日本。

李源登（生卒年不详）

明朝官员，协助鲁认逃离日本。

李光庭（1552—1627）

朝鲜官员，倭乱期间负责转运物资，曾于1602年出使中国。

金尚宪（1570—1652）

本贯安东，朝鲜官员，坚决反对与清朝建交，最终被告发与大明勾结，被清人带走，死于沈阳。

柳成龙（1542—1607）

朝鲜官员，壬辰倭乱期间曾担任领议政，相当于行政院长。战争结束之后，撰写《惩毖录》，是今日研究这场战争的必读史料。

宋应星（1587—1666）

明朝官员，以擅长科学闻名于后世。

姜逢元（生卒年不详）

明朝官员，官至礼部尚书，频频勒索朝鲜使者。

张居正（1525—1582）

明朝官员，内阁首辅，在任期间改革朝政，成效颇著。

宋时烈（1607—1688）

朝鲜官员，著名的儒学家，也以思明反清为人所知。

金钟厚（1721—1780）

朝鲜官员，本贯清风，自小即以文学闻名，因其追求权力为后世史学家诟病。

李玄锡（1647—1703）

朝鲜官员，后上表乞退，专心编纂明朝史书《明史纲目》。

徐命膺（1716—1787）

朝鲜官员，朝鲜修明史的提倡者之一。

徐光启（1562—1633）

明朝官员，重视基督宗教，利玛窦的好友，一起翻译《几何原本》。

李之藻（1565—1630）

明朝官员，重视基督宗教，利玛窦的好友，一起编译《同文算指》《新算法书》。

俘虏

鲁认（1566—1622）

字公识，号锦溪，有《锦溪集》传世。于壬辰倭乱期间被日军俘虏，后经明朝官员协助，逃至福建，最终顺利返乡。

徐景春（生卒年不详）

朝鲜士人，与鲁认同样被掳至日本九州岛。

奇孝淳（生卒年不详）

朝鲜人，与鲁认一起逃离日本。

郑东之（生卒年不详）

朝鲜人，与鲁认一起逃离日本。

风石伊（生卒年不详）

朝鲜人，与鲁认一起逃离日本。

姜沆（1567—1618）

本贯晋州，倭乱期间被俘虏至日本，他结识日本儒者，传播朱子学，最终顺利返国。

大明处士

许格（1607—1690）

朝鲜士人，终身为明朝守节，不再求取功名。

郑栻（1683—1746）

朝鲜士人，终身为明朝守节，不再求取功名。

郭浏（1597—1671）

朝鲜士人，终身为明朝守节，不再求取功名，一意写作《皇明记略》和《春秋解义》。

笔谈者

常玉琨（生卒年不详）

自称是常维春的后代，汉人。

严诚（1732—1767）

乾隆三十年举人，与洪大容笔谈时三十五岁，杭州府仁和县人。

潘庭筠（1742—？）

乾隆三十年举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钱塘县人。历任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国史馆纂修、陕西道监察御史。

传教士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著名的传教士，他在明万历年间抵达中国，结识明朝官员，宣传教义。

征引书目

古籍史料

《明神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通文馆志》，首尔：首尔大学校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2006。

申维瀚：《海游录》，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册三。

归徕老人：《震史一统》，波士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藏朝鲜抄本。

权挟：《石塘公燕行录》，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册五。

权拨：《朝天录》，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册二。

任守干：《东槎日记》，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册三。

成以性：《乙酉燕行日记》，收入《燕行录全编·第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一册。

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册十。

朴世茂：《童蒙先习批注》，首尔：出版社不详（台湾大学图书馆藏书），2011。

朴趾源：《燕岩集》，东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光武四年（1900）序刊本。

朴趾源著，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许倬等编：《朝鲜事大·斥邪关系数据集》，首尔：骊江出版社，1985。

许篈：《朝天记》，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

2001，册六。

吴乘权等辑：《纲鉴易知录》，北京：中华书局，2014。

吴道一：《丙寅燕行日乘》，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册二十九。

宋应星：《天工开物》，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9，子部谱录类，册一一一五。

李□：《燕途纪行》，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1，册八。

李玄锡：《明史纲目》，上海：上海图书馆藏朝鲜1703年序刊本。

李玄锡：《游斋先生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册一百五十六。

李田秀：《入渖记》，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册三十。

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1，册十一。

李泰寿、李寿彝：《尊周录》，东京：早稻田大学藏朝鲜抄本。

李晚荣：《雪海遗稿》，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续》，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册三十。

李万运：《纪年儿览》，波士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藏朝鲜刻本。

李德懋：《入燕记》，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册五十七。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2015。

闵鼎重：《老峯燕行记》，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册二十二。

闵镇远：《燕行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1，册十一。

杨照：《怀古堂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金堉：《朝京日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1，册七。

金钟厚：《本庵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册二三七。

鱼叔权：《稗官杂记》，收入《韩国汉籍民俗丛书》，台北：东方文化，1971，第一辑第八册。

郑澈：《郑松江燕行日记》，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册四。

郑斗源：《朝天记地图》，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1，册七。

郑昌顺等编：《同文汇考》，台北：桂庭出版社，1978。

郑昆寿：《赴京日录》，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册四。

郑昆寿：《柏谷集》，收入《燕行录全编·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册五。

姜沆：《看羊录》，收入《海行总载·第二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66。

姜浩溥：《桑蓬录》，收入《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1，册十四、十五。

柳成龙，《惩毖录》，收入《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三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史部第八册。

柳思瑗：《文兴君控于录》，收入《燕行录续集》，首尔：尚书院，2008，册一〇二。

洪大容：《湛轩书·外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册二四八。

洪大容：《湛轩燕记》，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册四十二。

洪大容、李德懋著，邝健行点校：《乾净衕笔谈·清脾录——朝鲜人著作两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赵宪：《朝天日记》，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册五。

徐命膺：《保晚斋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

会，2001，册二三三。

徐浩修：《热河纪游》，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册五十一、五十二。

鲁认：《锦溪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册七十一。

韩德厚：《燕行日录》，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册五十。

裴三益：《朝天录》，收入《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册四。

近人研究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廖彦博译：《挣扎的帝国：气候、经济、社会与探源南海的元明史》，台北：麦田，2016。

上垣外宪一：《雨森芳洲》，东京：中央公论社，1989。

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东京：研文出版，2004。

山本治夫：《十八世紀 东アジアの开明思潮の隆替と现代意识（A）—燕行录类を基轴にして—》，《福冈大学总合研究所报》，第六十一号（福冈，1983），页1—43。

山本进：《大清帝国と朝鲜経済——开発·货币·信用—》，福冈：九州岛大学出版会，2014。

夫马进：《朝鲜燕行使と朝鲜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台北：允晨文化，2014。

古柏（Paize Keulemans）：《开放世界的传说——作为荷兰戏剧、中国传言和全球新闻的明朝之亡》，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作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页138—167。

仲尾宏：《朝鲜通信使——江户日本の诚信外交》，东京：岩波书店，2007。

全海宗：《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收入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页87—104。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9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朱鸿林：《孔庙从祀与乡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何冠彪：《清朝官方的“明亡于万历”说》，《“国立”编译馆馆刊》，二十八卷一期（台北，1999），页255—272。

吴政纬：《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1600—1800）》，台北：秀威信息，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专刊第38种，2015。

李元淳著，王玉洁、朴英姬、洪军译：《朝鲜西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李光涛：《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 3（台北，1947），页193—236。

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张伯伟：《名称·文献·方法——关于“燕行录”研究的若干问题》，收入张伯伟编：《“燕行录”研究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页3—26。

杨正显：《王阳明〈年谱〉与从祀孔庙之研究》，《汉学研究》，二十九卷一期（台北，2011），页153—187。

姜沆著，朴钟鸣译注，《看羊录：朝鲜儒者の日本抑留记》，东京：平凡社，1984。

洪大容著，夫马进译注，《乾净笔谭1》，东京：平凡社，2016。

顾诚：《南明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海野一隆：《李朝朝鲜における地図と道教》，《东方宗教》，第五十七号（大阪，1981），页14—37。

黄时鉴：《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页30—41。

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台北：时英，2003。